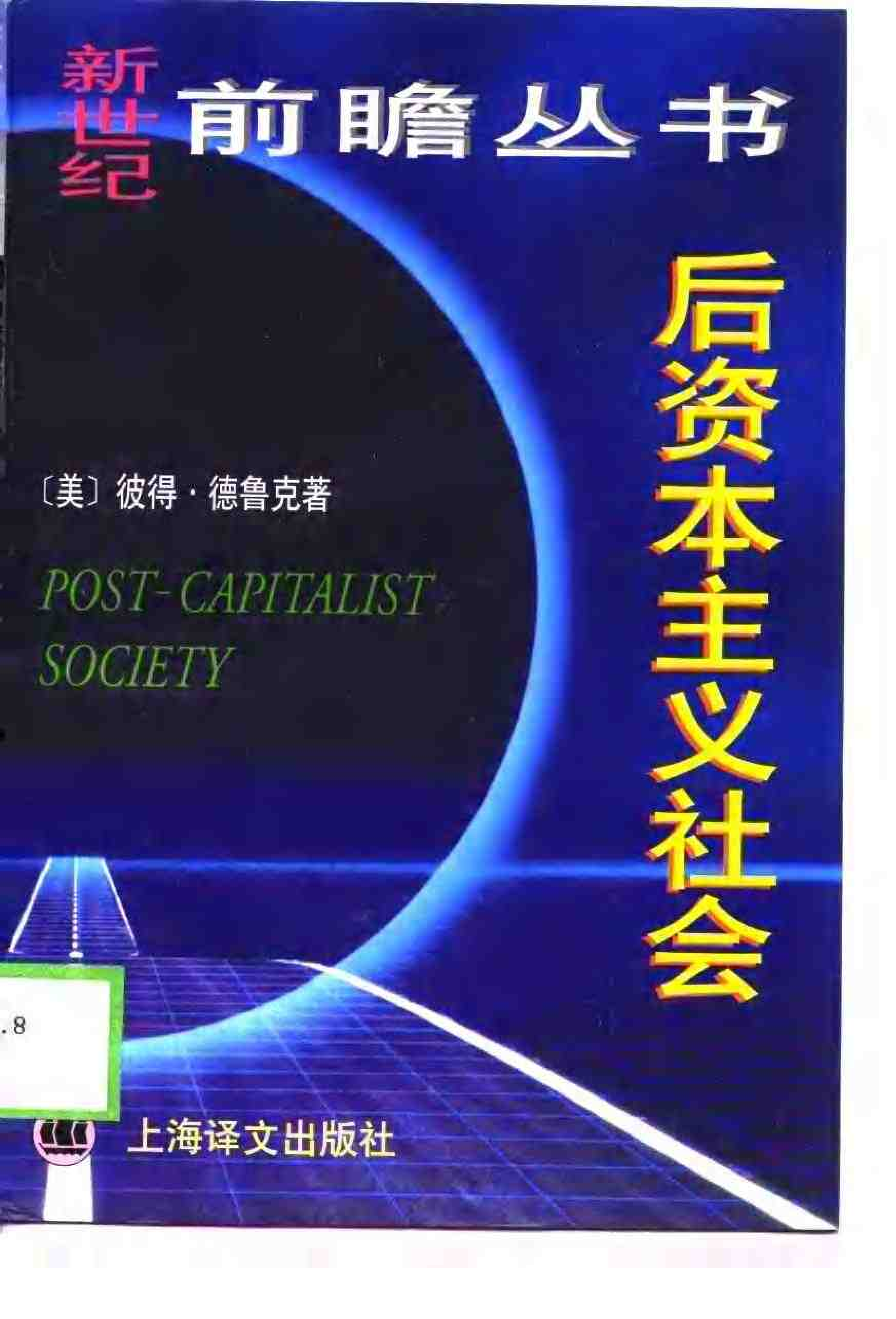

新世纪
前瞻丛书
后资本主义社会
〔美〕彼得·德鲁克著
POST-CAPITALIST SOCIETY
上海译文出版社

新世纪前

后资本主义社会

[美] 彼得·德鲁克著
张星岩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Peter F. Drucker

POST-CAPITALIST SOCIETY

Butterworth-Heinemann Ltd, 1993
根据伦敦巴特沃思－海涅曼出版公司1993年版译出

图字:09—1997—138号

后资本主义社会

[美]彼得·德鲁克 著
张星岩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文华新技术公司排版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25 插页 4 字数 155,000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册
ISBN7-5327-2133-7/C·012
定价:14.20元

中译本序

后现代,后工业,后资本主义……这些是西方学者喜爱使用的术语,所谓"后",尽管后接的名词不同,其所涵盖的内容随着后续的词语而各有不同,但就其表示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则是同一的,都是特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直至目前这一历史阶段。本书作者彼得·德鲁克将后资本主义界定为其上限为本世纪40年代,而其下限则断为下世纪20年代,似乎显得有些臆测。

由此,彼得·德鲁克这位80多岁高龄而又多产的美国资深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管理学家的这部近著《后资本主义社会》(1993年)是对本世纪下半叶迄至目前关于西方发达国家——不仅仅是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包括东方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40多年来在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发展变化的回顾,和它们在未来的21世纪新时代中将会展现的面貌的瞻望。

作者在"导言"中指出,近40多年来,世界处于一种巨大的转变之中,处于他称之为向着"后资本主义社会"(亦即知识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个过程,"如果历史能作向导的话,(作者说)它要到2010年或2020年才会完成"。但是它(现在)已经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的面貌。作者随即以"社

www.55188.com 理想在线证券网

会”、“政体”和“知识”三部分描述这个新的社会在阶级关系的变化、国家职能的变化以及国家之间的新的组织、结构的建立：这个“肯定是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它的主要资源将是知识；它同时又是个多组织的社会”，“真正控制资源和绝对是决定性的‘生产要素’是知识”，而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或劳动力。这对于我们早在70年代即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人们是有共识的。作者认为发达国家通过生产力革命、管理革命而进入知识社会。社会阶级划分已不再是“资本家与无产者”，而是“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资本家已从“顶峰上下降，被(管理革命的成果)职业经理所取代”。养老基金，而不是老牌资本家“日益控制了金钱的供应和分配”。而在政体上，民族国家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40多年中“逐渐失去了作为唯一的权力机构的地位”，代之以特大国家和多种跨国的、地区的多国组织。作者在作上述的阐说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或多或少业已出现某些迹象甚至已经有所见于事实，因此具有一定的明晰性和说服力。但是涉及第三部分“知识”时，无疑由于大都出于预测或设想不免显得散乱浮泛。正如有位评论家刊在英国《经济学家》上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实际上是两部不同的书。前半部是德鲁克先生关心了20年之久的思想的具有雄辩力的综合叙述，即使对那些熟悉他的著作的读者来说，这些篇章仍然是激动人心的，但是后半部当他勾画‘知识’社会的未来并为这个社会提供必需的变化而开出药方时，则予人以失望之感，远见卓识的洞察力让位于仅仅是一般的告诫。”此外，出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偏见，在论述到当前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新现实”、“新社会”①时，往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命题妄加非议。特别是1991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解体以后，更其如此，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在道德上和经济上都已失败”。但是他们又不同于反动政客，他们从学术上仍然不得不承认“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唯一条理清楚的意识形态，而且在世界大多数人看来是不可战胜的”。

因此，尽管如此，这部出之于专注于管理学研究的专家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也仍然是值得中国读者一读的，我们将从中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40多年来在政治、经济、社会这些方面经历巨大的发展变化的轨迹；二次大战以后箭拔弩张的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已让位于求同存异，在金融商贸等经济领域内达到互惠互补，以及重视市场经济以及市场在经济领域内不容忽视的调剂作用等等，已成为带有规律性的世界经济运作的重要举措，得到各国广泛的认同。作者在本书中反复指出，21世纪将是后资本主义社会，是知识社会长人并完成的一个世纪，“知识是今天唯一有意义的资源”，“知识是一种效用，是获得社会和经济的效益的手段”，“将知识应用于知识——管理”等等。这些话，对行将跨入高科技迅猛发展的21世纪的我们是值得深思的。

汤永宽

1998年3月

---

① 彼得·德鲁克有著述分别以《新现实》（1989年）和《新社会》（1949年）命名。

致谢

我非常感谢我的老朋友、长期以来一直任我的编辑的美国人小卡斯·坎菲尔德。他耐心地听取我无数次的建议和提纲，并在我前进每一步时都给予鼓励。他仔细阅读我的初稿，提出极为有益的意见和批评。我还要感谢另一位老朋友马里恩·布哈贾。他审阅了本书的初稿，并在修改和编辑过程中给予很大帮助。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传记的作者、密执安州弗林特通用汽车工程与管理学院的罗纳德·格林伍德教授一丝不苟地阅读了(第一章中)我对泰勒和科学管理的评论。第六章最后一节的成文得感谢已故罗伯特·格林科夫(尤其是1977年保利斯特出版社出版的他的那本博学多才、讨人喜欢的《公仆领导》)，1990年道布尔迪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斯·德普雷的《领导乃一门艺术》一书，以及与两位朋友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的富勒神学院院长戴维·阿伦·哈伯德博士的多次讨论。我的助手崔莉·豪克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无畏地与我那变化多端的笔迹作战。对上述所有的人，均致以衷心的感谢。

加里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

1992年感恩节

目　录

www.55188.com 理想在线证券网

第二部分　政体

第三部分 知识

导言

转变

在西方历史上，每隔几百年，就会出现急剧转变。我们会跨越过一道我在前一本书(《新现实》，1989 年)中所称的“分界线”。短短几十年里，社会重建自己——它的世界观、基本价值观、社会和政治结构、人文科学、主要的制度。50 年过后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那时出生的人甚至无法想象他们的祖父母所生活的以及他们的父母所出生的世界。

目前，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转变中。它正在创造后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本书的主题。

这样的一个转变在 13 世纪曾发生过，当时的欧洲世界几乎一夜之间就变成居于新城市的中心了。城市行会出现了，成了新的社会统治集团，长途贸易复兴了；哥特式建筑成了显赫的城市新建筑，实际上简直是资产阶级的建筑；新的西恩那派的画[1]兴起了；人们转向亚里士多德，视之为智慧的源泉；城市大学取代位于农村的与世隔绝的修道院成了文化中心；新的城市修道会，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成了宗教、学问和精神的载体；几十年间，由使用拉丁语转变为使用本地语，而但丁则开创了欧洲文学。

200 年后，从 1455 年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以及随之出现以

活字印刷的书至1517年马丁·路德的基督教改革运动的60年间，发生了又一次转变。这是欧洲文艺复兴兴起，而于1470年至1500年间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达到顶峰；重新发现古迹；欧洲人发现美洲；自古罗马军团以来建立第一支常备军西班牙步兵；重新发明解剖学，并用它进行科学探究以及阿拉伯数字在西方得以普遍采用的60年。同样，这是一个生活在1520年的人无法想象的他的祖父母生活过而他的父母诞生于其中的世界。

下一次转变始于1776年，此时美国正进行着独立战争，此时正值瓦特改进的蒸汽机问世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转变于40年后在滑铁卢[②]结束。这40年是所有现代的种种“主义”诞生的时期。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产业革命都出现在这40年里。这个时期还诞生了现代大学（柏林大学于1809年创立），不仅如此，还出现了普遍性的学校教育。这40年里犹太人获得了解放，到1815年罗特希尔德家族[③]成了使国王和王子相形见绌的强大力量。这40年实际上产生了新的欧洲文明。同样，这是一个生活在1820年的人无法想象的他的祖父母生活过而他的父母诞生于其中的世界。

200年后，我们的时代也是处在这样的一个转变时期。然而，这一次并不仅限于西方社会和西方历史。这是一次根本性

---

① 13至14世纪兴起于意大利中部城市西恩那的画派。——译者

② 比利时中部城镇，1815年拿破仑军队大败之处。——译者

③ 罗特希尔德家族，系指德籍犹太人M·A·罗特希尔德（1743—1812年）与其长子在法兰克福经营银行，其余四子则分别在维也纳、伦敦、那不勒斯、巴黎开设分行，成为欧洲著名银行世家，发展成19世纪欧洲经济史上有影响的银行集团。——译者

的变化，不再有"西方"历史，甚至不再有"西方"文明。只有世界历史和世界文明，但这两者都是"西方化"了的。目前的转变究竟始于日本作为第一个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大国出现——即1960年左右——还是始于电子计算机，即始于信息变得极为重要之际，这尚可争论。我自己的意见是，转变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士兵权利法》，它给了美国每一位复员士兵上大学的钱，这在30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可能毫无意义。《美国士兵权利法》以及美国退伍军人作出的热烈反应标志着向知识社会的转变。将来历史学家很可能会把它看作为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

显然，我们目前仍处在这个转变之中，如果历史能作向导的话，它要到2010年或2020年才会完成。但是，它已经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的面貌。没有一个在1990年诞生的人能够想象他的祖父母(即我这一代人)成长和他的父母出生的世界。

试图理解1455年开始的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到现代世界的这一转变，首次成功的尝试要晚到50年之后，直到哥白尼写于1510年至1514年间的《纪事》；马基雅维里写于1513年的《君主论》；米开朗琪罗于1510年至1512年间在西斯廷教堂天顶作的综合和超越了文艺复兴时期所有艺术的油画；以及16世纪30年代在特伦托主教会议上作出的重建天主教会的决定才成为事实。

下一个转变，即200年前发生的和由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的转变，则在60年后，在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的分别于1835年和1840年出版的两卷本《美国民主》中第一次得到理解和分析。

现在我们已经深深步入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回过头来审视和修订资本主义时代的和民族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

的历史。所以本书将重新审视即将过去的这个时期，从新的观点看一些事情可能令人大吃一惊(它们已使我大吃一惊)。

但是，要预测后资本主义世界会是个什么样子仍然是有风险的。会出现一些什么新问题以及重大的新问题将出现在何处，我认为，我们已经能发现并达到一定的或然率。在许多方面，我们还能描述什么是行不通的。大多数问题的“答案”基本上尚隐伏在未来的胚胎之中。我们能肯定的只有这一点，那就是，这个经过当前对其价值观、信仰、社会和经济结构、政治概念和制度甚至世界观作重新调整而再现的世界将不同于今天任何人所能想象的任何世界。但是，在某些范围内，特别是在社会及其结构之内，基本转变已经发生。新社会将是一个非社会主义社会，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这两者几乎是肯定的。同样肯定的是，它的主要资源将是知识。这还意味着它将不得不是一个有多种组织的社会。同样可肯定的是，在政治方面，我们已经从具有 400 年历史的主权的民族国家转化为一个多元的政体，其中民族国家将不再是政治一体化的唯一的单位。它将只是我称之为后资本主义政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仍然是一个关键部分。在这种我所称的“后资本主义政体”中，跨国的、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和地方的甚至部落的结构既竞争又共处。

这些情况都已经发生。所以它们是可以加以描述的。而这亦正是写本书的目的。

后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政体

仅仅几十年前，每个人都“知道”，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肯定会

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社会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社会。但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知道，或者至少意识到，发达国家正在走出任何可以称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市场肯定仍然是经济活动的有效综合者。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发达国家也已经进入后资本主义。它正在迅速成为一个新的“阶级”社会，并以一种新的中心资源作为其核心。

资本主义社会受两个社会阶级的支配：拥有并控制生产手段的资本家和工人——卡尔·马克思（1818—1883 年）称之为“无产者”，他们被人视为异己、被剥削而且依附于人。正是在 1883 年马克思逝世那年开始的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在每个发达国家达到高潮的“生产力革命”，其结果是无产者第一次成了“富裕的”中产阶级。1950 年左右，产业工人不再是“无产者”，但仍是“劳动力”——似乎支配着每个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但是，随着“管理革命”的开始，制造业蓝领工人的数量开始迅速下降，而其权力和地位则下降得更厉害。到 2000 年，将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传统的制造和运送商品的工人占到劳动力总数的六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以上。

资本家达到其顶峰可能甚至更早——在本世纪之交，肯定不会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自那时起，没有人能在权力和名声方面比得过美国的摩根、洛克菲勒、卡内基或福特，德国的西门子、蒂森、拉特瑙、克虏伯，英国的蒙德、肯纳德、利华、维克斯、阿姆斯特朗，法国的德文德尔和施奈德，或控制日本大财阀的家族，三菱、三井、住友这样的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已全被“职业经理”[①]所取代，这是管理革命的第一个成果。当然，现在仍有许许多多的富人，而且他们仍然在报纸的社会版面上占有

显著的位置。但是,他们已成为"著名人士";在经济上,他们几乎已无关紧要。甚至在商业版面上,所有注意力都已集中在"雇员"即经理身上。所有关于金钱的议论都是关于这些本身钱不多或者一无所有的雇员的"超额薪金"和奖金的。

在发达国家,养老基金而不是老牌资本家,日益控制了金钱的供应和分配。在美国,1992年它们拥有该国大企业一半的股本以及这些公司几乎一半的固定债务。养老基金的受益人当然是这个国家的雇员。如果按马克思下的定义,社会主义被界定为生产手段雇员所有制,那末美国已成为最"社会主义"的国家——同时仍然也是最"资本主义"的国家。养老基金由一批新型的资本家、不露面不知名的支取薪金的雇员、养老基金投资分析家和有价证券经理人员所管理。

但是,同样重要的是,现在真正控制资源和绝对是决定性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或劳动力,而是知识。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划分是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而不是资本家和无产者。

向知识社会转变

向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我第一次写到"雇员社会",实际上是在1950年以前[2]。10年后,

---

① 最好的记述见诸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的《可见的手》(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尽管该书论述仅限于美国的制造业。

② 见我的《新社会》(1949年)一书。

在1960年左右，我创造了新词“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我1969年写的《不连续性时代》一书第一次谈到“组织(的)社会”。因此本书是以过去40年所做的工作为基础的。而且，它提出的大多数政策和行动建议已经成功地接受了检验。

然而，我们已进入一个不同的新社会这一点，只是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制度[①]崩溃之后，才变得十分清楚。只有在这个时候，像本书这样的书才有可能写出来：一本不是预测性的而是描述性的书，一本不是未来主义的而是此时此刻要求采取行动的书。

马克思主义的破产(道德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和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不是“历史的终结”(如1989年有一篇广为宣传的文章[②]所宣称的)。即使是自由市场的忠诚信徒们，要把这种胜利欢呼为基督重临亦无疑会犹豫不决。但是，1989年和1990年事件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它们意味着一种历史的终结。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崩溃结束了为世俗宗教——我称之为社会拯救信念[③]——支配的250年。这种世俗宗教的第一个预言家是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是它的最高精华和顶峰。

然而，摧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的这种力量也在逐渐废弃资本主义。从18世纪下半叶起的250年里，资本主义乃是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现实。在过去的100年里，马克思主义乃是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意

---

① 这两种情况都是在我的《新现实》一书(1987年写成，1989年出版)中预测的，比实际事件早了好几年。

②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载《国家利益》季刊，1989年夏季号。

③ 见我的《新现实》(1989年)一书。

识形态。现在，这两者都在迅速地为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社会所取代。

这个新社会——它已经存在——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再说一遍，它必定会使用自由市场作为唯一被证实的经济一体化机制。它不会是“反资本主义的社会”。它甚至不会是“非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主义的机构会继续存在，虽然有些机构，如银行，可能会发挥完全不同的作用。但是，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心——即它的结构，它的社会和经济动力、社会阶级和社会问题——与支配过去250年并界定种种使政党、社会团体、社会价值体系和个人与政治承诺得以具体化的问题的那些重心不同。

基本经济资源——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生产资料”——不再是资本、自然资源（经济学家的“土地”）或“劳动力”。*它现在是并且将来也是知识*。创造财富的中心活动将既不是把资本用于生产，也不是“劳动”，而上述两者曾是19世纪和20世纪经济理论的两极，不论是古典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凯恩斯理论还是新古典理论都是如此。现在，价值由“生产力”和“技术创新”来创造，而这两者都是将知识应用于工作。知识社会的主要社会团体将是“知识工作者”，即像资本家知道如何把资本用于生产一样，他们是知道如何把知识用于生产的知识经理人员，知识专业人员，知识雇员。在实践中，所有这些知识人员将受雇于各种组织之中。可是，不像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员，他们既拥有“生产资料”，又拥有“生产工具”，前者由于他们的养老基金正在所有发达国家中迅速形成而成为唯一真正所有者，而后者因为知识工作者拥有知识并能随身带着到处走。因此，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挑战将是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的

生产力。

然而，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挑战，则将是该社会中的第二阶级的尊严：服务工作者。通常服务工作者缺乏成为知识工作者的必要教育程度。而且，在每个国家，甚至在最先进的国家中，他们仍将构成工作人口的多数。

后资本主义社会将用一种价值观和美学概念的新的两分法来划分。它将不是英国小说家、科学家和政府行政官C·P·斯诺(1905—1980年)在其1959年的《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一书中所写的"两种文化"——文学文化和科学文化，尽管这种分化已完全成为现实。两分法将是在"知识分子"和"管理人员"之间，前者与文字和思想有关，而后者与人和工作有关。用一种新的综合法来超越这种两分法，将是一次哲学上和教育上对后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挑战。

胜过民族国家?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还标志着另一个时代、另"一种历史"的终结。如果说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是象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垮台的高潮事件，那末1991年2月多国联盟反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则是标志着主权民族国家是政治舞台上主要(而且常常是唯一的)演员的400年历史终告结束的高潮事件。未来的历史学家无疑会把1991年2月列入"重要的日子"。这种跨国行动史无前例。众多的国家在没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反对者，而且在几乎没有异议的情况下，把世界大家庭制止恐怖主义的共同利益放在自己的民族感情之上，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甚

至放在自己的国家利益之上，这种时刻是过去所没有的。几乎所有国家都一致认识到恐怖主义不是留给一个国家政府所能处理的"政治"问题，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它要求采取非国家的、跨国的行动。

人们普遍认为1991年对伊拉克的战争是为了维护西方石油的供应，特别是美国的自由主义者都持这种看法。没有比这种看法距离事实真相更远的了。伊拉克对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油井的控制将对西方的经济有极大的利益。这将意味着大为廉价的石油。由于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几乎没有本地的人口，因此对眼前的石油收入没有迫切需要。而伊拉克人口过于稠密，除了石油之外几乎没有自然资源，所以，它需要尽量多地出售石油。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首先感兴趣的是保持高油价，而这意味着保持低产量。顺便说一下，这说明了为什么美国甚至在两伊战争前就拼命支持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以及为什么它直到萨达姆进攻科威特并沉溺于公开的恐怖主义行动时才停止这样做。我猜测，这还说明了为什么萨达姆估计错误；他必定以为美国为了保证低油价会让他公然侵略别国而不受惩罚。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一家大石油公司中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确信美国政府只会发出一些非难的噪声。

1576年法国律师、政治家让·博丹（1530—1596年）在他的《国家论六卷集》中创造了民族国家这个词，在此后400年里，民族国家已经对内对外成为唯一的政权机构。此外，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即在过去200年里，它又成了世俗宗教，社会拯救信念的载体。事实上，极权主义乃是作为唯一权力机构的主权民族国家信条的最高精华和顶峰。

政治理论和符合宪法的法律仍然只知道主权国家。而且在

过去的100年里，它持续地变得更为强大、更占优势。它已突变成"特大国家"。它是我们非常熟悉了解、知道如何用预制的标准化零件——行政部门、立法机关、法庭、外交部门、国家军队等——制造的一种政治结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前殖民帝国中诞生的将近200个新国家中，每一个都已建成为主权民族国家。这正是最后一个殖民帝国苏维埃帝国中的每一部分所渴望成为的国家。

但是，40年来，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起，主权民族国家已逐渐失去其作为唯一权力机构的地位。在国内，发达国家正迅速成为多元的组织社会。在国外，有些政府功能正在变成跨国的，有些变成地区的（即在欧洲共同体内），还有些正在部落化。

民族国家并非将要"消亡"。它可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是最强大的政治机构。但它将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它将日益与其他机构、其他组织、其他政策制定者分享权力。哪些将仍属于民族国家的领域？哪些事将由国内自治机构来干？哪些将是"超国家的"？哪些将是"跨国的"？哪些将是"各别的和地方性的"？这些问题将是今后几十年里最主要的政治问题。具体来说，其结果是完全不可预测的。但是，政治秩序看上去将不同于过去几个世纪的政治秩序，在以前的政治秩序中，众多民族国家尽管在规模、财富、立宪和政治信念诸方面各不相同，但都是民族国家，每个国家在其领土上拥有最高权力，并受其领土的限制。现在我们正在进入后资本主义政体，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这种政体。

最后一个可称之为"前现代"哲学家的戈特弗里德·莱布尼兹（1646—1716年），花了大半生时间试图恢复基督教世界的团结，但徒劳无功。他的动机并不是出于害怕天主教徒和新教徒

之间或新教不同派别之间的宗教战争——他出生时，这种危险就已过去了。他所担忧的是，没有对超自然的上帝的共同信仰，世俗的宗教信仰就会出现。他确信，几乎可以断定，世俗的宗教信仰就必定会施行暴政和压制人的自由。

一个世纪后，让-雅克·卢梭证实了莱布尼兹的担忧。他宣称社会能够而且应该控制个人。社会能够而且应该创造一个"新亚当"。社会能够而且应该普遍造就尽善尽美的人。但是它也能够而且应该使个人服从非个人的、超个人的普遍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即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所称的"历史的客观规律"。法国大革命后，社会拯救，首先在西方逐渐成为占优势的信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则在全世界范围广泛展开。不管它怎样佯装是"反宗教的"，它实在是一种宗教信仰。当然，手段是世俗的：禁酒；杀一切犹太人；普遍的心理分析；废除私有财产。然而目标是宗教的：通过创造"新人"以建立人世间的天国。

一百多年来，许诺社会拯救的最强大、最有渗透力的世俗信念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许诺，远比它复杂的意识形态和日益不切现实的经济学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尤其对知识分子。这里有诸多原因，例如，对东方犹太人而言，就是接受一种许诺在沙俄或罗马尼亚结束对他们的迫害和歧视的意识形态。但是，吸引力最大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间乐园的许诺，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俗宗教的号召力。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崩溃了。它没有创造财富而是制造了苦难。它创造了"一批享有前所未有经济特权的官员"的这样一个专有名称，而没有创造经济质量。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教义之所以崩溃是因为它没有创造"新人"。相反，它产生并强化了"旧亚当"身上最坏的东西：贪污腐化、权欲熏心；妒

忌和相互猜疑；暴戾恣睢、遮遮掩掩；制造谎言、偷盗行窃、告发指责，尤其是玩世不恭。共产主义制度有它的英雄，但马克思主义教义却没有一个圣徒。

人很可能是不可救药的。这位拉丁诗人可能是对的：人性总是偷偷地从后门溜进去，不管干草叉多少次将它从前门扔出来。也许犬儒学派的人是对的，他们断言没有善行、美德、无私，只有自私和虚伪（虽然在我处在最不幸的时刻时，我提醒自己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并非如此）。

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教义的崩溃肯定标志着社会拯救信念的消失。我们无法知道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只能希望和祈求。也许只有禁欲主义的放弃？也许会重新出现一种针对知识社会的人的需要和挑战的传统宗教？美国的新教、天主教、跨教派等这些我称之为“乡村的”基督教团体的迅猛发展可能是一种不祥预兆。但是，原教旨主义的复活可能也是一种不祥预兆。因为现在如此热情接受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年轻人，40 年前可能是同样热情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否会出现新的宗教？

不可能发生的事要比可能发生的事容易预测。我们不会看到拒绝物质价值和技术，即“回到中世纪”。这是日本作家昌谷太一（生于 1935 年）在其 80 年代中期的一本日本畅销书中预测的（此书英文版于 1991 年由国际讲谈社以《知识—价值革命》为书名在纽约、东京和伦敦出版）。世界范围的信息和技术的传播肯定会使这种回归成为不可能。（且不提昌谷先生的论点的依据是 19 世纪久已证明不能成立的认为中世纪唾弃物质商品的看法。相反，中世纪的人贪图物质商品。他们念念不忘的是财产，他们的贪婪令人难以置信。马克思主义者老生常谈的嘲笑，即十字军东征是历来最大的购物旅行，此说是有根据的。中世

纪的贫穷不是因为他们要贫穷。是穆斯林征服了希腊语世界和地中海地区，切断了他们通往古代财富产地的道路。）

救赎、自我更生、心灵发展、善行和美德（“新人”，用传统的词语）有可能仍被看作是存在主义的，而不被看作社会的目标或政治药方。社会拯救信念的告终无疑标志着转向内心。它可能重新强调个体，强调人。它甚至可能导致（至少我们能够这样希望）个人责任的恢复。

第三世界

本书论述的重点放在发达国家——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和亚洲大陆上那些新兴发达国家，而不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上。这不是因为我认为不发达国家不重要或不够重要。如果那样认为是愚蠢的。毕竟，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生活在第三世界；到目前的过渡时期结束时（大约在 2010 年或 2020 年左右），第三世界将拥有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但是，我还认为在今后 10 年或 20 年里很可能会出现新的、惊人的“经济奇迹”，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几乎一夜之间会使自己变成飞速增长的经济强国。今后这样的转变甚至还有可能会比过去 40 年，即自我们开始谈论“经济发展”以来还多得多。经济迅速发展的所有因素在中国大陆沿海的、城市化的地区（从北面的天津到南面的广州）都存在。它们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有具有高度教养、非常尊重学问的人民；有奋发进取的老传统；有与新加坡、香港和台湾海外华人的密切联系，以及利用他们的资本、交易网络和行家里手的机会。如果一个政府的政治和经济专制能和平地取消，

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在雄心勃勃的事业的迅猛发展中得以释放。同样，拉丁美洲较大的国家提供了足够的国内市场。墨西哥可能已经处于"起飞"阶段。而巴西一旦在政治上鼓起勇气，以近期的墨西哥为榜样，废除1970年后开始实施而未奏效的(实际上是自杀性的)政策，则其转变速度会令世人吃惊。没有人可能预言前东欧共产党国家会发生什么令人惊奇的事情。

但是，第三世界对发达国家也有巨大的利害关系。除非那儿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有迅速的发展，否则发达国家将为第三世界的移民洪流所淹没，这些移民大大超出了发达国家吸收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能力。

但是，创造后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政体的力量源于发达世界。它们是发达世界发展的产物和结果。对后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政体的挑战所作出的回答不会在第三世界中找到。如果有过已经证明为完全不正确的事，那就是50年代和60年代第三世界领导人的许诺。这些领导人包括印度的尼赫鲁、中国的毛泽东、古巴的卡斯特罗、南斯拉夫的铁托、在非洲鼓吹"黑人的特征和气质"的使徒们或像切·格瓦拉这样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们，他们许诺第三世界将找到新的不同的答案，而且将真正创造一种新秩序。第三世界没有履行这些以它的名义许下的种种诺言。后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政体的挑战、机会和问题只能在它们所由产生的地方解决。那就是发达世界。

社会—政体—知识

本书论述的范围很广。它涉及后资本主义社会、后资本主

义政体以及对知识本身的新挑战。可是它未加论述的要比它试图涉及的多得多。它不是一部"未来史"。它是对现在的观察。

论述的领域(社会、政体、知识)不按其重要性先后排列,而本该把本书结尾关于有知识的人的简短论述放在最前面的。这三个领域的论述现按可预料性作先后排列。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我们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也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会发生——至少是扼要地;而且许多已经在发生了。关于后资本主义政体,我们目前只有一些纲要。必须的一些变化将怎样发生仍是猜测。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已经发生和为什么会发生;我们能具体说出什么需要发生和为什么要发生。然而,关于知识挑战,我们只能提出问题,并希望这些问题是有的放矢的。

人们常问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还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对于本世纪任何幸存者来说,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是愚蠢的。我们肯定离那些使本世纪成为人类史上最卑鄙、最残酷、最悲惨的世纪之一的种种动乱、转变以及突发的混乱的结束为时尚远。任何欺骗自己说我们已接近"历史终结"的人肯定会遇到令人不愉快的意想不到的事。美国总统布什在最初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俄罗斯帝国能否生存下去,随后又就鲍里斯·叶利钦的"前俄罗斯诸国的独联体"能否成功打赌时,这类意想不到的事曾一度使他苦恼不已。

没有一个"后"时期是持久的,或者甚至是长命的。我们论述的这个"后"资本主义是一个过渡时期。未来的社会将是个什么样子,且不用说它是否真会是我们中间有些人敢于期望的"知识社会",取决于发达国家——它们的知识分子领导人、工商业领导人、政治领导人,但首先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工作和

生活中——如何对这个过渡时期、后资本主义时期的挑战作出反应。但是,正因为一切都在变化之中,这确实是一个创造未来的时期。这是一个采取行动的时期。

● 第一部分

社　会

1

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

从1750年至1900年的150年里，资本主义和技术征服全球，创造了世界文明。资本主义和技术创新都不是新事物；很久以来，在西方和东方，这两者都是常见的、反复出现的现象。与众不同的是它们的传播速度以及它们跨越文化、阶级和地理而遍及全球的范围。正是这一点，如此的速度和范围，使资本主义转化为“资本主义社会”，转化为一种“制度”，并使技术进步转化为“工业革命”。

这种转变是因知识含义的彻底改变而引起的。在西方和东方，知识一直都被看作是用于存在的。几乎一夜之间，它就开始用于实干了。它成了一种资源和有用之物。知识一直是一种个人利益。几乎一夜之间，它变成了一种公共利益。

在第一阶段的100年里，知识被用于工具、生产过程和产品，从而产生了工业革命。但是，它也产生了如马克思所称谓的“异化”和新的阶级与阶级斗争，以及伴随而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开始于1880年左右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达到高潮的第二阶段里，知识在其新赋予的含义下开始被用于工作。这开创了生产力革命，在75年里使无产者转化为享有接近上层阶级工资收入的中产阶级一员。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运动因而让位于生

产力革命。最后阶段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知识被用于知识本身。这就是管理革命。知识正在迅速成为唯一的生产要素，使资本和劳动力靠了边。称我们的社会为"知识社会"可能为时过早(而且肯定太放肆)。至今我们只有知识经济。但是我们的社会一定是"后资本主义社会"。

很久以来，在东方和西方，资本主义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复出现过多次。同样在东方和西方，有过许多技术发明和创新迅速发展的初始时期，其中许多时期产生的技术变化与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同样彻底。① 在过去250年的发展中，前所未有的独特之处是它们的速度和范围。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大写的专用名词变成了社会，而不再是像早期的资本主义那样只是社会的一个因素。从1750年到1850年的短短100年里，资本主义同样作为一个大写的专用名词不再像过去那样局限于一个狭窄的地区，而是接管了整个西欧和北欧。然后，在另一个50年里，它便接管了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

所有早期的资本主义局限于很狭小的社会群体。贵族、地主、军人、农民、专业人员、手艺人，甚至体力劳动者，它几乎都未

① 对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反复并相当频繁地出现的现象所作的最好论述见于法国伟大的经济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两本书：《地中海》(两卷本)(第一次出版于法国，1949年；英译本，纽约，哈珀与罗，1972年)和《文明与资本主义》(三卷本)(首次出版于法国，1979年；英译本，纽约，哈珀与罗，1981年)。对早期"工业革命"作最好论述的是：小林恩·怀特的《中世纪技术与社会变化》(牛津大学出版社，1962年)；让·吉姆佩尔的《中世纪机器：中世纪工业革命》(首次出版于法国，1975年；英译本，纽约霍尔特·莱因哈特与温斯顿出版社，1976年)；英国生化学家、东方学家、历史学家李约瑟的不朽著作《中国科学与文明》(剑桥大学出版社)，1954年开始出版，计划中的25个部分还有一半没出版。然而，李约瑟至今已出版的部分已完全改变了我们对早期技术的知识。关于早期"工业革命"，还可参见我的《技术、管理和社会》(伦敦，海涅曼，1973年)，尤其是第二、七、十一章。

触及。如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大写的专用名词，不管扩展到哪里，很快就渗透和改变了所有的社会群体。

从最早的旧世界时代起，新工具、新生产过程、新材料、新作物、新技巧——我们现在称之为“技术”——迅速传播。

例如，现代发明很少有像13世纪时传布得那么快。眼镜产生于1270年左右英国方济各会修士罗杰·培根(死于1292年或1294年)的光学实验，到1290年老年人阅读用的放大镜就已在阿维尼翁的天主教廷中使用，到1300年在开罗的苏丹王宫中使用以及到1310年在中国蒙古皇帝的宫中使用。在19世纪的所有发明中，只有传播最快的缝纫机和电话才有同样的速度。

但是，早期的技术变化，几乎无一例外，都局限于一种行业或一种用途。又过了200年，即到了16世纪初，培根的发明才具有第二种用途：矫正近视的眼镜。在公元前1500年，制陶器用的转盘就已在地中海地区得到充分的利用。烧煮、储水和储食物用的陶罐已为每个家庭所用。可是，制陶器用的转盘其基本原理直到公元1000年才被应用于妇女的纺纱。

同样，公元800年左右，风车从古代的玩具重新设计而使之转变成真正的机器，而且是完全“自动”的机器，但是在300多年后，即1100年后，才被应用于船只。过去，船靠划桨；即使利用风来推进船，也只是起一种辅助作用，而且只有风吹的方向恰好时才能利用。驱动船的风帆的工作方式与驱动风车的翼板完全一样。尽管对于能使船迎侧风和逆风行驶的风帆的需要是早就为人知情的事，而且风车是在法国北部或低地国家，即非常熟悉船和航行的地区重新设计的。可是，在几百年里，没有人将这种用于抽水和碾磨作物的发明，即用于陆上的发明，用于近海。

然而,工业革命的发明立即被全面运用,用于所有可以想到的行业和产业,而且立即被看作为技术。

詹姆斯·瓦特(1736—1819年)在1765年至1776年间重新设计了蒸汽机,使它成为有成本效益的动力提供者。瓦特本人在他富有成效的一生中只集中精力于一种用途:用泵从矿井中抽水,所用的蒸汽机最早是由18世纪初的纽科门设计的。但是,英格兰一个最主要的钢铁专家马上看出,经过重新设计的蒸汽机也可以用来向鼓风炉吹进空气,并出价竞买瓦特制造的第二台蒸汽机。瓦特的合伙人马修·博尔顿(1728—1809年)立即将蒸汽机作为各种工业生产过程的动力提供者予以推销,当然特别是向当时最大的制造业纺织业推销。35年后,美国人罗伯特·富尔顿(1765—1815年)使第一艘汽船漂浮在纽约哈得孙河上。又是20年后,蒸汽机装上轮子,从面诞生了火车头。到1840年,至迟到1850年,蒸汽机改造了每一个制造业生产过程,从玻璃制造到印刷。它改造了陆上和海上的长距离运输,并且开始改造农业。至此,它已渗透到几乎整个世界,唯一的例外是西藏、尼泊尔和热带非洲腹地。

19世纪的人相信(现在大多数人仍然相信),工业革命第一次使“生产方式”(使用卡尔·马克思的术语)的变化改变了社会结构,创造了新阶级:资本家和无产者。但是,这种看法也并非正确的。公元700年至1000年间,由于技术变化,欧洲产生了两个全新的阶级:封建骑士和城市手艺人。骑士是因公元700年左右中亚地区发明了马镫面产生的;手艺人则是因水轮和风车被重新设计成真正的机器面产生的,这种机器第一次使用上无生命的力量(水和风)作为其动力,而不是古代时那样全靠人的肌肉。

马镫使人骑在马背上打仗成为可能；没有脚踩马镫，挥舞长矛、剑或大弓的骑手会立即被牛顿第二定律——“每一种作用力，都有一种反作用力”——的力量翻下马来。有好几百年，骑士成了一种不可战胜的“战斗机器”。但是，这台机器必须有“军农联合体”的支持，在历史上，这种联合体是绝无仅有的。德国人在本世纪以前称之为骑士封地，一块享有合法地位以及经济和政治特权的骑士封地，它至少有50个农民家庭或约200个人生产的食品来支撑战斗机器：骑士、他的扈从、3匹马和12至15个马夫。换句话说，马镫创造了封建主义。

古代的手艺人一度是奴隶。第一个“机器时代”的手艺人，欧洲中世纪的手艺人，成了城市统治阶级，“市民”，他们又创造了欧洲独特的城市，即具有哥特式和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的城市。

技术创新（马镫、水轮和风车）迅速传遍整个旧世界。但是，工业革命初期的阶级基本上仍局限于欧洲。只有日本在公元1100年左右逐步发展了独立的自豪的手艺人，他们深受敬重并在公元1600年之前享有相当大的权力。但是，尽管日本人骑马时采用马镫，他们继续步行打仗。日本农村的统治者是步兵的指挥官：大名。他们向农民征税，但没有封地。在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新技术没有任何社会影响。中国的手艺人仍然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农奴。军人没有成为地主，像欧洲古代一样，仍然是职业雇佣兵。即使在欧洲，早期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化，在过了大约400年才充分显示出来。

对照之下，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转变，过了不到100年就在西欧充分显示出来。1750年，资本家和无产者仍是微不足道的群体。事实上，按19世纪这个词的意义（即工厂工人），无产者几乎已不存在了。到1850年，资本家和无产者是西

欧生气勃勃的阶级,而且处于攻势。它们在资本主义和现代技术渗透的地方迅速成为占优势的阶级。在日本,这一转变花了不到 30 年,从 1867 年明治维新到 1894 年中日战争。在上海、香港、加尔各答、孟买或沙俄,花的时间稍许长一点。

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因其速度和范围创造了世界文明。[①]

知识的新含义

不像那些"极度简单化者",如黑格尔和马克思等 19 世纪理论家所述说的,现在我们知道,重大历史事件极少只有一个原因和一种解释。历史事件一般是许许多多不同的和独立的发展汇合的结果。

要了解历史如何起作用的一个例子是来看一下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它最早的根基是二进数制,即 17 世纪德国数学家、哲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兹(1646—1716 年)认识到所有的数可以用 0 和 1 两个数来表达。第二个根基是 19 世纪英国发明家查尔斯·巴贝奇(1792—1871 年)发现齿轮(即结构)能呈现算术功能:加、减、乘、除——发现了真正的"计算机"。然后,本世纪初,两位英国逻辑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1861—1947 年)和伯特兰·罗素(1872—1970 年)在他们的《数学原理》中表示,任何可以用精确的逻辑形式提出的概念都可以用数学来表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美国的战时生产局担任统计员的一

① 这一发展的最佳历史著作是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剑桥大学出版社,1969 年)。

个奥裔美国人奥托·诺伊拉特(活跃于1915—1930年)从以上的发现中获得"数据",即当时是全新的、异端的思想:来自任何领域的信息,无论是解剖学、天文学、经济学、历史学还是动物学,在用数量来表示时全是一样的,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和表达(附带说,这个思想也是现代统计学的基础)。稍许早一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美国人李·德福雷斯特(1873—1961年)发明了三极管,将电子脉冲转化为声波,从而使广播言语和音乐成为可能。20年后,在一家名为IBM的中型穿孔卡制造公司工作的工程师想到,三极管可在电子方面用于1和0之间的转换。这些因素,缺了一个,就不会有电子计算机。而且没有人能说出其中哪一个是最主要的因素。然而,由于所有这些因素都到位了,电子计算机的出现才变得势所必然。但是,它成为美国的发展成果,纯属偶然。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偶然因素使美国军方愿意出巨资,开发能以很高的速度算出高速飞行的敌机在天空的位置和快速航行的敌舰的位置的仪器(顺便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长时间才取得完全成功)。否则的话,电子计算机很可能成为英国的发展成果。事实上,一家英国公司,生产食品和经营餐馆的莱昂斯公司,在40年代开发了第一台名为"利奥"的用于商业的电子计算机,而且真的运转了。莱昂斯公司只是无法筹资与五角大楼竞争,不得不放弃其成功的而且已在运转(而且便宜得多)的机器。

同样,许多不同的发展成果(其中绝大多数相互之间可能完全没有联系)被用于使资本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并使技术进步发展成工业革命。然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年)于本世纪初阐述的最著名的理论——资本主义是新教伦理的产物——已基本上被推翻。这方面确实没有足

够的依据。支持卡尔·马克思早期论点的依据也只是稍许多一点。他认为蒸汽机，新的原动力，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以致手艺工人再也不能为“生产资料”提供资金，不得不将控制权让给资本家。但是，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倘没有了它，那众所周知的现象，即资本主义和技术进步，就不可能转变成社会的和全球范围的普遍现象。这就是在1700年左右或者此后稍许晚些时候在欧洲出现的有关知识含义的彻底改变。[①]

关于我们能够知道什么以及如何能够知道的理论，其数量与从公元前400年的柏拉图到现在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年)和卡尔·波普尔(1902—)的形而上学家一样多。但是，自柏拉图时代起，关于知识的含义和功能，在西方只有两种理论，而且从差不多的时候起，在东方也只有两种理论。柏拉图的发言人，聪明的苏格拉底，认为知识的唯一功能是自知之明，即人的智力、道德和精神的发展。他的最有才华的反对者、学识高深、才华横溢的普罗塔哥拉却认为，知识的目的是使掌握知识的人知道说什么和怎样说，从而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对普罗塔哥拉来说，知识意味着逻辑、语法和修辞——后来变成了三学科，中世纪学问的核心——而且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文科教育”或德国人所说的普通教育。东方也有两种几乎是一样的知识理论。对孔子信徒而言，知识是知道说什么和怎样说，以及知道走向进步和世间成功的途径。对于道教徒和禅宗和尚而言，知识是自知之明，走向启蒙和智慧的途径。但是，尽管两

①　这种变化，我在1961年的论文《技术革命：略论技术、科学和文化之间关系》中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这篇论文先后收入我1973年出版的论文集《技术、管理和社会》(伦敦，海涅曼出版社)和1992年出版的论文集《生态学的想象》(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事务出版社)两书。

者对知识的含义有如此不同的看法，但它们对知识不表示什么完全持一致的意见。知识不表示做的能力。它不表示功用。功用不是知识而是技能——希腊语用的词是 technē。

不像他们的远东同代人，中国的孔子信徒，对除书本知识以外的任何事物极为蔑视[①]，苏格拉底和普罗塔哥拉则尊重技能。

事实上，在西方，在 18 世纪英国“绅士”出现前对技能的蔑视是人们所不了解的。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对技能怀有这样极度的蔑视，无疑是不足道的，但却是统治集团在绅士行将被资本家和技术专家取代之际的一道徒劳无益的已无退路的防线。

但是，即使对苏格拉底和普罗塔哥拉来说，技能，不管怎么值得称赞，却并非知识。它局限于一种具体的用途，没有一般的基本原理。船长关于从希腊到西西里航行的知识不能用之于其他方面。此外，学习技能的唯一途径是经由学徒和经历。技能不能用言词来解释，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一样。它只能示范操作。直到 1700 年，甚至更晚一点，英国人从不谈起“手艺”，而只谈“秘传诀窍”，这不仅因为手艺技能拥有者曾发誓保密，而且因为一项手艺根据定义未经拜师学艺的人是得不到的，它是靠示范来传授的。

工业革命

此后，在 1700 年以后开始的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短短 50

---

① 中国的儒家并非如此，“学以致用”，即须讲究技能。此系作者一知半解之说。——译者

年里，人们发明了技术。技术这个词是一项宣言，它把技能，即手艺技能的秘传诀窍与"……学"，即组织起来的、系统的、有目的的知识，结合起来。第一所工程学校，法国桥梁公路工程学校于1747年成立，随后成立的是德国1770年的第一所农业学校和1776年的第一所采矿学校。1794年，第一所技术大学，法国工科大学成立，随之而来的是工程师的职业。此后不久，在1820年至1850年间，医科教育和医科业务重新组成了系统的技术。

与此同时，在1750年至1800年间，英国从原先由王室宠儿垄断发财致富的专利向着鼓励把知识用于工具、产品及生产过程和奖励发表其发明的发明者的专利转变。它不仅触发了英国持续一个世纪的机械发明狂热，而且结束了手艺秘传诀窍和保密。

记载从技能到技术的这次巨变的伟大文献（历史上最重要的书之一）是丹尼斯·狄德罗（1713—1784年）和让·达朗贝尔（1717—1783年）于1751年至1772年间编纂的《百科全书》。这部名著试图以有序的和系统的形式和非学徒也能学会而成为"技术人员"的方式把所有工艺知识集聚在一起。《百科全书》中描述每种手艺（如纺纱和织布）的文章不是由手艺人撰写，这决非偶然。它们的撰写人是"信息专家"：受训成为分析家、数学家和逻辑家学的人——伏尔泰和卢梭都是撰稿人。《百科全书》的基本论点是，物质世界（工具、生产过程、产品）的有效成果产生于系统分析和系统地、有目的地应用知识。

但是，《百科全书》还宣传，在一种手艺中产生效果的原理会在任何其他手艺中产生效果。然而，对传统的知识人和传统的手艺人来说，这都是无法容忍的。

18 世纪没有一所技术学校旨在产生新知识,《百科全书》也是如此。甚至没有一所学校谈论把科学应用于工具、生产过程和产品,即应用于技术。这种思想不得不再等待 100 年,直到 1840 年左右,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李比希(1803—1873 年)首先运用科学,发明了人造肥料,然后发明了保存动物蛋白质——浓缩肉汁——的方法。然而,早期技术学校和《百科全书》所做的事也许更为重要。它们收集、整理和出版这种技能,亦即手艺秘传诀窍,因为它已发展了一千年。它们把经历转化为知识,把学徒期限转化为课本,把秘密转化为方法论,把实干转化为实用知识。这些都是我们开始称之为"工业革命"的要素,工业革命就是依靠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转变社会和文明。

正是有关知识含义的这种变化使现代资本主义变得不可避免和占据优势。技术变化的速度创造资本需求,远远超出了手艺人可能提供的程度。新技术还要求生产集中,即向工厂转变。知识不可能应用于成千成万小作坊和乡村家庭小工业。它要求把生产集中在一个屋顶之下。

新技术还需要大量能源,不管是水力还是蒸汽动力,它们是不可以分散的。但是,尽管重要,这些能源需要是次要的。中心点是生产几乎一夜之间从以手艺为基础转变为以技术为基础。结果是,资本家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经济和社会中心。以前,他一直是"配角"。

直至 1750 年,大型企业是政府的,而不是私人的。旧世界最早的、许多世纪以来最大的制造企业是由威尼斯政府拥有和经营的著名的兵工厂。18 世纪的"工厂",如迈森和塞夫尔瓷器制造厂,也是政府所有的。但是,到 1830 年,资本家私营的大企业在西方占据了主导地位。又过了 50 年后,到 1883 年卡尔·马

克思逝世时，资本家私营企业已渗透至每个地方，除非是西藏或阿拉伯大沙漠等世界偏僻角落。

当然，也有反对技术和资本主义的。例如，在英国或德国西里西亚就出现过暴乱。但是，这些都是局部的，持续几个星期，至多几个月，甚至没有减慢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和扩展。

工业革命，即机器和工厂系统，以同样快的速度扩展，也同样没有遭到多少抵抗。

亚当·斯密(1723—1790年)的《国富论》出现在詹姆斯·瓦特获得改进型蒸汽机的专利权的同一年(1776年)。可是，《国富论》几乎没有重视机器、工厂或整个工业生产。它描述的生产仍以手艺为基础。甚至在拿破仑战争结束40年后，即便敏感的社会观察家也没有把机器和工厂看成是中心。它们在大卫·李嘉图(1772—1832年)的经济学中几乎没起作用。更令人惊奇的是，在英国最有洞察力的社会批评家简·奥斯汀(1775—1817年)的书中都找不到工厂、工厂工人和银行家之说。她的社会(人们常常这么说)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的”。但是，它仍然完全是工业化以前的，一个乡绅和佃户、牧师和海军军官、律师、手艺人和店主的社会。只是在遥远的美洲，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7—1809年)很早就看到，以机器为基础的制造业正在迅速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但是，甚至在他的追随者中，极少有人重视他1791年的《制造业报告》，一直到他1804年去世后很久情况才有所改变。

然而，到19世纪30年代，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1850年)写出一本又一本畅销小说，描述了资本主义的法国，银行家和证券交易所在它的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又过了15年后，资本主义、工厂制度、机器在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

年)成熟的作品中成为主要内容,新阶级,资本家、无产者同样也是如此。

在《荒凉山庄》(1852 年)中,新社会及其紧张局势较之聪明能干的两兄弟(乡绅的管家的两个儿子)之间的显著差别而成了次要情节。一个在北方成了大工业家,他打算使自己选入议会从而与地主作斗争,削弱他们的权力。另一个则选择仍旧当一名毁了前程的、被打败的、不起作用的(但是资本主义前的)忠诚的"绅士"。而狄更斯的《艰难时世》(1854 年)是第一部而且最有力的工业小说,是关于一家棉纺厂激烈的罢工和严酷的阶级斗争的故事。

社会以这种从未听说过的速度转变着,造成了社会紧张局势和新秩序的冲突。我们现在知道,人们几乎普遍认为 19 世纪初工厂工人的生活和待遇,比他们在工业化前的农村作为没有土地的劳工时更糟糕,但这种说法毫无事实根据。毫无疑问,他们贫困,受到苛刻的待遇。但是,他们拥入工厂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的境况还是要比在停滞的、专制的、挨饿的农村社会最底层好。他们的"生活质量"还是好得多了。

顺便说,我们始终应该知道这一点。在工厂所在的城镇,婴儿死亡率立即下降,预期寿命立即上升,从而引起工业化欧洲的人口巨大增长。但是,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现在我们还有第三世界国家的例子。巴西人和秘鲁人大量拥入里约热内卢和利马的棚屋和市郊。不管怎么艰苦,那儿的生活要比巴西贫困的东北部或秘鲁的高原上好得多。今天,印度人说,"孟买最穷的乞丐仍然比村里的农场工人吃得好"。威廉·布莱克(1757—1827 年)在他著名诗歌"新天堂"里所提及的,希望从新的"糟透的工厂"中获得解放的"英格兰那块宜人的绿地",实际上是一个

农村大贫民窟。

但是，尽管工业化从一开始就意味着物质改善而不是马克思著名预言"贫困化"，但变化速度如此惊人，以致令人深感痛苦。用马克思创造的词来说，新阶级，"无产阶级"，"异化"了。马克思预言，他们的异化将使他们仍被剥削成为不可避免。因为他们正在完全依赖资本家拥有和控制的"生产资料"来谋生。马克思预言，这将使所有权日益集中在少数巨头手里，使毫无权力的无产者日益贫困，直到有一天该制度将在它本身的重压下发生崩溃，少数残余的资本家将要被"失去的只是锁链"的无产者所推翻。

我们现在知道，马克思是个假空想预言家。实际上与他预言的恰恰相反的事发生了。但这是事后的认识。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都一样持有他的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即使他们不一定同意他对结果的预言。甚至反马克思主义者也接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分析。有些人相信军队将控制无产阶级暴民，19世纪最大的资本家之一，美国银行家摩根(1837—1913年)就这么认为。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总会出现改革和改善。但是，19世纪末几乎每个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与马克思一样坚信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避免的阶级冲突的社会，而且事实上，到1910年，大多数有思考能力的人倾向于社会主义运动，至少在欧洲(还有日本)是如此。19世纪最伟大的保守党人本杰明·迪斯累里(1804—1881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与马克思极为相似。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者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年)也持同样看法；这激励他在1880年后制定社会法律，从而最终产生20世纪福利国家。保守的社会批评家、美国财富和欧洲上流社会的编年史家、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1843—

1916年)被阶级斗争和对阶级斗争的恐惧所困扰,因而以此为主题写出了予人以最强烈感受的小说《卡萨马西马公主》。1883年,正巧是马克思去世那年,他写了这部小说。

生产力革命

那么,是什么打败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到1950年,我们中间许多人已经知道,马克思主义在道德上和经济上都已失败(我已经在我1939年的《经济人的终结》一书中这样说过)。但是,对世界大多数人来说,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唯一条理清楚的意识形态,而且在世界大多数人看来是不可战胜的。有许多"反马克思主义者",但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什么"非马克思主义者",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已变成毫不相关的人——正如现在世界大多数人所知道的。即使那些极力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人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处于优势。

西方世界新保守主义之父,英裔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海克(1899—1992年),在他1944年的《通往农奴制之路》一书中,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将必然意味着奴役。海克接着说,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样的东西;只有"极权主义社会主义"。但是,海克在1944年没有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起作用。相反,他非常害怕它能起作用,并且认为它会起作用。但是,40年后他写的最后一本书《致命的自负》(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认为,马克思主义从未起过作用 到他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几乎每个人,特别是共产党国家中几乎每个人,都已得出同样的结论。

那么,是什么胜过了"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无产阶级的"异化"和"贫困化"以及整个"无产者"呢?

答案是生产力革命

250年前当知识改变其含义时,它开始应用于工具、生产过程和产品。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仍是"技术"的含义所在,也是工程学校里正在教授的内容。但是,在马克思去世前两年,生产力革命就开始了。1881年,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1856—1915年)第一次将知识应用于研究工作,分析和监督工作。

只要有人,就有工作。事实上,所有动物为了生存都不得不工作。而且在西方,长期以来工作的尊严一直是口惠而实不至的东西。

在荷马史诗以后大约100年出现的第二个最古老的希腊语文本,是赫西奥德(公元前8世纪)的一首名为"工作与时日"的诗,它歌颂了农民的工作。古罗马最好的诗之一是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年)的《农事诗集》,关于农民工作的组诗。虽然在东方文学传统中没有这种对工作的关心,但是中国皇帝每年要触摸一下犁以庆祝稻谷种植。

然而,在西方和东方,这些都是纯粹的象征性姿态。无论是赫西奥德还是维吉尔实际上都没有看过农民干活。在大多数有记录的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人看到过。[①] 工作不值得有学识的人、富有的人、有权势的人去注意。工作是奴隶们干的事。"每

---

① 现在仍没有工作史,另一方面,尽管从哲学角度对知识作过各种谈论,但现在也没有知识史。在今后几十年内或者至少在下一个世纪两者都应该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

www.55188.com 理想在线证券网

个人都知道”，工人能生产更多产品的唯一途径是更长时间的工作，或更辛劳地工作。马克思也持有与19世纪其他经济学家或工程师同样的这种看法。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一个有学识的富人，成为一个工人，纯属偶然。视力差迫使他放弃到哈佛大学深造，而在一家铸铁厂当工人。由于有非凡天赋，泰勒很快升为老板之一。他的金属加工发明使他很早就成了富人。促使他对工作进行研究的是，他对19世纪末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日益增长的仇恨而感到的震惊。换句话说，泰勒看到了马克思看到的东西，以及迪斯累里、俾斯麦和亨利·詹姆斯所看到的东西。但是，他还看到了他们没能看到的东西：冲突是不必要的。他着手使工人从事富有成效的工作，从而赚取相当不错的收入。

泰勒的动机不是效率，不是为所有者创造利润。他至死坚持认为，生产力成果的主要受益人是工人，而不是所有者。他的主要动机是建立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所有者和工人、资本家和无产者在生产力方面有共同利益，能够在把知识应用于工作方面而建立一种和谐关系。至今已认识到这一点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雇主和工会。

在知识史上，很少有人比泰勒更有影响。也很少有人像泰勒这样受到人们的故意误解，这样经常被错误引用。[①] 泰勒遭此恶运，部分是因为历史证明他是对的而知识分子是错的。泰勒之被忽略，部分是因为人们对工作的蔑视依然存在，首先在知

① 事实上，直到1991年查尔斯·D·雷奇和罗纳德·J·格林伍德的《弗雷德里克·泰勒：神话与现实》问世之前，没有出版过事实可靠的传记（伊利诺斯州霍姆伍德：欧文出版社）。

识分子中。泰勒作的最引人注目的分析——铲沙子,肯定不是"受过教育的人"会赞赏的东西,更不用说会认为是重要的东西。

然而,泰勒的名声遭到损害,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他把知识应用于工作的研究。对当时的工会来说这是十分令人讨厌的事;于是他们起而反对泰勒,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邪恶的毁谤名誉运动之一。

在工会的眼里,泰勒的罪名是他断言没有"技术熟练的工作"。在手工操作中只有"工作"。一切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凡愿意按分析表明应该采用的方式做工作的工人是"第一流的工人",应该享受"第一流的工资",即与经历多年学徒期的熟练工人一样,甚至获得更多的工资。

但是,在泰勒所在的美国,受人尊重的强大的工会是政府所有的兵工厂和造船厂的工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和平时期的所有军工生产都是在那里进行的。这些工会是手艺垄断者。他们发展新会员,仅局限于会员的儿子或亲戚。他们要求必须具有5—7年的学徒期,但没有系统的培训或工作研究。不允许有书面的东西。甚至没有所做工作的蓝图或其他任何图样。会员发誓保守秘密,且不能与非会员讨论工作。泰勒断言工作可以研究,可以分析,可以划分为一系列重复的简单动作,每个动作必须在其最佳时间内,以唯一正确的方法,并采用合适的工具来完成。这确实是对他们的当头一棒。所以他们污蔑他,并且成功地通过国会禁止在政府的兵工厂和造船厂从事任务研究,这个禁令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方始取消。

泰勒没有使事情有所改善,他得罪了当时的工会又冒犯了所有者。尽管他不喜欢工会,但他仍然轻蔑地反对所有者;他为所有者起的最称心的绰号是"猪"。而且,他坚持认为,工人而不

是所有者应该从科学管理中获得最大份额的收益。更糟的是，他的“第四原则”要求工作研究即使不与工人合作，也要与他们协商。最后，泰勒认为，工厂的权力一定不能以所有权为基础，只能以优越的知识为基础。换句话说，他要求的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专业管理”——而这对19世纪的资本家来说，是令人厌恶的，是“彻头彻尾的异端邪说”。他们激烈攻击他为“惹是生非者”、“社会主义者”。（他的一些最亲密的追随者和伙伴，尤其是他的得力助手卡尔·巴斯，是公开宣布的“左派”，并强烈反对资本主义。）

泰勒的原理，即所有手工工作，无论是技术性工作还是非技术性工作，都可以应用知识来分析和组织，对他的同代人来说似乎是荒谬的。而多少年来，手艺技能有其奥秘这一点已为所有人所接受。

直至1941年，这种看法乃促使希特勒向美国宣战。后者要把有生力量投入欧洲，需要有一支巨大舰队来运输军队。而当时的美国几乎没有商船队，也没有驱逐舰来保护商船队。希特勒进一步认为，现代战争需要精密光学仪器，而且数量很大；在美国，没有熟练的光学业工人。

希特勒的看法绝对正确。美国没有一支像样的商船队，它的驱逐舰很少，而且陈旧得可笑。它还几乎没有光学工业。但是，应用了泰勒的“任务研究”，美国学会如何培训完全不熟练的工人，使他们在60天或90天时间里转变成第一流的电焊工和造船工。这些工人中的许多人原先是在工业化前的环境中成长的收益分成的佃农。美国同样在几个月里把同一类型的人培养成能产生比德国人质量更高的精密光学业的工人——而且是在装配线上。

总的说来，泰勒影响最大的也许是在培训方面。

仅仅100年前，亚当·斯密就把一个国家或地区要获得必要技能以生产优质产品，至少要花50年时间（更可能是整整一个世纪）视为当然——他的例子是波希米亚和萨克森州生产乐器和在苏格兰生产丝织品。70年后，在1840年左右，德国人奥古斯特·博尔西希（1804—1854年）——英国境外第一批生产蒸汽机车的人之一——创建了至今仍是德国的学徒制度，这种制度把在师傅手下的工厂实践经验与学校的基础知识结合起来。这迄今仍然是德国工业生产力的基础。但是，即使是博尔西希的学徒期，也要3—5年。然后，首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但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把泰勒的方法系统地应用于在几个月里培养"第一流的工人"。这比其他任何因素更能解释为什么美国能开展战时生产，最终打败日本和德国。

现代史上所有早期经济大国——英国、美国、德国——都是通过在新技术领域居领先地位而崛起的。战后的经济列强首先是日本，然后是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都把自己的兴起归功于泰勒的培训。它使它们能很快就让基本上仍是工业化前的、低工资的劳动力拥有世界级的生产力。战后时期，泰勒的培训成了经济发展唯一真正有效的手段。

将知识应用于工作，迅速提高了生产力[①]。曾有过几百年时间，工人制造商品和运送商品的能力没有任何提高。机器创造了更大的能力。但是，工人本身的生产能力却并不比他们在

---

① 这个词本身在泰勒时期是无人知晓的。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开始使用它时，它仍然是人们所不熟悉的。直至1950年，最具有权威性的英语词典《牛津简明词典》也还没有以现在的含义列入"生产力"这个词里。

古希腊作坊中，在罗马帝国筑造道路时，或在生产给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带来财富的受到人们高度珍视的呢料时高出多少。

但是，泰勒开始将知识用于工作，不出几年生产力就开始以每年3.5—4%的比率提高，这意味着每18年左右翻一番。自从泰勒开始以来，所有先进国家的生产力提高了大约50倍。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扩展之上，发达国家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方面都有了提高。

在提高的生产力中，一半体现为购买力增加的形式，即生活水平提高的形式。但是，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体现为休闲增加的形式。迟至1910年，发达国家工人的工作时间依旧与以前一样多，即一年至少工作3000小时。迄至今天，甚至日本人一年也得工作2000小时，美国人1850小时左右，德国人至多1600小时，而他们每小时生产的却是80年前的50倍。在提高的生产力中，其他较大的份额体现为保健和教育的形式，前者在发达国家中从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增加到8—12%，而后者从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左右增加到10%或者甚至更多。

正如泰勒预言的，大多数的增长份额是由工人即马克思所称的无产者取得的。亨利·福特（1863—1947年）于1907年推出第一辆廉价的T型汽车。然而，它只是相对于市场上其他汽车来说是“便宜的”，如按平均收入来计算，它的价格相当于今天一架双引擎的私人飞机。亨利·福特的T型汽车的750美元的代价要花去美国一个全日制产业工人3—4年的收入，因为当时一整天的工资是80美分，而且当然没有任何“补助”。甚至当时的美国医生也很少有每年赚500美元以上的。今天，美国、日本或德国的一位加入工会的汽车工人，每周只工作40个小时，获

50000美元的年薪和补助(付税后为45000美元),这大约相当于美国今天一辆廉价新车价格的8倍。

到1930年,泰勒的科学管理,尽管遭到工会和知识分子的反对,但还是在发达国家迅速传播。结果是,马克思所称的"无产者"成了"有产者"。制造业的蓝领工人,"无产者",而不是"资本家",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业革命的真正受益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高度发达国家里无法取胜的原因,而马克思曾预言到1900年在这些国家会发生"革命"。它说明了1918年后甚至在中欧被打败的国家里也没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而在这些国家里有的是痛苦、饥饿和失业。它解释了为什么大萧条没有导致共产主义革命,而这是列宁和斯大林,以及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满怀信心所期望的。在那之前,马克思的无产者没有成为"富裕的人"。但是他们已经成为中产阶级。他们变得富有成效了。

"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是常被称颂为"现代世界创始人"的三位一体。如果世界还有正义的话,马克思应该被排除而由泰勒所替代。不过,泰勒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乃是件小事,而严重的事情是,只有极少数的人认识到,是将知识应用于工作引发了过去100年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从而创造了发达经济国家。技术专家把功劳归于机器,而经济学家却把功劳归于资本投资。但是,这两者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头100年,即1880年以前,与在此以后同样是充裕的。在技术或资本方面,第二个100年与第一个100年没有多少差别。但是,在头100年里,工人的劳动生产力绝对没有提高,因而工人的实际收入也没有多少增加,工作时间也没有减少。造成第二个100年有如此大的差别的原因,只能解释为将知识应用于工作的结果。

新阶级——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的生产力只能通过将知识应用于工作来提高。机器和资本都做不到这一点——实际上，如果单单将它们用于工作，很可能会阻碍生产力发展而不是创造生产力（在第四章中将进一步进行论述）。

在泰勒刚开始研究的时候，每10个劳动人民中有9个在制造业、农业、采矿业和运输业中从事手工劳动，制造或运送东西。从事制造和运送的人的生产力仍然以历史的3.5—4%的比率提高，而美国和法国的农业，甚至更快。但是，生产力革命早已结束了。40年前，在50年代，从事制造和运送工作的人在发达国家依然占绝大多数。到1990年，他们已缩减到占劳动力的五分之一。到2010年，他们将不会超过十分之一。提高制造业、农业、采矿业和运输业手工劳动者的生产力本身再也不能创造财富。生产力革命已成为它自身成功的牺牲品。从现在起，重要的是非手工劳动者的生产力。这需要将知识应用于知识。

管理革命

在我1926年中学毕业后决定不读大学而去工作时，我的父亲非常苦恼；我们的家庭长期以来一直是律师和医生的家庭。但是，他没有称我是“退学生”。他不想改变我的想法，而且他没有预言我决不会有出息。我是个负责任的成年人，想作为一个成年人去工作。[1]

---

① 我当时业余还获得了一个博士学位，这更多的是想惹父亲生气，而不是想这样一来会对我的生活和事业带来任何差别。

30年后，当我的儿子满18岁时，我几乎强迫他去上大学。像他的父亲一样，他想成为成年人中的佼佼者。像他的父亲一样，他感到在学校的凳子上坐了12年没有学到什么，而且再在学校里坐上4年时间多学一点的机会不是特别大。像他当年的父亲一样，他注重行动，而不注重学习。

可是，到1958年，在我从高中毕业生转为一家出口公司的实习生以后的32年，大学学位已成为必需的资格，成了几乎所有职业的护照。在1958年，对一个在富裕家庭长大而又在学校里学得很好的美国男孩来说，不上大学就是“退学”。当年，我的父亲毫不费力地为我在一家信誉卓著的商行里找到一份实习生工作。30年后，这种公司也不会接受一名高中毕业生当实习生了。它们会说“去上四年大学——然后很可能你还应该继续进研究院”。

在我父亲一辈（他生于1876年），上大学是富家子弟或极少数贫穷但有突出才华的年轻人的事（就像他那样）。

在19世纪美国取得商业成功的人中间，只有一个人上过大学：J·P·摩根进哥廷根大学学数学，但一年后就退学了。其他人中甚至上过高中的也寥寥无几，更不用说中学毕业了。在1910年至1920年左右的美国社会编年史家，伊迪丝·华顿的小说中，纽约古老的富裕的家庭子弟确实上哈佛大学或哈佛法学院。但是，几乎没有一个当律师。高等教育是一种奢侈品，装饰品，是消磨成人后最初几年时光的一种愉快的方式。

到我那个时候，上大学已经是值得想望的事。它提供社会地位。但是，在一个人的生活和事业中，它绝非必需，也无多大帮助。在我第一次研究一家主要的商业公司，通用汽车公司[①]时，该公司的公关部竭力隐满以下事实：他们相当多的高级行政

管理人员上过大学。当时，最好是先当机工，然后逐步晋升。[②]直到1950年或1960年，(在美国、英国、德国——虽然在日本已不是如此了)达到中产阶级收入水平的最快捷途径仍然并不是上大学，而是16岁时到一个加入工会的大规模生产的工业中去工作。一个人在那儿工作几个月以后就能获得中产阶级收入水平。这是生产力迅速提高的结果。这些机会现在几乎已一去不复返了。[③]现在没有正式的学位，几乎不可能达到中产阶级收入水平。学位是获得知识的证明，而这种知识只能在学校里系统地获得。

250年前开始的知识含义的变化，改变了社会和经济。正规的知识被视作关键的个人资源和关键的经济资源。**知识是今天唯一有意义的资源**。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即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没有消失。但它们已成为次要的了。只要有知识，就能得到它们，而且能轻易地得到。在这一新含义下，知识是一种效用，是获得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手段。

上述这些发展，不管是否值得想望，都是对一种不可逆转的变化作出的反应：**知识正在被应用于知识**。这是知识转变的第三阶段，或许也是最后阶段。提供知识以找出应用现有知识创造效益的最佳方法，事实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管理**。但是，知识正在被系统地、有目的地用来界定需要什么新知识，它是否可行以及为了使知识产生效益必须做些什么。换句话说，知识正在被

---

① 发表在我的《公司的概念》(1946年)一书中。

② 这个故事在我的《旁观者历险记》(1980年，1991年再版)一书的"艾尔弗雷德·斯隆"一章中有所叙述。

③ 关于这一点，参见本书第三章，尤其是"劳动力仍是一种资产吗?"这一节。

用于系统创新。[1]

知识演变的第三个变化可以称作管理革命。像前两次变化（知识被用于工具、生产过程和产品，以及知识被用于人的工作）一样，管理革命已席卷全球。产业革命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在全世界占主导地位花了100年，生产力革命在全世界占主导地位花了70年左右，从188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管理革命在全世界占主导地位花了不到50年（从1945年到1990年）。

大多数人听到“管理”这个词时，仍然听到的是“企业管理”。管理确实首先以目前的形式出现在大型企业组织中。大约50年前，我开始研究管理时，我也集中精力于企业管理。[2] 但是，我们很快认识到，所有现代组织，不论是企业还是非企业，都需要管理。事实上，我们很快认识到，非企业组织更需要管理，不管它们是非赢利的非政府组织（在本书中我建议称之为“社会部门”）还是政府机构。这些组织最需要管理，就是因为它们缺乏企业所赖以存在的“基本”纪律。美国首先认识到管理不局限于企业。但是，这一点正在为所有发达国家所接受（以西欧、日本和巴西接受我1990年的《管理非赢利组织》一书为明证）。

我们现在知道，管理是所有组织的通用职能，不管它们的具体任务是什么。管理部门是知识社会的通用机构。

管理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人们常常问我，我认为谁是最

① 关于这一点，参见我的《创新与工商企业家》一书（1985年）。

② 我的《管理的实践》（1954年）一书第一次把管理确定为一门学科。书中的大部分论述是关于企业管理的，大多数的例子也是如此。

好、最伟大的管理人员。我的回答始终是，“4000多年前构想、设计和建造埃及第一座金字塔而至今依然屹立的人”。但是，管理是一种具体工作，这一点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被认识到，而且当时只是少数人有这种认识。管理作为一门学科仅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直到1950年，世界银行开始为经济发展贷款时，“管理”这个词甚至还不在它使用的词汇中。事实上，管理是在几千年前发明的，但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才被发现。

它之所以被发现的一个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的经历以及特别是美国工业的成就。但是，对管理被普遍接受这一点来说，同样重要的也许是日本1950年以来的成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不是一个“不发达”国家。但是，它的工业和经济几乎全部被摧毁；它几乎没有国内技术。该国的主要资源是，它乐意采纳和改造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的管理（以及特别是培训）。从美国结束对日本占领的50年代到70年代的20年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和技术先导者。

50年代初朝鲜战争结束时，韩国遭受的破坏甚至比7年前的日本还要厉害。它一直是一个落后国家，特别是因为日本人在其35年的占领期间系统地阻止韩国企业和高等教育的发展。但是，通过利用美国大专院校培养的聪明能干的年轻人以及通过引进和应用管理，韩国在25年里成为高度发达的国家。

随着管理的强劲扩展，对管理真正含义的理解日益深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大战结束后不久，我开始研究管理时[1]，经理的定义是“对下属的工作负有责任的人”。换句话说，经理

[1] 关于这一点，参见我1946年的《公司的概念》一书。

是“老板”，管理是地位和权力。这很可能仍然是许多人在谈到经理和管理时在他们心目中的定义。

但是，到 50 年代初，定义已经改为“经理是对人员的工作情况负责”。我们现在知道，这也是非常狭隘的定义。正确的定义是“经理是对知识的应用和成绩负责”。

这个变化意味着，我们现在明白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资源。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们是约束因素。没有它们，甚至知识也无法生产。没有它们，甚至管理也无法施行。在有效管理的地方，即在知识应用于知识的地方，我们总能获得其他资源。

知识也成为最重要的资源而不是某种资源，正是这一点使我们的社会变成“后资本主义社会”。它改变了，而且是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它创造了新的社会动力。它创造了新的经济动力。它创造了新的政治。

从知识到学科

向知识转变的所有三个阶段——工业革命、生产力革命、管理革命——的基础是有关知识含义的根本改变。我们已经从知识向各种学科发展。

传统知识是通用的。我们现在认为的知识必然是非常专门的。以前我们从不说一个“有知识”的男人或女人。我们说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受过教育的人是通才。他们有足够的知识谈论或者书写许多事情，足够他们去理解许多事情。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去做任何一件事。正如俗话所说，你可以要一位

受过教育的人作为一个客人与你一起进餐，但你不会要他或她单独与你待在一个荒岛上，在那儿你需要的是一个知道如何做事的人。事实上，在今天的大学里，传统的“受过教育的人”根本不被认为是“有知识的人”。他们被人看不起，被视作半吊子。

马克·吐温(1833—1910年)1889年写的《亚瑟王朝廷上的美国佬》一书的主人公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他肯定不懂拉丁文和希腊文，很可能从来没有看过莎士比亚作品，甚至不很了解《圣经》。但是，他知道如何干一切机械活，甚至包括发电和制造电话。

对苏格拉底来说，知识的目的是达到自知之明和自我发展。效果是内在的。对他的对手普罗塔哥拉来说，效果是知道说什么和如何说得好的能力。用当代的话来说，这是“形象”。在2000多年里，普罗塔哥拉的知识概念在西方学术中占主导地位，界定了知识。中世纪的三学科，至今构成我们所说的“文科教育”基础的教育制度，由语法、逻辑学和修饰学组成。它们是决定说什么和怎样说所必需的工具，而不是决定做什么和怎么做所必需的工具。禅宗的知识概念和孔子的知识概念是相似的，这两种概念统治了东方的学术和文化几千年。第一种着重于自知之明，第二种，像中世纪三学科一样，着重于中国的对应于语法、逻辑学和修饰学的东西。

我们现在认为的知识是知识显示于行动之中。我们现在所说的知识是在行动中有效的信息，着重于效果的信息。效果在人体之外，在社会和经济中，或在知识本身的提高之中。

为完成任何事情的这种知识必须是高度专门化的。这就是为什么传统——始于古人，但仍在我们所说的“文科教育”中存留下来——将它贬低到技能或手艺地位的原因。它既不能学，

也不能教。它也不包含任何一般原理。它是具体的、专门化的。它是经验而不是学问，是培训而不是学校教育。但是，我们现在不把这些专门化知识说成“手艺”。我们说是“学科”。这是知识史上与任何有记录的变化同样巨大的变化。

学科将一种“手艺”转化为方法论，如工程学、科学方法、数量方法或医生的鉴别诊断。每一种方法论将特定经验转化为体系。每一种方法论将趣闻转化为信息。每一种方法论将技能转化为能够教和能够学的东西。

从知识向种种学科的转变给予知识以创造一个新社会的权力。但是，必须在专门化的知识和成为专家的知识人的基础上建构这种社会。这样才赋予他们权力。但是这样也提出了一些基本问题：价值观、梦想、信仰问题，这是所有能使社会凝聚在一起并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东西。正如本书最后一章要论述的，它还提出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在学科社会中，怎样才算是有知识的人？



组织的社会

一个组织是由人组成的团体，由为了一项共同的任务而在一起工作的专家组成。不像“社会”、“社区”或“家庭”——这些传统的社会集体——这种组织是有目的地设计的，而不是根据人的心理本性和生物需要。可是，只要是人的创造物，就能持续下去——也许不是永久，但是相当长的时期。

一个组织总是专业化的，由其任务来界定。相比之下，社区和社会由使人聚集在一起的一种联系（不管是语言、文化、历史还是地区）来界定。一个组织只有在其集中精力于一项任务上时才有效率。交响乐团没有试图医治病人，它演奏音乐。医院照顾病人，但没有试图演奏贝多芬的作品。为攀登喜马拉雅山顶峰而建立的登山俱乐部不关心尼泊尔的无家可归的人，不管他们的境况有多困难。学校集中精力搞好教学，企业集中精力生产和销售商品与服务，教堂集中精力使罪人改邪归正和拯救灵魂，法院集中精力解决冲突，军队集中精力于战斗和战争，美国心脏协会集中精力研究和预防心脏退化和血液循环疾病。社会、社区和家庭体现存在；而组织则在于行动。

“组织”已成为日常用语。在某人说，“在我们的组织里，一切事情应围绕顾客转”；或者，“在我们的组织中，值得考虑的是

按预算办事";或"在这个组织中,他们从不忘记你犯的错误"时,人们点头表示赞同。在所有发达国家里,社会已成为一个组织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社会任务是在一个组织里和由一个组织完成的,如工商企业和工会;武装部队和医院;学校和大学;一大批社区服务机构。其中有些是政府机构,还有许多是"社会部门"的非赢利机构(特别是在美国)(参见第九章)。但是,还有交响乐团——在美国有几百个——博物馆、基金会、贸易协会、维护消费者利益的机构、教堂以及许多其他机构。

可是,在美国——或在其他任何地方——,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有人谈起"组织"。英国权威词典《简明牛津词典》在其1950年版本中没有按它目前的含义收录这个词。政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谈论政府和企业,谈论社会、部落、社区和家庭。但是,"组织"仍然得进人政治、经济和社会学的词汇表。

这提出了三个有关问题:

●组织履行什么职能?为什么需要组织?

●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中,组织基本上依然被忽视的原因是什么?

●最后,确切地说,"组织"是什么?它如何发挥作用?

组织的职能

组织的职能是使知识富有成效。在所有发达国家里,由于从知识到学科的转变,组织已成为社会的中心。学科越是专门化,越是有效。

最好的放射学家不是最了解医学的人;他们只是知道如何通过X光、超声波、人体扫描机和磁共振取得人体内部图像的专家。最好的市场研究人员不是最了解生意的人,而只是最了解市场研究的人。

可是,放射学家和市场研究人员本身没有成果。他们的工作只是"投人"。它不会成为成果,除非与其他专家的工作结合在一起。学科本身是不结果实的。它们只有组合成知识,才能富有成效。使之成为可能是组织的任务,这就是它的存在的理由及其职能。

如今,我们肯定把专门化搞得过头了——在学术界这种情况最糟。但是,对策不是设法使专家接受"文科教育",从而使他们成为"通才"(正如我多年来主张的那样)。我们已经发现,这样做没有用。专家只有当专家时才能起作用;知识工作者必须起作用。最起作用的知识工作者是目不旁视,学有专攻的专家。神经外科医生实践越多,技能越好。法国号吹奏者不拉小提琴也不应拉小提琴。专家需要置于知识的广泛领域的影响之下(在第十二章还要进一步陈述理由)。但是,他们须要干专家的工作,并集中精力当好专家。为了这样能产生良好的成果,组织是需要的。

组织:一种独立的种

组织在几十年前就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实,但是为什么学者要花那么长时间承认它?答案将告诉我们许多关于组织以及组织到底是什么。

律师不关心这种新现象，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组织"同"社区"或"社会"一样不是法律术语。"组织"也不是经济术语。有些组织追求经济目标，影响经济，反过来又为经济所影响(如，企业和工会)。其他许多组织(教会或童子军)不在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内。但是，为什么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大多忽视一种对政体和社会有如此深刻影响的现象？

在社会学创始人，法国人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年)的著作中没有提到过组织。但是，在他那个时代没有任何组织。然而，在现代社会最有影响的非马克思主义评论文章、德国费迪南德·特尼施(1853—1936年)1888年的《社区与社会》中，以及在现代社会学的保护神，德国马克斯·韦伯(1864—1920年)和意大利维尔弗雷多·帕累托(1848—1923年)的著作中，也没有提到过组织。所有这三个人都深刻意识到(并且尖锐批评)大企业和大工会的兴起，但是完全没注意作为新现象的组织。而且在更近的社会科学书中，也同样忽视了组织。

组织之所以被忽视的解释恰恰因为它对政体和社会有深刻影响。组织同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仍然假定为"正常"的事物不相一致。他们仍然假定，正常的社会是整体的而不是多元的。但由种种组织构成的社会基本上是多元的。组织要引起政治学家或社会学家的注意，它就得被当作反常事物，甚至危险疾病来对待。

美国著名的劳动经济学家约翰·康芒斯(1862—1945年)1924年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一书是一个非常适当的例子。康芒斯认为，就19世纪末故意错误解释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最高法院而言，组织以工商业公司的形式出现，是由一个"阴谋集团"注入美国法人团体的一剂毒药。此举之愚蠢对任何读

者来说，都应该是很明显的；其他每个发达国家在没有最高法院或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帮助之下同样接受公司——实际上，美国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后一个这样做的国家(甚至比日本还要晚)。可是，康芒斯对1924年的读者来说是有意义的。组织是一种变型，以致它只能用某种险恶的阴谋来解释。这本书成了畅销书，成了几年后新政时期“商人”的“圣经”之一。

用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1922年—)在其1962年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创造的词来说，组织的出现是“范式的转变”。它与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知道的现实相悖。正如库恩所指出的，要花30—50年，即一直到新一代长大并接班后，学术界才看到了这个新现实，更不用说接受了。

至今仍对组织极少注意，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人们看到并研究分析军队、教会、大学、医院、企业和工会，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而且非常详细。但是，其中每一种都被认为是独特的。甚至现在，在我告诉采访者，我的咨询业务包括所有这些机构已有40多年时，他们仍会感到很意外。直到最近才认识到，它们都属于同一种类(species)；它们都是“组织”。它们是人为的环境，是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生态”。它们之间的共同处多于不同处。正如前面说过的，大多数人——以及几乎美国境外的每个人——在听到“管理”时仍然听到的是“企业”管理，没有认识到管理同样是属于所有组织的通用职能。[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管理的出现才使我们看到组织是一种不同的、互不关联的事物。

---

① 正如在我1990年的《管理非赢利组织》一书中所指出的，非赢利部门的很多人依然把教会看作教会，把医院看作医院，把社区服务机构看作社区服务机构，而没有把它们都看作属于同一类、属于非赢利组织。

它既不是“社区”、“社会”、“阶级”，也不是“家庭”，而这些都是社会学家所知道的现代合成者。但是，它也不是“宗族”、“部落”、“大家庭”或人类学家、人种志学者和社会学家所知道和所研究的任何其他传统社会合成者。组织是一种不同的新事物——但它究竟是什么呢？

组织的特色

组织是有专门目的的机构。它们之所以有效率是因为它们集中精力于一项任务。

如果你到美国肺协会去说，“90%的美国成年人(顺便说一下，人们总是说90%)脚指甲往肉里长；我们需要你们提供在研究、卫生教育和预防方面的知识技能以消灭这种可怕的灾害”，你肯定会得到这样的回答：“我们只对臀部和肩膀之间的部位感兴趣，即使在这个部位，也只对部分结构感兴趣。”

这说明了为什么美国肺协会、美国心脏协会或健康领域的其他任何协会有成果的原因。社会、社区和家庭必须处理出现的任何问题。在一个组织中，这样做是“多样化”。而在一个组织中，多样化就是分裂。它破坏了一个组织的工作能力，无论它是企业、工会、学校、医院、社区服务机构还是教会。组织是工具。如同使用其他工具，越是专门化，它履行特定任务的能力就越强。

由于组织由专家组成，每个专家都有其狭窄的知识领域，因此组织的任务必须非常明确。组织必须是专一的，否则它的成员会无所适从。他们会听凭自己的专长办事而不用之于共同的

任务。他们会各自以他们的专业界定"成果"。他们会各自将其价值观强加于组织。只有一项明确的、集中的共同任务才能把组织凝聚在一起,并使之能产生出成果。没有明确的、集中的任务,组织很快就会失去可信性。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美国新教在战后时期所遭遇的,作为"社会基督教"的一种结果。1900 年左右,它们将巨大资源集中在迅速工业化的城市社会的需求上,几乎没有比美国新教教会更成功的战略了。美国教会没有像欧洲教会那样仅以微弱多数取胜,社会基督教是一大原因。可是,社会行动不是基督教会的任务。它的使命是拯救灵魂。然而,由于社会基督教取得如此成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教会越来越多地献身于"社会事业",自由主义新教最后利用基督教的装饰进一步进行社会改革,促进社会立法。教会成了社会机构。它们变得政治化了——而且迅速失去了凝聚力、感染力和教徒。

现代组织的原型是交响乐团。乐团 250 个音乐家,每个都是专家,而且是高级专家。可是,大号本身不形成乐曲;只有管弦乐队才能。管弦乐队演奏只是因为 250 名音乐家有相同的总谱。他们使个人的专业服从共同任务。他们在任何特定时间只演奏一支乐曲。

组织的成果总是显露在外的。社会、社区和家庭是独立自足的。它们为自己而生存。但是所有组织为产生显露在外的成果而存在。

在企业里,只有成本。"利润中心"(唉,这是一个我多年前杜撰的术语)是用词不当。在企业里,只有成本中心。只有在顾客买了产品或服务并付了钱时才有利润。医院的成果是一个能

够走回家去的治愈了的病人(他热诚希望再也不必回医院去)学校或大学的成果是毕业生,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将其学到的知识用于工作。军队的成果不是演习和晋升将军,而是制止战争或赢得战争 教会的成果甚至不在尘世。

这意味着组织的成果总是与每个成员所作的贡献相距甚远。甚至在个人贡献(护士或理疗法专家贡献)与成果(治愈病人)密切相关的医院也是如此。但是,甚至在医院里,许多专家不能确定其对任何特定成果的贡献。X光技术人员在病人的痊愈或康复中有多大的贡献?临床实验室又如何?膳食学家又如何?

在大多数机构里,个人贡献完全为任务所淹没并消失在任务中。在交响乐团,只有组织能有成果。如果公司破产,最好的工程部又有什么用呢?可是,除非工程部是一流的、富有献身精神和努力工作的,否则公司有可能破产。换句话说,组织中的每个成员作出(至少在理论上)重要贡献,没有它就没有成果。但是,没有一个人独自创造这些成果。

这要求,作为组织工作的基本先决条件,任务和使命必须非常明确。成果需要明白无误地予以界定——而且,可能的话,计量地予以界定。

这还要求,组织根据明确的、已知的、客观的目标评估和判断自己及其工作情况。社会、社区和家庭都不必这样做,也做不到这一点。它们的检验标准是生存而不是成绩。

加入组织总是一项决定。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但是,即使在几乎是强制性加入组织的地方(如在许多世纪里,在欧洲所有国家,强制加入基督教的几乎是少数犹太人和吉卜赛人),也要小心翼翼地装出决定加入的样子。教父在婴儿洗礼

仪式上保证孩子自愿加入基督教。

离开组织(如黑手党、日本大公司、耶稣会)可能很困难,但总是可能的。一个组织越是成为知识工作者组织,离开它到其他地方去就越容易(在本章后面关于"雇员社会"一节中还要进一步论述)。

因此,不像社会、社区和家庭,一个组织总是竞争其最主要的资源:合格的、知识渊博的、富有献身精神的人。

这意味着组织必须到市场去销售它们的成员资格,不管是雇员、自愿者还是领受圣餐者,完全像它们销售其产品和服务那样,或许程度还要大一些。它们必须吸引人、留住人、赏识和奖励人、动员人、为人们服务且使他们满意。

由于现代组织是知识专家的组织,它必须是同等人、"同事"、"伙伴"的组织。没有一种知识比另一种更高。每种知识的地位由它对共同任务的贡献而不是由任何固有的优势或劣势来决定。"哲学是科学之冠"是一条旧语录。但是,为了除去肾结石,你需要泌尿科专家而不是逻辑学家。现代组织不能是"老板"和"下属"组织。它必须组成一支"伙伴"队伍。

组织总是有管理的。社会、社区和家庭可能有"领导人"——组织也是如此。但是,组织,而且只有组织,是有管理的。管理可能是马马虎虎的、断断续续的,例如,美国郊区学校的家长教师联谊会就是如此。选出的干事每年只花几个小时处理该组织的事务。或者管理对相当大的一群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全日制的费力工作,就像在军队、工商企业、工会、大学和其他许多组织中一样。但是,必须有作决定的人,否则什么也干不成。必须有对组织的使命、精神、工作和成果负责任的人。必须有一个掌握"总谱"的"指挥"。必须有使组织集中精力于它的使命,

制定完成使命的战略和确定成果是什么的人。这种管理必须有相当大的权威。知识组织中的管理工作不是发号施令，而是指导。

最后，为了能够开展工作，组织必须是自治的。在法律上，它可能是一个政府机构，像欧洲的大学、美国的州立大学或欧洲的医院。可是，在实际运作中，这些组织必须能“做自己本职的事”。如果它们习惯于执行“政府政策”，它们就立即停止履行自己的职责。

所有这一切，说起来都是显而易见的。可是所有这些特点都是新的，实际上是这个新社会现象——组织——所独有的。

组织是破坏稳定的因素

社会、社区和家庭都是保护机构。它们努力保持稳定，防止(或至少缓延)变化。但是，后资本主义组织社会的组织却是一个破坏稳定的因素。因为它的职能是将知识用于工作(用于工具、生产过程、产品，用于工作，用于知识本身)，所以它必须为适应不断的变化而安排有序。它必须为适应创新而安排有序〔正如奥地利裔美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年)所说，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它必须为适应系统地放弃已确立的、已习惯的、已熟悉的、令人舒适的事物(不管是产品、服务、生产过程、人际关系、社会关系、技能还是组织本身)而加以组织安排。这是知识的本性：变化快，今天的必然变成为明天的荒谬。

与知识相对照，技能的变化则缓慢而且很少。如果石匠苏格拉底今天死而复生，到一个石场工作，唯一重大的变化那就是

他必须制造带有十字架的墓碑而不是刻有赫耳墨斯神像的石柱。工具仍然是一样的，只是现在工具的把手里装有电池。[1]在谷登堡第一次使用活字后400年，在印刷行业几乎没有变化（在蒸汽机诞生，即工程学被应用于技能之前）。在整个历史上，学会一种手艺的手艺人，也就学会了在他们17或18岁当5—6年学徒后的一生中必须使用的一切东西。在后资本主义社会里，可以有把握地假定，有知识的人必须每4—5年获得新的知识，否则就会过时。

对知识产生最深刻影响的变化，一般来说不是来自它自己的领域（如印刷的例子所表明的）。制药业正在由于产生于遗传学和生物学的知识而发生根本变化，40年前在制药实验室里工作的人，几乎没有人听说过这些学科。对铁路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铁路的变化，而是来自汽车、卡车和飞机。

社会革新，在创造新知识和淘汰旧知识方面，与新科学或新技术一样重要。事实上，社会革新常常更为重要。19世纪最为自豪的机构——商业银行出现目前世界范围的危机，原因不是计算机或其他任何技术变化，而是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即商业票据，一种古老而至今仍鲜为人知的金融手段，可以被非银行机构用于为公司筹资。这很快使银行失去它垄断了200年并从中获得大部分收入（商业贷款）的业务。最大的变化极有可能是，在过去40年里，宗旨明确的创新（技术的和社会的）本身已成为有条理的学科，它既可以教，又可以学。[2]

以知识为基础的迅速变化，不像现在依然普遍认为的那样，仅仅局限于企业。如果工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又一成就）要生存下去，这种迅速变化显然是需要的。在战后50年里，没有任何一种组织比军队的变化更大，尽管制服和军衔依然照旧。武器

发生了彻底变化，1991年的伊拉克战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军事学说和观念的变化甚至更为巨大。组织结构、指挥结构、关系和责任都起了变化。

一个内含的意义是：今天的每一个组织必须把对变化的管理纳入其结构之中。

组织必须把有条理地放弃它所做的一切事情成为其结构的一部分。它必须学会每隔几年询问有关每个过程、每种产品、每个程序、每项政策的情况："如果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做，根据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现在我们要不要这样做呢？"如果答案是"不"，组织不得不问："那么我们现在做什么？"它必须做某一件事，而不是仅仅进行另一项研究。事实上，组织越来越必须计划放弃而不是试图尽可能延长成功的政策、做法或产品的寿命——至今只有日本少数大公司正视这个问题。[③]

但是，创造新的这项工作也必须成为组织的组成部分。具体来说，每个组织必须使三种系统的做法成为其结构的组成部分。首先，它需要不断改善所做的每件事情（这个过程日本人称之为改善）。历史上的每个艺术家都不断改善，即妥善安排、持续不断的自我修养。但是至今只有日本人（也许因为他们的禅宗传统）将它体现在工商企业组织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虽然没有体现在他们唯一抵制变化的大学）。改善的目的是改善产品

---

① 西班牙靠近古城恩波里亚的布拉瓦海岸上有一个小博物馆，它展出公元2～3世纪手艺人使用的工具。今天的一个手艺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想出使用它们的办法，他几乎不会注意到这些工具已有2000年的历史。

② 关于这一点，参见我1985年的《创新和工商企业家》（伦敦：海涅曼出版社）。

③ 关于这一点，参见我1992年的《未来的管理》（牛津：巴特沃思—海涅曼出版社）一书中第二十四章"日本新企业战略"。

或服务，使它在两三年内成为真正不同的产品或服务。

其次，每个组织必须学会开拓，即从自己的成功中开发新的用途。又是日本企业至今在这方面干得最出色，日本消费电子产品制造商从美国发明的磁带录音机中开发出一个又一个新产品就是明证。然而拓展成果也是美国“乡村”教会的力量源泉之一，它们的迅速增长正开始抵消传统的“社会基督教”和原教旨主义教会的逐步衰落。

最后，每个组织必须学会创新，而且创新能够而且应该组成一个系统的过程。

当然，人们回到放弃，整个过程又将重新开始。

除非这样做，否则以知识为基础的后资本主义组织将很快发现自己已过时，将很快发现自己丧失运作能力，以及吸引和稳住它所依赖的知识专家的能力。

另一个内含的意义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必须下放权力。它的组织必须能迅速作出决定，必须建筑在与运作、市场、技术和社会、环境、人口统计及知识密切结合的基础上，这些都必须被看作并用作为创新的机会。

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就这样不断破坏社区、使之混乱和不稳定。组织必须改变对技能和学科的需求。正当每所工科大学准备教物理时，我们需要的却是遗传学家。正当银行在作了信用分析后，它们需要投资人。企业关闭工厂，而这些工厂的地方社区正赖以就业，或以懂得计算机模式的25岁的“头脑清新办事效率高的青年”去代替花了多年时间学习手艺、头发灰白的模型制造工。在妇产科学的知识基础和技术发生变化时，医院把婴儿分娩转给独立的“出生中心”。由于医疗知识、实践和技术的变化而使仅有不到200张床位的医院缺乏经济效益而且无

法提供一流护理时，我们必须能够将它关闭了事。同样，如果人口统计、技术或知识的变化形成一种不同的规模或原理而成为运作的先决条件，为了使学校或大学解除其社会职能，我们必须能够关闭学校或大学，不管它如何深深扎根于地方社区和如何深受社区的爱戴。

但是每一种这样的变化都造成社区的破坏、混乱、失去连续性。每一种这样的变化都是"不公平的"。每一种变化都破坏稳定。

现代组织还造成社区的另一种紧张状况。它必须在社区中运行。它的成员生活在这个社区中，说社区的语言，把孩子送到社区的学校去上学，在社区范围内投票，向社区纳税。他们必须熟悉社区。他们的成果也在社区里。可是，组织不能使自己淹没在社区中或隶属于社区。它的"文化"必须超越社区范围。

正如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1914年—）在他1959年的《无声的语言》一书中所指出的，在每个社会中，重要的交往不是言语交往而是文化交往——通过人的站立方式、行走方式、行动方式。霍尔指出，一个德国医生向德国病人传递信息，采用完全不同于英国、美国或日本医生的示意方式。美国文职公务员，如果列席地方杂货食品连锁店讨论下星期广告推广的会议，会对他们自己说的华盛顿言语摸不着头脑。但是，他们很容易理解一位中国同事告诉他们的有关北京官僚要弄阴谋诡计的事。尽管我们所说"管理风格"有不同之处，但是日本大公司的运转非常像美国、德国或英国的大公司。

是由任务的性质，而不是由完成任务所在的社区，决定组织文化。每个组织的价值体系由其任务决定。世界上的每所医

www.55188.com 理想在线证券网

院、每所学校、每家企业必须相信，它正在做的事是对其所在的社区和社会的重要贡献（总之，是社区其他所有人所依赖的贡献） 为了完成任务，它必须用同样方式组织起来和进行管理。因此，在它的文化中，组织总是超越社区范围。如果组织的文化与它所在的社区价值观发生冲突，组织的文化将获胜，否则组织不会对社会作出贡献。

一句老话说，“知识无疆界”。可是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什么“跨国”组织，甚至没有许多“多国组织”。但是，每个知识组织必定是非国家的、非社区的。即使完全置身于地方社区中，用极权主义者特别喜爱的一种表述词语来说，它是“无根的世界性组织”。

雇员社会

仅仅50年前，“雇员”，除了作为法律术语，极少在英语或美语中使用。当时人们讲“资本与劳动力”，或“管理部门与工人”。德语同义词 Mitarbeiter 当时也同样罕见。而且，这个术语在使用时是指下层办事员（相当于西班牙语的 employado 或德语的 Angestellter）。“雇员”还是一个难以掌握的词。它没有明确的含义。而且该词在其他语言中的所有同义词同样是最近才被普遍使用，同样是难以掌握。这种现象本身是新的——而且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恰当的词来表述它。

根据定义，“雇员”是由于工作而获得工资的人。可是，在美国，最大的“雇员”群体是工作没有报酬的人。美国每两个成年人中有一人（总共有9000万人）在非赢利组织中当无偿服务雇

员，其中大多数人一星期至少义务工作3个小时。[1] 他们显然是"职员"，而且他们自己也认为是如此。可是，他们是自愿人员，没有任何报酬。

实际上，许多当"雇员"的人，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不是受人雇佣。他们是"自我雇佣"。一个世纪前，受雇佣的人，即为其他某个人工作的人，为"主人"而不是为组织或"老板"工作。当时有工厂工人；有家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每个发达国家中，数量大大超过工厂工人)。有店员、售货员等。受过教育的人一般是"独立经营者"。在1913年任何国家(除英国和比利时之外)的劳动力中，最大的单一群体是在自己拥有或租用的土地上为自己干活的农民。

今天，在每个发达国家里，农民已是极少数。家仆几乎已消失。而六、七十年前是"独立经营者"的人现在是雇员或"自我雇佣者"，即受过教育和有知识的人。

我们需要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些人——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同时，我们可能还必须把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雇员"界定为其是否有能力作出贡献取决于是否进入组织的人。他们是否有报酬是次要的。如果这些人是"自我雇佣的"，他们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他们向组织提供服务或通过组织提供服务：如英国国民医疗保健服务的医生、为美国"独立提供者"团体工作的美国医生、会计师和审计师。这些人可能没有收到"工资"，而是收到"服务费"。但是他们起作用的能力完全像他们拿工资时一样取决于他们进入组织的机会。

我们在收入、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等方面上升得越高，履行

---

① 关于这一点，参见第九章。

职责和发挥作用的能力就越取决于进入组织的机会。正因为后资本主义社会已成为组织社会，所以它成了雇员社会。这些只是描述同一现象的两种不同方法。

就在次要的、卑下的服务岗位上工作的雇员——如超级市场收款员、医院清洁工、送货卡车司机——来说，他们的地位可能与靠工资为生的人，昨天的"工人"没有多大差别，他们就是他们的后一代。他们占劳动力的四分之一以上；他们已经在数量上超过了产业工人。他们的地位、生产力和他们的尊严是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问题（将在第四章中予以讨论）。

但是，另一群体，知识工作者的地位却全然不同。

所有知识工作者之所以能工作仅仅是因为存在着那么一个组织。在这方面，他们有依赖性。但同时他们拥有"生产资料"，即他们的知识。而且知识工作者占发达国家整个劳动力的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以上（熟练的服务工作者占另外的三分之一左右）。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诞生造成的最大社会变化是工人的"异化"。工人不再拥有生产工具。除非其他某个人，即"资本家"，提供工具，特别是价格稳步上升的机器，否则他们不能生产。

知识雇员仍然需要工具。对知识雇员工具的资本投资可能已经高于对制造工人工具的资本投资（而且社会投资，如对知识工作者的教育投资，当然是对手工工人教育投资的许多倍）。但是这种资本投资是非生产性的，除非知识雇员将他们拥有的而且不能从他们那儿拿走的知识用于这种投资。

工厂的机器操作工，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机器决定干什么，而且决定怎么干。知识雇员可能需要一台机器，不管它是计算

机、前列腺病人的超声波分析仪还是天文望远镜。但是，计算机、超声波分析仪和天文望远镜都不告诉知识雇员干什么，更不用说怎么干。没有作为雇员财产的那份知识，机器就是非生产性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完全依赖于机器。在雇员社会中，雇员和生产工具是相互依存的。缺了一个，另一个就不起作用。尽管生产工具，如超声波分析仪，是固定在一处的，但知道如何操作它们和如何解释读数的技术人员有能动性。机器依赖于雇员，而不是相反。

在历史上，工人可以被“监督”。人们可以告诉他们该做什么，怎么做，要多快完成等。事实上，知识雇员不能被监督。除非有谁比组织中任何人知道得更多，否则所有监督的意图和目标是无意义的。

销售经理可以告诉市场研究人员公司对新产品设计和新产品应进入的市场部分所需要知道的是什么。但是，告诉公司董事长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研究，如何建立市场研究，研究结果意味着什么，却是市场研究人员的事。空军基地指挥员决定某一使命需要多少架飞机和什么型号飞机。但是，告诉指挥员，多少飞机飞行性能良好，在派遣它们执行任务前需要进行什么样的维修的却是机务主任，尽管他的地位非常低下(通常甚至不是少尉军官)。虽然地位上有极大差距，拒绝机务主任意见的指挥员乃是非常愚蠢的指挥员(顺便说一句，也是当不长的指挥员)。

雇员社会的雇员需要进入组织。没有组织，他们就不能执行职责或生产。不过，他们有机动性。他们随身携带着生产资料，即他们的知识。

在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企业进行痛苦而难忘的结构改革

时，成千上万（如果不是几十万）的知识雇员失了业。他们的公司被收购、兼并、让产易股、清算等等。可是，在短短几个月里，绝大多数人找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把他们的知识用于工作。过渡时期是痛苦的。而且，在大约一半的例子中，新工作岗位支付的报酬没有旧工作岗位多，而且可能不像过去那样令人感到愉快。但是，被解雇的技术人员、专业人员和经理发现，他们有“资本”——他们的知识；他们拥有生产资料。而别人，组织，拥有生产工具。两者都互相需要。光靠自己，两者中没有一个能够生产。换句话说，没有一个是“依赖的”或“独立的”。它们相互依存。

日本官方依然相信终身承诺，特别是对知识雇员、专业人员、经理、技术人员的承诺。但是 1989 年日本大丑闻是“里库路德事件”。里库路德，一个迅速发展的出版商，以免费提供股票的手段来贿赂政治家。为什么这些里库路德股票如此有吸引力？为什么里库路德公司特别有利可图？该公司为寻找比目前更好的工作岗位的技术人员、专业人员和中层经理们出版各种杂志。这些杂志只刊登能为这些人提供的工作岗位。在乘坐东京地铁时，人们告诉外国人，老年人看成人连环漫画，但年轻人则看为已受雇于某公司的知识雇员提供新工作岗位的杂志。甚至在日本，尽管非常强调“忠诚”和“终身承诺”，知识雇员正在迅速取得流动性。

从现在起，“忠诚”不能靠薪金来获得。它必须通过向知识雇员证明目前雇佣他们的组织为其提供极好的发挥作用和履行职责的机会来取得。不久前，我们谈论“劳动力”；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地谈论“人力资源”。这暗示，特别就有知识的人而论，正是知识雇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或她作出什么贡献以及他或她的

知识能够或应该有多大的收获。

但是，在知识社会，甚至不熟练的服务工作者也不是"无产者"。雇员集体一起拥有生产资料。从个人来说，他们中很少人是有钱的。更少的人是富裕的(尽管很多人在金融上是独立的)。然而，从集体来说，他们拥有生产资料，不管是通过养老基金、共同基金还是通过退休帐户。为雇员行使投票权的人本身也是雇员，如管理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养老基金的文职公务员。这些养老基金管理者是美国唯一真正的"资本家"。"资本家"本身因此成为后资本主义知识社会的雇员。他们拿雇员的薪金，像雇员一样思考，视自己为雇员。但是他们像资本家一样行事。

一种含意是，现在资本为雇员服务，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雇员曾为资本服务。但是另一种含意是，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和重新界定资本和所有制的作用、力量和功能。正如后面还要论述的(在第三章)，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公司管理。



劳动力和资本及其未来

如果知识是后资本主义社会最好的资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两种关键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未来作用和功能将是什么？

在社会方面，新的挑战（将在第四章、第五章和本书最后部分论述）将占主导地位。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功将基本上取决于我们对这些挑战作出的反应。但是，在政治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未完成的使命将是十分明显的：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消失以及对传统资本的作用和功能的重新界定。

我们已经进入了“雇员社会”，其中劳动力不再是一种资产。我们同样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资本主义社会”蔑视一切依旧被政治家、律师、经济学家、记者、工会领导人、工商企业领导人——简而言之，几乎每个人，不管其政治信仰是什么——认为如果不是“自然法则”也是不言而喻的真理的一切事物。因此，这些问题将在今后几十年里成为公众瞩目的政治问题。为了能成功地解决过渡时期的新挑战，我们必须首先解决两项“未完成的任务”：劳动力的未来作用和功能以及货币资本的未来作用和功能。

劳动力仍是一种资产吗?

在"制造业衰退"的年份里,美国制造业生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几乎没有变化。它在1975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2%,而1990年则为23%。在这20年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5倍。换句话说,美国整个制造业生产在这20年里增长2.5倍以上。

但是,制造业就业人数根本没有增长。相反,从1960年到1990年,它所占的劳动力的百分比下降了,甚至绝对数字也下降了。在这30年里,它下降了几乎一半,从1960年占劳动力总人数的25%下降到1990年的16%或17%。在这期间,美国劳动力总人数翻了一番(这是和平时期任何国家有案可查的最快的增长)。然而,所有的增长都是在工作岗位方面而不是在制造和运送产品方面。

这些趋势肯定还会继续下去。除非出现严重萧条,否则美国制造业生产有可能保持在占国民生产总值23%的水平上。这意味着在今后10年或15年里国民生产总值几乎又要翻一番。然而,同一时期,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有可能减少到占劳动力总人数的12%以下。这意味着制造业就业总人数将进一步急剧缩减。

日本的发展几乎完全一样。从1970年至1990年的20年里,整个制造业生产也增长了2.5倍。然而,制造业就业总人数也根本没有增长。而且,从现在起,即使制造业有相当大的增长也不足以抵消制造业工作岗位的逐渐缩减。在日本,到2000年,制造业就业总人数也会大大低于1990年的水平。

然而，这两个国家对相同的发展作出的反应却完全不同。在美国，如果不是对“美国制造业消亡”感到恐慌，也是对“美国制造业衰退”感到忧郁。在美国，制造业与蓝领工人就业有密切关系。在日本，反应完全相反。对日本人来说，重要的是制造业生产的增长。日本把过去20年的趋势看作是胜利。美国人则把它看作是失败。日本把这只玻璃杯看成是“一半满的”，而美国则看成是“一半空的”。

两者态度的差异，导致两国政策也存在巨大差异。美国的每个州、县和市拚命想吸引能提供蓝领工作岗位的制造商。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等贫困的农业州以提供长期纳税补助和低息贷款吸引了日本汽车制造商。1992年初，洛杉矶市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城市高速铁路交通设备合同给了一家答应在一个差不多有1500万居民的地区创造97个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公司！

相反，日本公司正在尽快将制造业中的手工劳动搬出日本（迁入美国；迁入美墨边界上的工厂；迁入印度尼西亚）。

在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被看作一份贵重的资产。而在日本，它们越来越被看作一种债务。

两个国家社会结构的差异，部分说明了何以对同样趋势作出这些不同反应。制造和运送产品方面手工劳动工作岗位的缩减，首先是对美国最引人注目的少数民族黑人的威胁。在过去30年里，他们最大的经济收益来自加人工会的大规模生产产业的高薪工作。在经济和社会的其他所有领域，黑人的收益要少得多。因此，加人工会的大规模生产产业工作岗位的缩减加剧了美国历来最严重的问题（由于它既是一个社会问题又同样是一个道德问题，所以更加令人感到气馁）。

在日本，几乎所有年轻人都获得高中学历——而且被认为

对手工劳动来说学历过高。他们成为办事人员。那些继续上大学的人(日本年轻男子上大学的比例与美国一样)只从事管理或专业工作。如果日本不能削减制造业手工劳动工作岗位,它将会面临劳动力极度短缺问题。换句话说,制造业工作岗位的缩减是日本人解决问题的答案。

一个国家需要制造业基础,美国人会这么认为,大多数欧洲人也会这么认为。这儿指的是制造业工作岗位。但是,日本人认为(而且令人信服地认为),发展中国家仅能胜任制造业手工劳动的年轻人太多了(在今后至少30年里将依然如此),因此对"产业基础"的担忧是毫无意义的。一个国家拥有设计和销售产品的知识工作者,就能轻易地实现产品的低成本和高质量。事实上,日本人认为,对制造和运送产品方面的蓝领手工劳动的鼓励,削弱了发达国家经济。在发达国家,甚至几乎在学校里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的人也意味着要为之付出巨额的教育投资。如果在制造业当工人,实际上这样的人只能给社会和经济带来少得可怜的回报,也许不超过1%或2%。可是,在发展中国家,没有上过学的人在经过稍许培训后能具有与最发达国家的手工劳动者一样的生产力。日本人认为,把发达国家花在创造蓝领工作岗位的钱用于推进该国的教育,从而确保年轻人学到足够知识,以胜任知识工作或至少胜任高级服务工作,将会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需要多少劳动力,以及什么类型?

实际上,发达国家确实需要制造业基础。可是,事实支持日

www.55188.com 理想在线证券网

本人的立场。美国现在仍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农业基础，尽管农民只占劳动人口的 3%（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仍占 25%）。美国仍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而制造业工人只占劳动人口的 10%（或更少）。

1980 年，美国最大的综合性钢铁公司，美国钢铁公司，雇佣 120000 人。10 年后，它雇佣 20000 人，然而生产总吨数差不多的钢铁。10 年内，从事钢铁生产的手工劳动者的生产力提高 7 倍。其中很大一部分靠关闭陈旧过时的老厂实现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对新设备的投资。但是，最大的一部分是因工作流程和任务作了重新设计。

结果，美国钢铁公司最好的厂现在是世界上最具有生产力的综合钢铁企业。可是，它们（以及世界上所有综合钢铁企业）总的来说仍然是人浮于事。而且美国的综合钢铁企业仍然亏本。“小钢铁厂”（1991 年，几乎三分之一的美国钢产量是由小钢铁厂提供的）的生产力又是最具有生产力的综合企业的 3 倍至 4 倍。很可能那些美国最好的小钢铁厂能生产出与美国钢铁公司同样多的钢铁，而其就业人数不超过后者目前的六分之一。小钢铁厂日益能生产综合钢铁企业生产的所有产品，质量相同或更好。

当然，一座小钢铁厂不必施行综合钢铁企业劳动最密集的操作工序而获得这些效果。它不熔炼铁矿石以获取铁。它也不将铁转化为钢。它从废钢着手。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世界将有大量废钢供应。

但是，综合钢铁企业和小钢铁厂之间的主要差别不在于生产过程。小钢铁厂的工人不是制造和运送产品的蓝领工人。他们是知识工作者。小钢铁厂把钢铁生产从以往将体力和技能用

于工作变为将知识用于工作；有关生产过程、化学、冶金学、计算机操作的知识。美国钢铁公司所解雇的工人来到小钢铁厂不一定能适应。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它指明了方向。总是需要大量能在工作岗位上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用我们目前的培训知识，能迅速使他们在传统工作岗位上变成具有生产能力的工人。将来需要更多只能将手工技能用于工作的人。但在今后几十年，最大的就业需求是对"技术人员"的需求。技术人员不仅需要熟练技能，他们还需要高级的规范知识，首先是很强的学习和获得额外知识的能力。技术人员不是过去监领工人的继承者。他们基本上是过去技术非常熟练的工人的继承者，确切地说，他们是技术非常熟练的工人，现在还拥有大量规范知识、正规教育和继续学习能力。

在学术界和决策者中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争论。对于"制造业基础"来说，发达国家在国内推动其企业从事工业产品的技术、设计和销售工作是否就足够了？或者说它们是否还必须在国内制造？这个问题尚可讨论。如果一个国家有知识基础，它就还要制造。但是，这种制造工作，如由传统的为机器服务的蓝领工人来做，将没有竞争力。在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工作将基本上由机器为之服务的知识工作者来做（如在一家小钢铁厂，计算机控制台和工作站为97个技术人员服务）。

这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问题。它们再也不能期望通过培训低工资的人获得大量制造业工作岗位。手工劳动力，不管如何便宜，将无法与知识劳动力竞争，不管后者的薪金有多高。但是这也给一些国家带来巨大问题（美国是最好的例证）。在这些国家中，有规模较大的"少数民族"群体，他们在教育程度资格

方面是"发展中的"而不是"发达的"。英国，在北部老的工人阶级聚居地，尤其在沿克莱德河的苏格兰，以及在北爱尔兰，面临类似的工人阶级文化问题。这种文化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而不是发达国家的文化。同样，在欧洲大陆，尽管教育制度相对比较开放，但是劳动力成为债务而不是资产的趋势将在比较长的过渡时期里产生严重社会问题和政治冲突。在每个地方，它还引出了有关本世纪最成功的组织——工会——的作用、职能和未来这些极易触动感情的难题。

保持和加强国家的制造业基础并确保其现有的竞争力，当然值得优先考虑。但是这意味着接受以下这一点：制造和运送产品方面的手工劳动力正迅速成为债务而不是资产。知识成了所有工作的关键资源。创造传统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正如美国人、英国人、欧洲人正在做的）至多是短命的权宜之计。它实际上会把事情搞得更糟。唯一有成功希望的长期政策是，发达国家将制造业从以劳动力为基础转变为以知识为基础。

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

在发达国家，从来没有像以养老基金为主的机构投资者那样拥有巨额集资。美国是养老基金起步最早并走得最远的地方，在那儿最大的养老基金拥有800亿美元资产。甚至小的养老基金也可能有1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投入经济。这些集合的资本使以往最大"资本家"所掌管的资本相形见绌。发达社会的年龄结构实际上保证了养老基金在每个发达国家中变得更为重要。

这是前所未有的发展。[1] 它仅仅始于50年代。事实上，是非常新颖的事物，以致养老基金的管理和规章尚有待于制订。

如何保护如此巨大的集资的钱不被掠夺者掠去是个大问题。美国私人企业的养老基金已采取某种防止掠夺的措施。像已故英国报纸大王罗伯特·马克斯韦尔在1990年和1991年所干的那样掠夺养老基金的事，在美国不会那么容易发生。但是，即使在美国，保护措施也很不够。甚至在美国，对于防止最重大的危险：出于政治目的而掠夺政府雇员的养老基金的这种危险，就根本不存在任何防护措施。

事实上，在美国，无论在纽约市、纽约州、费城还是加利福尼亚州等地，政府雇员的养老基金经常被滥用于填补州和市的预算缺口。

同样严重的是以下的危险：特殊利益集团，如工会，会利用它们的政治权力把养老基金移作补贴它们自己（通常在使养老基金的钱为"社会建设性目的"服务的骗人的借口之下进行）。养老基金是今日雇员的储蓄。除了目前雇员在金融方面的未来需要之外，它们不能用于任何事或任何人。这是它们能为之服务的最大"社会目的"。

养老基金及其所有老

将养老基金"真正所有者"，目前的雇员和未来的领取养老

① 我在1976年的《未被觉察的革命》一书中第一次觉察到并予以分析。该书将由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的事务出版社重印，易名为《养老基金革命》。

金的人，纳入养老基金管理中是至今任何国家都没有解决的难题。目前，这些所有者有的唯一关系是他们对一张支票的期望。可是，对发达国家45岁以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在养老基金中的利益是他们最大一笔资产。

19世纪，平民百姓最大的金融需要是人寿保险，万一他们早逝，得以保护其家庭。由于现在的预期寿命几乎是19世纪时的两倍，所以平民百姓的最大需要是预防活得太长带来的威胁。19世纪的"人寿保险"实际上是"死亡保险"。养老基金是"老年"保险。这是社会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大多数人能期望其寿命比工作生涯长好多年。

在今后许多年里，管理养老基金和保护其不受掠夺将仍是对决策者和立法者的挑战。十有八九要到我们遇到几次卑鄙龌龊的丑闻后才会应战。同样，把真正所有者纳入养老基金结构中将需要经历多年的争论、试验和"丑闻"。

养老基金的适度管理和一体化也将是主要的公众问题——而且应该如此。但是，这些问题不是我们在本书中主要关心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资本的作用和功能，因为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养老基金，正迅速成为发达国家主要的资本来源。在美国，到1992年底，机构投资者至少持有大公司50%的股本。它们甚至还持有美国中型（更不用说美国大型）企业，不管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差不多比例的固定债务。到1992年底，美国100个最大的养老基金拥有所有养老基金资产的大约三分之一。

以前在美国从未有过如此集中的金融控制——事实上决不会允许这样做。

历史上，美国始终只有最低的金融集中权。在德国，在至少

www.55188.com 理想在线证券网

一个世纪里，少数大银行（直接地和通过它们为客户持有的股票）控制了大公司，甚至中型公司约五分之三的投票权。在日本，围绕银行或贸易公司形成的集团或系列企业，如三菱、三井或住友，传统上控制了日本绝大多数大企业。同样，意大利有极度的集中，金融权力和控制由很少数高度集中的私人集团和同样很少数由政党控制和依赖政党的政府财团共享，部分地在竞争中，部分地在合作中形成。

然而，对美国来说，资本在机构投资者手中集中是史无前例的。可是，正是美国的发展有可能成为典范。

日本和欧洲集中金融权力的传统方式，在养老基金出现后就不会继续存在了。日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集中金融权力的传统机构绝不可能控制新的养老基金。不同的国家无疑将按自己的方式构筑其养老基金经济，就像它们按自己的方式建立19世纪最后几年出现的"金融经济"一样。但是，养老基金资本主义（或养老基金社会主义，因为雇员通过养老基金拥有生产资料，从严格的法律意义来说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将成为发达国家普遍的所有制模式（单单发达国家的年龄结构就使这种模式成为几乎不可避免）。

但是，养老基金资本主义根本不同于以前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就像它不同于社会主义者想象的社会主义经济一样。

养老基金是一种奇特的、实际上似非而是的现象。它们是控制巨额集合资本及其投资的"投资者"。但是，经营养老基金的经理和基金所有者都不是"资本家"。养老基金资本主义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

在法律上，养老基金是"所有者"；但仅仅在法律上。首先，

www.55188.com 理想在线证券网

养老基金是"财产受托人"。所有者是最终受益者，即未来领养老金的人。而且养老基金本身由金融分析家、有价证券管理人、保险精算师等雇员管理。这些都是高薪专业人员，但他们本身不可能富裕。事实上，美国最大的养老基金(联邦政府、各州和各市的雇员养老基金)由文职公务员管理，他们拿的是公务员的工资。

养老基金资本主义也是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养老基金的钱(及其同类性质的，共同基金的钱)不符合任何已知的资本定义；这不只是语义学的问题。实际上，养老基金的资金是延期工资。把它们积累起来以便向不再工作的人支付相当于工资收入的钱。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即按照为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资本的定义——一切资本都是通过剥夺靠工资为生的人的财产而积累的。一位早期的社会主义经典作家公开表明"财产是赃物"。显然，这种定义不适合养老基金的资本，因为在养老基金中，靠工资为生的人仍是这些钱的所有者。

但是，养老基金的资本也不符合任何非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的定义。在养老基金资本主义社会中，靠工资为生的人通过延期支付其部分工资为他们自己的就业筹措资金。靠工资为生的人是资本收入和资本收益的主要受益者。我们没有任何适合既成现实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理论。

公司管理

养老基金(以及其他机构投资者)作为主要资本提供者和大

企业中多数所有者的出现而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养老基金在经济中的作用和功能。这种基金的出现使管理和控制大型企业组织的所有传统方式均遭淘汰，并迫使我们彻底地全面考虑，重新界定公司管理的定义。

1933年出版了本世纪美国最有影响的书之一①。该书指出，在大公司，法定所有者，股东，再也不能也不愿意进行控制。公司由专业管理部门控制，但没有所有权的利害关系。伯利和米恩斯指出，为大公司筹措资金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大公司已发展到不再适用以单个所有者或所有者集团筹资了。它需要通过许多人投资来筹资，其中没有人有可能拥有足够的股份以控制公司，甚至拥有足够的股份以关心它的管理。他们还指出，"财产"已成为"投资"。因此，他俩问道，管理部门对谁负责任？以及为什么负责任？

20年后，美国曾试图回答这些问题。试图作出的回答——1950年左右形成（在我1954年的《管理的实践》一书中曾第一次进行评论性的讨论）——是，管理部门是不对任何集团或个人负责任的"受托管理人"。50年代，人们断言，国有大公司的管理部门应"尽量为许多支持者的均衡利益着想"而行事，这些支持者包括"股东、雇员、供应商、工厂所在社区等等"，即现在所说的"股本持有者"。管理部门将作为一个慈善的暴君来尽责任。因为在所有慈善的专制君主统治下，没有人试图来界定"最佳均衡利益"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更不用说这种"受托管理人职责"的履行如何能界定或衡量。更糟的是，没有任何使管理部门对任何人负责任的尝试。相反，董事会，法定的公司管理机构，

① 阿道夫·伯利和加德纳·米恩斯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

越来越显得无能为力，越来越成为公司最高管理部门的橡皮图章。

任何管理，不管是一个公司的还是一个国家的，如果不对效果负有明确的责任，不对任何人负有明确的责任，就会变得平庸而出现错误。这就是从1950年至1980年的30年间美国大公司发生的事情。

这种发展当时使70年代和80年代狂热的金融操纵、敌意接管、举债买断、收购和强制过户成为可能。它使10年的贪婪和"泡沫经济"成为可能。这种经济在一系列金融丑闻中可想而知崩溃了。但是敌意接管和举债买断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与此同时机构投资者成了大公司控制多数股票的股东。正是机构投资者为袭击者提供了资金。在袭击者提出(或似乎提出)比股票市场价高一点的钱收购养老基金持有的股份时，作为受托管理人的机构投资者在法律上有义务支持他们。

在这狂热的10年中兴起的是，对大企业的目的和逻辑依据以及管理功能重新界定。现在，公司管理只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股东的价值"，而不是"尽量为股东的均衡利益着想"。这也不会行得通。它迫使公司管理只为了眼前利益。但是这意味着不是摧毁就是损害企业创造财富的能力。它意味着衰退，而且是相当快的衰退。长期效果不能靠堆积短期效果来实现，而是靠平衡短期和长期需要和目标来实现。此外，只是为了股东而管理企业，疏远了现代企业依赖其积极性和献身精神的人：知识工作者。一个工程师不会为了使投机倒把者致富而积极工作。

30年代的"专业经理"断言企业管理必须平衡短期和长期效果、平衡不同支持者的利益，企业对其中每个人都有真正的利害关系，这是对的。但是，我们现在还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而

40年前我们却不知道。事实上，我们知道应该在哪些方面确定目标以及如何把在不同方面追求的目标合成一种明确的战略。我们知道如何将商业效果和金融效果融合在一起。我们知道，在现代经济中，即在变化和创新的经济中，没有"利润"这样的东西。只有成本，过去的成本（会计记录的成本）和不确定未来的成本。过去的经营所产生的最低限度金融效果，相当于未来的成本，就是资本费用。顺便说一句，根据这种测量法，在过去30年里，只有很少数美国公司入不敷出。

使管理部门负有责任

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知道管理部门应负什么责任。它应对谁负责？标准答案当然是对"所有者"，而且这会指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养老基金。

但是，如上所述，养老基金不可能作为"所有者"。它们不可能管理企业。但是它们也不能再把自己视作"投资者"。一个投资者总是能出售他或她拥有的财产。但是大的养老基金（甚至中型的养老基金）拥有的财产非常之多，以致它们根本无法出售。它们唯一的市场是其他养老基金。换句话说，养老基金既不能管理企业，又不能从企业脱身。它们必须确保企业有人管理。

因此，我们可以预言，今后20年，我们将发展我一向所说的一种"企业审计"，而且概率很大；它将根据战略计划和具体目标，跟踪公司及其管理部门的工作情况。经过几年的时间，它将显示企业是否完成任务。目前已朝着发展这种企业审计及其管

理机构的方向迈出了头几步。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按常规检查和审计企业的财务状况的公共会计师就是范例。这种企业审计给了管理部门为履行职责所需的自主权。然而它将建立工作责任制并予以实施。因为它将把管理部门置于已知的、公开的工作要求的约束之下。同时，企业审计使资本受托人，即机构投资者，能成为负有责任的所有者以及真正所有者，即养老基金未来受益人的服务员。负有责任的所有者的责任是照料好委托他们保管的财产，即他们代表其合法所有者的公司。当然，这些受益人的利益在于长期效果而不是短期效果，在于经济增长而不是短期股市价格。

这种作用和功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完全不同于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作用和功能。资本的功能将日益是使知识在工作中发挥作用。资本将日益为实施管理服务而不施加决定性影响于管理。

应该怎样称呼这种新的社会结构？我在70年代中期第一次论述它时，曾称之为"养老基金社会主义"。"雇员资本主义"是否可能是更好的名称？



新劳动大军的生产力

后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新挑战是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的生产力。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事实上将要求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以及社会本身的结构均须有重大改变。

40 年前，干知识工作和服务工作的人仍然不到劳动大军总数的三分之一。现在，在所有发达国家，这些人占劳动力总数的四分之三(如果不是五分之四)——而且他们的份额还在扩大。他们的生产力，而不是制造和运送产品的人的生产力，才是发达国家的生产力。它极其低下。干知识工作和服务工作的人的生产力实际上可能在下降而不是上升。过去 30 年，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资本投资投在处理数据和信息的设备、计算机、传真机、电子信箱、闭路电视等方面。可是，做办事员工作的人数，即大部分设备是由他们来使用的工作人数，其增长速度要比总产值或国民生产总值快得多。办事员的生产力下降了，而不是提高了。销售员和工程师也是如此。我敢说，没有人会坚持认为，1990 年的教师比 1900 年或 1930 年的教师更有生产力。

最低的生产力在政府的就业中。可是，每个地方的政府都是服务工作者最大的雇主。例如，在美国，整个劳动力的五分之一为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所雇佣，主要从事例行的办事员工作。

www.55188.com 理想在线证券网

在英国,比例是30%。在所有发达国家,政府雇员在整个劳动力中占有相近的份额。

除非我们学会如何提高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的生产力而且使之迅速提高,否则发达国家会因此面临经济萧条和严重的社会紧张局势。人们只能按其生产力获取报酬。他们的生产力创造了大量财富,工资和薪金就从中支付。如果生产力不提高,更不用说下降,就不能支付更高的实际收入。

知识工作者,不管其生产力或整个经济的生产力如何,可望能获得优厚的收入 。他们是少数。他们还有流动性。但是从长远来看,除非他们的生产力提高,否则甚至他们也必定遭受实际收入下降之苦。大量的服务工作者从事技能要求较低、无需受过多少教育的工作。如果服务工作者的生产力低,如果一种经济试图支付给他们比其生产力创造的多得多的工资,通货膨胀则必定会损害每个人的实际收入。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通货膨胀还将造成严重的社会紧张局势。然而,如果只按服务工作者的生产力支付他们工资,他们与"享有特权的人",即知识工作者的收入差距必定会逐步扩大——又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紧张局势。

许多服务工作与制造和运送产品工作没有多大区别。这包括分理数据、开帐单、回答顾客问讯、处理保险索赔、向开汽车的人签发驾驶执照等办事员工作。事实上,约三分之二的工作是在政府办公室里做的,约三分之一以上的办事员工作和服务工作是在企业、大学、医院等单位里做的。实际上这是"生产工作",与在工厂里做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是在办公室里做的。但是,甚至这种工作,在能够创造经济价值之前,必须首先重新策划。为了作出最大贡献和取得最大成就,必须对这种工作进

行研究和结构改革。在新的劳动力，无论知识工作者或服务工作者所做的其他工作中，提高生产力均需要有新概念和新方法。

在致力于提高制造和运送产品生产力的工作中，任务是已知的、确定的。在弗雷德里克·泰勒开始研究铲沙时，他可以想当然认为沙是必须铲的。在许多制造和运送产品的工作中，任务实际上是"由机器调整进度的"。工人为机器服务。

在知识工作以及几乎所有服务工作中，机器是为工作者服务的。任务不是已知的。任务必须确定。"这项工作的预期效果是什么？"这种问题在传统的工作研究和科学管理中几乎从来没有提出过。但是，它乃是使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有生产力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要求作出一种承担风险的决定。通常有几种选择。除非效果能明确予以规定，否则不会有生产力。

队伍作用和协同工作

制造和运送产品的生产力与知识工作和服务工作的生产力之间还有另一个重大区别。在知识和服务工作中，我们必须决定工作应如何组织。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才能适合这种工作并使之顺利进行？

大多数人进行的工作是成群结队完成的；离群索居的隐士极其罕见。甚至生性最孤僻的艺术家、作家或画家也要依靠他人才能使其工作有成效：作家依靠编辑、印刷工、书店；画家依靠画廊出售其作品等等。而我们大多数人是在非常密切的队友关系中工作的。

现在有许多关于"创造协同工作"的说法。这里多半有误

解;它以为现有的组织不是协同组织。这显然是错误的。其次,它以为只有一种队伍。但事实上,对人的所有工作来说,有三种队伍。而且,为了使工作有成效,必须在适合于工作本身及其顺利进行的队伍中进行组织。①

第一种队伍的例子是棒球队和板球队。这也是医院里为病人进行手术的那种队伍。在这种队伍中,所有队员都在队里发挥作用,但没有作为一支队伍发挥作用。

棒球队或板球队的每位队员都有固定位置,他决不能离开这个位置。在棒球运动中,外场手决不互相帮助。他们待在各自位置上。棒球运动的一句老话是"上场击球,完全孤军作战"。同样,麻醉师不会帮助护士或外科医师,反过来也是如此。

今天,这种队伍并不受到新闻舆论的好评。事实上,在人们谈论"创建队伍"时,他们通常是指自己想离开这种队伍。可是,棒球(或板球)队具有不应低估的雄厚实力。由于所有队员都占据固定位置,所以他们能承担属于自己的具体任务,能根据执行每项任务的成绩来进行衡量,能针对每项任务进行培训。在棒球运动和板球运动中,有每个队员过去几十年的成绩统计资料,这决非偶然。医院的外科手术小组也以同样方式运行。

对于重复的任务和已有众所周知规则的工作来说,棒球队是个典范。现代大规模生产,即制造和运送产品工作,就是按这个模式组织的,而且其大部分能力应归功于它。

第二种队伍是足球队。它也是交响乐团赖以组织的队伍概念,是凌晨两点围绕在心脏停跳病人周围的急救小组的典范。

---

① 关于各种队伍,尤其是关于商业队伍和运动队之间的相似之处,参见罗伯特·凯德尔的《游戏计划》(达顿出版社,纽约,1985年)。

这种队伍的队员也有其固定位置。交响乐团的大号手不会接替低音提琴手的角色。他们坚守自己的大号手位置。在医院的急救小组中，呼吸系统技术人员不会打开病人胸腔以按摩心脏。但是这些队的队员作为一支队伍发挥作用。每个队员与队里其他队员起互相配合的作用。

这种队伍需要有一个指挥或教练。而且指挥或教练的话就是法律。它还需要有"总谱"。而且它需要不断排练以便更好地发挥作用。但是，不像棒球队，如果总谱明确，如果有好的领导，它就有很大的灵活性。而且能迅速发展

最后，还有网球双打队——小型爵士乐队或者组成美国大公司"董事长办公室"[1]的4—5位高级管理人员小组，或者在德国公司中的Vorstand(管理委员会)。

这种队伍必须很小，7至9人可能是最大限度。在这种队伍里，队员有他"最喜爱的"而不是"固定的"位置。他们相互"掩护"。而且他们调整自己以适应其他人的长处与弱点。在网球双打中，守卫区的队员适应打擦网球伙伴的长处与弱点。而且只有在对伙伴长处与弱点的适应成为条件反射时，即在网球双打队守卫区队员在球离开对方队员球拍时就开始跑动以"掩护"网前伙伴较弱的反手击球时，队伍才发挥作用。

调整得好的队伍是最强的队。它的整体表现强于其成员各自表现的总和，因为这种队伍调动了每个队员的长处，并使每个人的弱点减少到最低程度。但是这种队伍需要极大的自我约束力。队员在实际作为一个"队"发挥作用以前，必须首先经过一

---

① 关于这一点，参见我1973年出版的《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一书中对最高层管理部门工作的论述。

个长时期在一起工作的阶段。

这些不同类型的队伍不能混淆。你不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场地、与同一个队伍打棒球和踢足球(或打板球和打网球)。交响乐团不能按小型爵士乐队的方式演奏。这三种队伍还必须是很"纯"的,不能是混合物。而且从一个队伍改变到另一个队伍是极其困难和痛苦的。这种改变破坏了旧的、长期建立的、令人珍惜的人际关系。然而,工作的性质、工具、生产过程以及最终产品发生重大变化时,就可能需要改变这个队伍。

信息流动这方面的变化尤其如此。

在棒球型队伍里,队员从环境中获取信息。每个队员得到适合他或她任务的信息,而且是不管别的队员收到的信息而独立得到的。在交响乐团或足球队里,信息多半来自指挥或教练。他们控制这个队表现的"总谱"。在网球双打里,队员多半从队友获取信息。这说明了信息技术的变化和向着我前面称之为"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① 的发展使大规模"重新策划"成为必不可少的原因。

新的信息技术是美国大公司过去 10 年竭尽全力"重新设计"自己的基础。传统上,美国大公司的大部分工作是按棒球队模式组织的。最高层管理部门就是总经理,职能部门高级经理向他"汇报工作",他们中每个人做一种具体工作,如经营工厂、经营销售、财务等。董事长办公室是一种将最高层管理部门转化为网球双打队的尝试。信息的出现使之成为必然,或至少使之成为可能。

① 关于这一点,参见我 1989 年的《新现实》一书(牛津:巴特沃思—海涅曼出版社)中的第十四章。

传统上，新产品开发工作是由棒球型队伍完成的，其中每个职能部门(设计、工程、制造、营销)做自己的工作，然后将它移交给下一个职能部门。在美国一些主要行业，如制药或化学，很早就已改为足球或交响乐团型队伍。但是，美国汽车业在新型号设计和引进方面仍保持棒球型队伍。1970年左右，日本人开始利用信息，使这种工作向足球型队伍转变。结果，底特律在引进新型号的速度和灵活性方面都远远落在后面。自1980年起，底特律一直拼命想赶上日本人，它使新车的设计和引进向足球型队伍转变。此外，在工厂层面上，信息利用的可能性(使向"全面质量管理"转变成为可能，事实上成为强制的行动)正迫使底特律从传统装配线赖以组织的棒球队向网球双打队转变，这是作为"灵活生产"基础的协同概念。

只有选择和建立适当类型的队伍，致力于提高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生产力的工作才能真正有成效。正确的队伍本身并不能保证生产力。但是，错误的队伍能破坏生产力。

集中的需要

集中精力于工作和任务是知识和服务工作生产力的最后一个先决条件。在制造和运送产品的工作中，任务是明确界定的。一个世纪前，泰勒研究过铲沙工人的任务。人们并不期望铲沙工人把沙带到他们能够开始铲沙的地方。那是其他人的工作。犁地的农民不会爬下拖拉机去出席一个会议。在由机器引导的工作中，机器集结工人；工人是机器的仆人。在知识工作中，在机器(如果有的话)是工人的仆人的大多数服务工作中，知识和

服务工作者的生产力需要取消无助于执行工作的任何活动。这些活动使工作转向。取消这些活动可能是走向提高知识和服务工作生产力的最重要步骤

医院护士的任务是照料病人。但是，每一项研究都表明，她们花费多达四分之三的时间在无助于照料病人的工作上。一般来说，护士的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时间花在填表格上。在我们分析百货商店营业员工作时，我们总能发现他们把一半以上时间花在无助于其履行职责——使顾客满意——的工作上。他们把至少一半时间花在填写表格上，而这是为计算机服务，而不是为顾客服务。在我们分析工程师所花费的时间时，我们总能发现，他们的一半时间花在出席会议或润色报告上，而这些与他们的任务几乎没有什么(即使有的话)关系。这不仅毁了生产力，而且毁了积极性和自尊心。

在医院把文书工作集中起来，分配给一个不干其他事的办事员后，护士的生产力就提高一倍。她们的满意程度也大大提高。她们突然有了时间可以从事她们受过培训和被雇佣的工作，即照料病人。同样，在不让百货商店营业员干文书工作而由另一个办事员集中办理，他们的生产力和满意程度一下子迅速提高。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工程师从"日常事务"(起草工作、修改报告和备忘录、出席会议)中解脱出来之时。

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应该经常受到这样的询问：这项工作对你的主要任务是否必要？它是否有助于你的工作业绩？它是否对你的工作有帮助？如果回答是"否定"的，这个程序或工序就是"打杂活儿"而不是"工作"。它要么被取消，要么变成一种特有的工作。

界定工作，确定合适的工作流程，建立正确的队伍和集中精

力于工作和成绩，是知识工作和服务工作生产力的先决条件。只有在做了这一切之后，我们才能开始使各项工作和各项任务富有成效。

弗雷德里克·泰勒经常被人批评说，他没有询问工人如何做工作。他告诉他们如何做。而20年代和30年代试图以“人际关系”取代泰勒“科学管理”的哈佛心理学家、澳大利亚出生的埃尔顿·梅奥(1880—1949年)也是如此。列宁和斯大林也不向“群众”请教；他们告诉群众怎么做。弗洛伊德从不问病人自己认为问题出在哪里。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近结束时，最高指挥部才在采用新武器之前征求使用者(即战场上的士兵)的意见。19世纪，知道答案的专家受到信任。

现在，我们认识到，干工作的人最了解他所干的工作。他们也许不知道如何阐明其知识，但知道什么起作用，什么不起作用。所以，在过去40年里，我们发现，致力于改善工作岗位或任务的工作始于做这种工作的人。他们必定被询及：我们能向你了解什么？关于工作岗位和如何做工作，你能告诉我们些什么？你需要什么工具？你需要什么信息？干工作的人必须为自己的生产力负责，并予以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生产首先给我们上了这一课[①]。但是，众所周知，日本人第一个采用了这个想法(即使仅

---

① 我的两本书《产业工人的未来》(1942年)和《新社会》(1949年)第一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中得出这个结论。在这两本书中，我主张“负责任工人”承担“管理责任”。根据战时经验，爱德华兹·戴明和约瑟夫·朱兰各自发展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质量研讨小组”和“全面质量管理”。最后，这个思想由道格拉斯·麦格雷戈在他1960年著名的《企业中人的一面》一书中以“X理论和Y理论”有说服力地提了出来。

仅因为少数美国人，特别是爱德华兹·戴明和约瑟夫·朱兰，给他们上了课)。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重新采用传统的“靠命令提高生产力”的办法——这多半因为工会强烈反对可能这样会导致工人享有一种“管理态度”，更不用说赋予“管理责任”了。但是，过去10年，美国管理重新发现了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工作教训。

在制造和运送产品中，与一位负责任工人建立起伙伴关系是最佳办法。但是，泰勒告诉他们怎么做这一点也发挥了作用，而且发挥得非常好。然而在知识和服务工作中，与负责任工作者建立起伙伴关系是提高生产力的唯一办法。其他都不起作用。

知识工作和服务工作的生产力要求我们将不断学习纳入工作和组织之中。正如前面(在第二章里)已说过的，知识需要不断学习，因为知识本身在不断更新。但是，服务工作，甚至纯粹办事员的服务工作，也需要不断的自我完善，即不断学习。学习如何才能更具有生产力的最好办法是讲授。为了实现后资本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生产力提高，组织必须成为一个教与学的组织。

改组组织

提高制造和运送产品的生产力需要工作的组织发生重大变化。然而，它不需要在组织结构方面作出多大的变化。面提高

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的生产力则需要组织结构有根本的改变。它甚至还要求全新的组织。

重建队伍以便工作能非常顺利进行，将导致大多数"管理层次"的消失。在交响乐团，几百名技术熟练的音乐家一起演奏。但是只有一个"管理人员"，指挥，在他或她与乐团成员之间没有中间层次。这将是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的模式。我们将因此看到彻底的转变，不再像过去那样主要靠提拔到指挥岗位，即管理岗位，来奖励演出。组织将没有（或几乎没有）这样的指挥岗位。我们将日益看到组织像小型爵士乐队一样运行，队里的领导随具体任务而改变，并且独立于每个成员的"等级"之外。"等级"这个词将完全从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的词汇中消失，而应代之以"任务"。

这种转变将提出动机、奖励、认可等大问题。

向外采购

但是，对于服务工作者获得生产力的要求甚至更激烈，实际上是革命性的。在许多情况下，服务工作通过立约承包给组织外提供服务的人。这特别适用于辅助工作，如维修，以及许多办事员工作。此外，这种"向外采购"将日益适用于为设计师绘图等工作以及技术或专业图书馆。事实上，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已经把过去由其法律图书馆做的大部分工作包给了外面的计算机控制数据库。

向外采购的一个推动力是，使服务工作者富有成效的需要。对于提高生产力的最大需要是在组织中并不导致晋升入高级管

理部门的活动之中。但是，在高级管理部门中，可能没有人对这种工作很感兴趣，对它有足够的了解，非常喜欢它，以及认为它很重要(不管可能会损失多少钱)。这种工作不符合组织的价值体系。

例如，在医院里，价值体系是医生和护士的价值体系。他们所关心的是照料病人。因此没有人非常关心清扫工作、辅助工作、办事员工作(即使医院可能要在这方面花费其一半的费用)。从事这些辅助工作的人，没有人能进入一个医院的高级职位。

一进医院就从事扫地或整理床铺工作的妇女，绝大多数人在15年后仍在扫地或整理床铺。对比之下，一位作为资深副董事长领导美国最大清扫公司医院部的女士，14年前起家时只是一个手拿水桶和扫把、几乎一无所知的墨西哥移民。但是她一开始就在一家把清扫工作外包给清扫公司的医院里工作。结果，她有机会晋升。但是，同样作为一种结果，由这家公司清扫的医院的生产力在过去15年里几乎提高了两倍。例如，整理床铺所需时间减少了三分之二。

清扫公司在财务上对提高低贱工作的生产力很感兴趣。处于公司管理岗位上的人直接知道清扫医院所需的工作。因此公司愿意花几年时间致力于重新设计所需的所有工具，包括重新设计床单。它愿意对新方法进行大量投资。而没有一件工作是医院愿意做的。使医院清扫工作有成效，需要有外部的承包人。

向外部采购的最大需要(不管是清扫等体力劳动还是开帐单等办事员工作)存在于政府中(参见第八章)。那儿的生产力最低。那儿从事于这种辅助工作的人也最多。

但是，那些大企业也没有多大区别。它们也需要把服务工作有计划地外包给专门从事这种工作的组织。这些承包组织为

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它们的管理人员认真对待这种工作。因此它们愿意把时间和资金花在重新设计工作及其工具上。它们愿意，甚至渴望为提高生产力而努力工作。尤其是它们严肃对待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激励他们在改进工作和提高生产力方面居领先地位。

向外采购之所以是需要的，不仅仅因为关系到经济上的原因。同样还因为它给服务工作和服务工作者带来了机会、收入和自尊。

因此，我们应该期望在今后短短几年里，把这种工作外包给独立组织。它们相互竞争，并因为其在使这种工作更有成效方面的实际成果而获得报偿。

这意味着未来组织的结构要有重大改变。这意味着大企业、政府机构、大医院、大型大学不一定是雇佣大量人的单位。它将是有相当收入和创造重大成果的单位——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因为它本身只做围绕其使命的工作；直接与其成果有关的工作；它重视、认可并适当奖励的工作。其余工作，它都外包出去。

防止新的阶级冲突

制造和运送产品工人的生产力迅速提高克服了19世纪对阶级冲突的恐惧。现在，服务工作生产力的迅速提高须消除新的阶级冲突危险(后资本主义社会两个占统治地位的新群体，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之间的冲突)。使服务工作富有成效因而是后资本主义社会最优先考虑的社会事项(除了是优先考虑的经济事项之外)。

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阶级"。两者之间相互渗透。在同一家庭里,有可能既有服务工作者又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工作者。但是,除非服务工作者既有收入又有自尊,否则后资本主义社会就存在着变成阶级社会的危险。这就需要生产力——它还需要晋升和认可的机会。

因此,在结构上,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在后两种社会中,组织试图最大限度地包揽一切活动。相比之下,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集中精力于核心任务上。其他工作,它们将与其他组织结成使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各样联盟和伙伴关系一起来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打个比方,是一种"结晶体"结构。后资本主义社会可能类似于一种流体。



以责任为基础的组织

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政治和社会理论，注重点是权力。然而，责任须是贯穿和组织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组织社会，知识社会，要求以责任为基础的组织。

组织必须对其权力的界限，即履行职责不再合法的那一点，负责。组织必须负起"社会责任"。在组织社会中没有其他人会照料社会本身。可是组织必须负责地去做，即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同时不危及它们履行职责的能力。

为了发挥作用，组织必须有相当的权力。什么是合法权力？什么是权力的界限？它们应该是什么？

最后，组织本身必须建立在内部责任之上，而不是在权力或指挥与控制之上。

正确变成错误之处

30年代，约翰·刘易斯(1880—1969年)被认为是美国仅次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第二号最有权力的人。事实上，罗斯福的当选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刘易斯。在此之前，他是个终身

共和党人,而在1932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带领矿工联合会以及整个美国劳工运动加入民主党阵营。然后,他领导了新政时期的工会化运动,成为新的强大的劳工组织——产业工会联合会的领袖。

但是,1943年,刘易斯反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的工资冻结,率领煤矿工人进行罢工。罗斯福总统请求他注意国家利益,取消罢工。但刘易斯拒绝了。他说,"美国总统是受雇关心国家利益的。而我是受雇关心矿工利益的。"

当时战时生产刚刚开始。美国士兵已在欧洲和太平洋地区作战。但可悲的是,他们仍然缺乏装备和弹药;这种短缺造成他们伤亡惨重。整个战争努力全靠煤在支撑,国家再也不能损失哪怕一天的煤产量。此外,矿工是美国报酬最高的工人;与军人的工资相比,他们是富豪。

但是,刘易斯取得了罢工胜利。

然而,他很快失去所有权力、影响和别人的敬重(甚至在劳工运动中,实际上甚至在他自己的工会中)。矿工联合会本身很快开始衰落(在权力、影响和会员等方面)。10年后,煤矿罢工只是摆摆样子。事实上,刘易斯1943年的胜利标志着美国工会主义开始衰退。

刘易斯长寿,得以看到自己的胜利造成的后果。但是他至死坚持认为,他号召罢工是对的,这样做也是他的责任。他反复地说,"对劳动力有好处的,最终对国家有好处。战争是唯一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唯一劳动力有真正权力的时候,唯一劳动力能成功地坚持其对正当工资的合法要求的时候"。据报道,他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美国公众不同意他的看法。

当然,这是一个极端例子,但也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刘

易斯知道他是正确的。但是，到什么程度，一个组织的正确变成了社会的错误；到什么程度，它的职责不再是合法的？

现在，美国非常关心"商业道德"。但是，大多数的讨论（包括商学院在这个题目下开的课程）涉及不道德行为，如行贿或掩饰有缺陷或有害产品。上层干坏事的人总是以效忠"更高的利益"为借口，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关于这个问题所要说的一切，350 年前伟大的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布莱斯·帕斯卡尔（1626—1662 年）在他 1655 年的《给外省人的信》一书中都已经说了。它彻底驳倒了耶稣会的诡辩道德，即对特殊的权力道德标准的请求。

但是，刘易斯的故事没有"以错误对错误"，而是"以正确对正确"。尽管不完全是前所未有，但这是一个新问题。它可能被认为是组织社会中核心的责任问题。

为了能履行职责，组织及其成员必须相信（正如约翰·刘易斯所相信的那样），它自己的专门任务是社会中最重要的任务。如上所述，医院必须相信，没有任何一件事与治愈病人同样重要。企业必须相信，没有任何一件事与满足社区物质需要同样重要；尤其是没有一件产品或服务像"我们的"企业生产和运送的产品或服务那样对经济和社区至关重要。工会必须相信，除了劳动者的权利外，什么都不重要。教会必须相信，除了信仰外，什么也不重要。学校必须相信，教育是唯一绝对的好事。

这些组织必须以自我为中心。总的来说，它们执行社会任务。但是，每个组织只执行一项任务，只看到一项任务。

事实上，我们期望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像刘易斯一样相信，他们的组织是最典型的组织，是社会。

查尔斯·威尔逊（1890—1961 年）在他一生中一直是美国舞台上的杰出人物，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制造公司通用

汽车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然后在1953年至1957年期间，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防部长。如果人们现在还记得他，那是为了他没有说过的话："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好处的，对美国也有好处。"威尔逊在1953年批准任命他为国防部长的听证会上确实说过的是："对美国有好处的，对通用汽车公司也有好处。"他在有生之年里一直试图纠正这种错误引文。但是没人听他的。每个人都认为，"即使他没说，他肯定相信这一点——事实上，他应该相信这一点。"

那末，界限在哪里？在遇到战争或严重自然灾害等不测事件时，答案比较简单：社会的生存先于其任何机构的生存。但是，不发生这些危机，就没有明确的答案。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把这个问题作为我们所有组织领导人的一项共同责任。

迄今最接近的解决办法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大企业的办法。在那些年里，企业领导人在制订计划时一开始就提出以下问题："对日本，它的社会、它的经济来说，什么是最好的？"然后他们又问，"而我们如何能把这个转化为一般企业特别是我们企业的机会？"他们不是"利他的"或"无私的"；相反，他们非常注重利润。他们没有"担任领导"。他们承担责任。但是甚至在日本，一旦国家经过战后重建而俨然出现并跻入世界经济领导地位时，企业及其领导人又变成以自我为中心了。

什么是社会责任？

组织社会中的组织是有明确目的的机构。每个组织只擅长

一项任务。这种专门性赋予它们履行职责的能力。

如果组织着手处理超出其专门能力、专门价值、专门职责的任务，它们只会损害自己，损害社会。在美国医院开始在“市中心门诊所”医治市中心的社会病害时，它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损害，而对社区却没有什么好处。美国学校试图取消隔离兼收黑人和白人学生，但彻底失败了。取消种族隔离的事业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它们迫切需要有所行动，例如在美国废除种族隔离。但是，所需的行动（或至少是这些不同组织所选择的行动）超出了组织的宗旨和职责范围，而且完全超出了它们的能力。

可是，还有谁来关心社会、它的问题与弊病？这些组织合起来说就是社会。像美国经济学家和诺贝尔美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 年—）那样认为，企业只有创造经济业绩一种责任，那是无益于论争的。创造经济业绩是企业的首要责任。如果企业没有表明其利润至少与付出的资本费用相等，那就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白白浪费了社会资源。创造经济业绩是基础；没有它，企业不能履行其他任何职责，不能成为一个好雇主、好公民、好邻居。

但是，创造经济业绩不是企业唯一责任。创造教育成绩也不是学校的唯一责任，创造保健业绩也不是医院的唯一责任。权力必须与责任相称；否则就是专制。但是，没有责任，权力也会变成无所作为。而且，组织确有权力，尽管只有社会权力。

对组织的社会责任的要求不会消失。迄今我们主要谈论企业的社会责任（理由很简单：企业是出现的第一个新组织）。我们将愈益关注其他组织的社会责任：首先是大学的社会责任。它有社会垄断权（其他机构以前从未有过的权力）。我们在后面马上要论及。

我们确实知道，尽管只是粗略地知道，社会责任问题的答案必须是什么。组织对自己的社区和社会影响负有全部责任，如废水排入当地的河流或它的工作计划造成城市街道的交通阻塞。然而，要一个组织接受，更不用说从事一项会严重阻碍它发挥履行主要任务和使命的能力的责任，是不负责任的。它没有胜任的能力，就没有责任。

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组织社会中的组织有责任努力寻求解决社会基本问题的办法，这与它们的能力相称，并使社会问题变成组织的一种机遇。

权力与组织

对组织的社会行动，还有另一种限制。它们是社会机构。在政治上，它们既没有正统性，又没有能力。

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组织都想要从政权、从政府获得一些东西。但是，要对它们有好处、使它们（至少它们这样认为）能更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符合它们的价值体系或能填满它们的钱包的东西。但它们不关心，也不应关心自己的政治权力。它们关心的是职责。

这与以前所有的多元社会形成鲜明对照。它们都是竞争政治中心的多元论者。组织社会的多元论是那些分立的组织的一种多元论，它们平行运行，互不竞争。工商企业不与医院竞争病人或医生的保护；反过来医院也不想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竞争出售计算机。每一个组织都是其他组织的供应者和顾客。中世纪欧洲的男爵、伯爵、公爵和主教（或中世纪日本的封建大领

主——大名)不断相互发动战争。现代组织则进行游说。

事实上,对一个组织来说,再没有比企图夺取政权更具有破坏性。它总是以完全失败告终。在阿根廷、巴西和秘鲁,军队在60年代和70年代夺取政权前,是每个国家最受人敬重的机构每次,军队采取行动,仅仅因为国家处于完全崩溃的边缘。它们掌权每次得到大多数、甚至压倒多数民众的支持。但是,它们在交出权力时,已经腐化堕落、名声扫地、道德败坏、几乎彻底被摧毁。

在20世纪的鬼魔学中,广受欢迎的人物是密谋政治权力的阴险企业管理人员。但是,没有一个成功的企业管理人员(既不是摩根、洛克菲勒、克虏伯,也不是其他巨头)对权力感兴趣。他们对产品、市场、收入感兴趣。

在事业取得成就后试图从政的实业家并不罕见——尽管难以成功。但是,我听说,只有两个实业家(都是德国人:胡戈·施廷内斯(1870—1924年)和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1865—1951年))企图利用他们的实业地位控制政府和政治,施廷内斯在20年代初,而胡根贝格则在几年后。他俩给魏玛共和国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而且是导致希特勒最后取胜的主要原因。但是在政治上,他俩都失败了;谋求政治权力最终毁了他们的企业及他们自己。

甚至工会领导人,在追求政治权力时,也毁了他们自己以及工会。

70年代初,英国煤矿工人工会(全国矿工联盟)领导人阿瑟·斯卡吉尔(1938年—)似乎是英国最有权势的人。1974年,他号召罢工推翻保守党政府,使自己成为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正如约翰·刘易斯30年前在美国所做的那样,他取得了罢工胜

利；政府实际上垮台了。但是，斯卡吉尔最后完蛋了，他的工会也完蛋了。10年后，他又号召罢工，以重建他的权力并打败另一个保守党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1925年—），在得到压倒多数公众，甚至包括许多斯卡吉尔的矿工的支持下，制止了罢工。斯卡吉尔所完成的只是使撒切尔夫人能制定法律，严厉地剥夺了工会及其领导人的权力。

可是，在组织社会的所有主要组织中，工会几乎是政治组织。它必须如此。没有政府支持，它无法存在，更不用说繁荣了。在发达国家，靠工会行动取得的进展即使有也是极少数；大多数靠立法取得。但是，除非工会利用其实力推进"劳动者的事业"，即利用其实力履行职责，否则它们不能成功。

然而，组织有社会权力（而且必须有社会权力），而且有许多权力。它需要权力以作出有关人（雇佣人、解雇人、提升人）的决定。它需要权力以建立产生效果所需的规则和纪律，如向个人分配工作和任务，确定工作时间。它需要权力以决定建造什么厂，在哪里建造，以及关闭什么厂。它需要确定价格的权力。

非商业组织实际上有最大的社会权力。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组织被赋予现在的大学所拥有的权力。拒绝入学或授予毕业文凭等于不给人职业和机会。同样，美国医院不让医生享受医院特权的权力实际上是不让医生行医。工会可不让人当学徒或控制只雇佣工会会员的商店的招工，这些同样给了工会极大的社会权力。

这种权力可由政治权力来控制、限制和约束。可以使它受合法诉讼程序支配和法院的复审。但是，组织的社会权力不能由政治当局行使。它必须由个别组织行使。

这个问题的第一种答案是，任何组织都不得拥有权力，除非

是履行职责所绝对必需的。除此之外就是擅权。

第二种答案是,组织的合法权力必须防止滥用。必须有明确的、公开的行使权力规则,必须有复审和向某个公正而不偏袒的人或法院上诉,必须有律师所说的"合法诉讼程序"。

天主教主教对其教区牧师的权力远远大于其他组织的大多数首席行政管理人员。但是,他无权将牧师调离堂区或解雇他。这只能由教区法庭来做,而且只能"为了事业"。主教任命法庭成员,但他不能在他们的任期内调离他们。

但是,对组织权力问题最重要的答案是,从以权力为基础组织向以责任为基础组织转化。此外,这是适合知识组织的唯一答案。

现代组织最早出现于130年前,当时它们以第一个、而且是最成功的新组织(军队)为模式,即1855年至1865年间在普鲁士重建的军队。那支军队当然以指挥和控制为基础。最高层很少数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指挥众多没有受过专门训练、通过反复操练掌握一些动作的人。轻易地打败奥地利和法国(两国投人数量更多的部队,而且法国部队装备更优良)的普鲁士军队,实际上是一条"装配线",而且是非常有效的装配线。它所需要的知识由专业"参谋人员"(即著名的普鲁士总参谋部)提供,后者与"装配线"分开,即不参与行动。

20年代后期,这种组织结构达到顶峰。那些年,它扩展到所有的非军事工作中,而且发展为越来越多的专业参谋人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胜,归根结底是因为美国成功地使指挥和控制组织进人经济领域,即进入工业生产和后勤领域。

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经很明显,指挥和控制组织正

迅速变为过时，不再能满足未来的需要。而且，越来越清楚的是，那些年，众所周知的通过赋予工人责任“感”（以哈佛为基地的“人际关系”学派的要素）修改指挥和控制模式的尝试没有成功。需要的远远不止于心理控制。

那些年，在1942年的《产业工人的未来》和1949年的《新社会》（两本书均将由事务出版社再版）中，我首先开始谈到“有责任的工人”，他们将采取“经理态度”，并负起“经理责任”。但是，只有日本工业予以重视，即使在那里，重视程度也有限。实际上，组织的转变首先始于军队。迄今为止，军队，特别是美国军队，在使组织从以指挥和控制为基础变为以责任为基础方面走得最远。

从指挥到信息

到1970年，信息开始改造组织。我们很快获悉，信息作为结构和有机成分被引进了组织，意味着许多管理（即使不是大多数）层次将消失。在传统组织中，大多数被称为经理的人实际上并不管理。他们向下传达命令，向上传递信息。一旦信息成为近便而可利用时，他们就多余了。

以信息为基础组织的最合适模式不是军队，甚至不是改造后的军队，而是交响乐团。每个演奏者不通过中介，直接对“首席行政管理人员”，即指挥进行演奏。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有同样的“总谱”，即同样的信息。或者它是小型爵士乐队，每个演奏者对“总谱”负责。

然而，我们必须越过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我们必须向以责任为基础的组织发展。在知识工作中，组织日益由专家组成。其中每个人都比其他人更了解他或她自己的专业。老式组织假定，上级知道下级在干什么。因为仅仅几年以前，上级担任的就是下级的职务。然而，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必须假定，上级不知道下级的工作。他们从未做过这工作。

交响乐团指挥可能不知道双簧管如何吹奏。但是，他知道双簧管应起什么作用。同样，外科医生知道麻醉师应作出什么贡献，尽管他或她无法告诉麻醉师如何做麻醉。指挥和外科医生仍然都能评价其队友的工作表现。但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中，经常没有人充分了解专家的工作，无法评估他们作出什么贡献。销售人员并不具备足够的知识去评估市场研究人员的工作。他们甚至不懂研究人员的语言或统计方法。

销售经理也不可能做过销售预测或制定过价格。他们可能不很了解，因此无法告诉预测者和价格制定者做什么。同样，医院管理人员可能从未做过临床试验，无法告诉医学实验室的病理学家，什么是成功的试验，应该怎么做。在今天的军队里，空军中队指挥官也许不能告诉其机务长，出色保养的意思是什么，更不用说如何保养。甚至在工厂层次，特别在高度自动化生产中，工人日益比管理者更了解他们的工作。

从信息到责任

因此，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需要每个人为目标、贡献(实际上还有行为)承担起责任。

这意味着组织的全体成员仔细考虑其目标和贡献，并为此承担责任。这意味着没有“下级”；只有“伙伴”。此外，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中，所有成员必须能通过从效果到目标的反馈控制自己的工作。(40年前，在1954年的《管理的实践》一书中，我称之为“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它还需要所有成员扪心自问：“在这个特定时刻，我能为这个组织及其使命作出的唯一主要贡献是什么？”换句话说，它需要所有成员作为负责任的决策者。全体成员必须把自己看作“管理人员”。

与一起工作的人(上下左右)交流目标、优先考虑事项和打算作出的贡献，也是所有成员的责任。此外，确保自己的目标与整个团体的目标一致，也是所有成员的责任。

仔细考虑应作出什么贡献，即仔细考虑作为知识工作者自己的责任是什么，这种责任就落在每个人的身上。在知识组织中，这是每个人的责任，不管他或她的具体工作是什么。

小型钢铁厂中的97名技术人员在法律上都是“工人”。但是，他们操纵机器，生产出与拥有1000人的综合钢铁企业一样多的钢铁。这些技术人员，每个人都在计算机控制的工作站上不断作出重大决定。他们可以接受培训(他们需要进行培训)。但是，他们不能受人指挥。每个人作出的决定对整个小钢铁厂效益的影响，甚至要比常规钢铁厂中层管理人员大。他们中每个人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该认为你在哪方面负有责任？”他们中每个人也必须回答人们向他提出的问题：“你需要什么信息？”反过来，“你应该给我们大家什么信息？”这意味着每个工人必须是参与以下决策的人：需要什么设备；应如何安排工作；整个工厂的基本经营政策应是什么。在小钢铁厂里，整个团体是一个队，每个队员对组织的工作负有责任。

甚至乍看上去只是从事低级技能(如果不是没有技能)工作的组织也需要改造成以责任为基础的组织。少数公司(一个在丹麦,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日本)已成功地大大提高了从事无需特殊技能工作(实际上是仆役劳动)的人的生产力,如医院、工厂、办公楼的清洁工。上述生产力的提高是靠要求最下层雇员、一开始就拿着水桶和扫把从事清扫工作的人、或者靠下班后从事办公室清理工作的人(为整个队的目标、贡献和业绩)承担责任取得的。这些人比其他人更了解工作。因为要他们负责,他们负起了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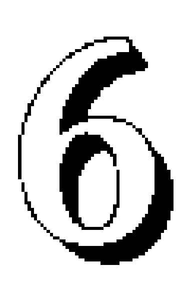
使每个人成为贡献者

现在,有关"应得权利"和"授权"的议论很多。这些术语表明以指挥和控制为基础的组织的终止。但是,它们与旧的术语一样是权利和地位的术语。现在我们应该谈论责任和贡献。因为没有责任的权力根本不是权力;它是不负责任。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使人们负起责任。我们应该问的是,"你应该负什么责任?"而不是"你应该有什么权利?"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中,管理工作不是使每个人都成为老板,其任务是使每个人都成为贡献者。

● 第二部分

政　体



从民族国家到特大国家

在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结构和政体（使用表示政治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旧的——但精确的——术语）的变化完全与社会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一样大。变化是世界性的。而且它们同样完全是既成事实。

昨天的世界秩序正在迅速消失，而明天的世界秩序尚待出现。因此，我们尚未面临今天的政治家所不断召唤的“世界新秩序”。我们正面临一个世界新无序——且没有人知道将会持续多久。

同样，在政治结构和政体方面，我们正进入一个“后”的时代，后主权国家时代。我们已经知道新的力量——而且它完全不同于过去400年里支配政治结构和政体的力量。我们知道新要求，并能描述其中的一些——也许大多数。然而，我们不知道答案、解决办法、新的协调行为。比在社会和社会结构方面更甚的是，舞台上的演员——政治家、外交家、文职公务员、政治学家和政治作家——使用昨天的术语讲话和写作，而且基本上根据（实际上必须根据）昨天的假定和在昨天的现实基础上行动。

似非而是的民族国家的说法

每个人都知道，每本历史书都告诉我们，过去400年的世界历史是西方民族国家的四个世纪。而且只有这一次，每个人所知道的都是真实的——但是它是似非而是的事实。

在这四个世纪里，政治大趋势是超越民族国家范围、以跨国政治制度取而代之的种种努力，不管这种跨国政治制度是殖民帝国还是欧洲的（或亚洲的）超国家。这些是大殖民帝国兴衰的世纪——16世纪出现和19世纪初崩溃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17世纪开始、20世纪继续存在的英国、荷兰、法国、俄罗斯帝国。在这四个世纪里，新的大国一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就着手超越民族国家，将它转变为帝国——188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刚刚统一的德国和意大利参与殖民扩张，30年代意大利又作了一次尝试。甚至美国也在20世纪初成为殖民主义强国。唯一成为民族国家的非西方国家——日本也是如此。

在民族国家发源地的欧洲本身，在这400年里，一次又一次建立跨国的超国家的企图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此期间曾有六次，一个欧洲民族国家企图成为欧洲统治者，将民族国家变成在它控制和统治下的欧洲超国家。

西班牙作了第一次这种尝试，那是在16世纪中期，当时西班牙本身刚刚成为一个统一国家，原先是一群相互争吵的王国、公国、伯爵领地和自由市，以亲王身份将它们不牢靠地连接在一起。而且，西班牙没有放弃成为欧洲主人的梦想，直到100年后，她几乎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毁了自己为止。

几乎紧接着，法国首先在黎塞留、然后在路易十六领导下，步西班牙的后尘——又一次在75年后认输，为此耗尽一切，特别是在金融方面。然而，这并没有吓住法国另一位统治者拿破仑。仅仅75年后，他又作了一次尝试，使整个欧洲因为他企图成为欧洲统治者和建立一个法国人统治的欧洲超国家而遭受20年的战争和混乱。然后，在本世纪，发生了两次德国企图控制欧洲的战争，以及在希特勒失败后，斯大林企图通过武力和颠覆建立俄罗斯人统治的欧洲。正如日本刚成为民族国家就试图建立西方式殖民帝国，她还学西方的样，试图在本世纪建立日本人统治的亚洲超国家。

事实上，不是有民族国家就有帝国。民族国家本身是对跨国运动作出的反应。西班牙帝国在南北美洲出产大量金银，以致在查理五世的儿子和继承人腓力二世统治下，西班牙能为古罗马军团之后的第一支正规军，即西班牙步兵(可能是第一个"现代"组织)提供资金。装备就绪以后西班牙发动了第一次企图控制欧洲的运动，即第一次在西班牙统治下统一欧洲的尝试。与西班牙的威胁作斗争，成为民族国家创始者、法国律师、政治家让·博丹(1530—1591年)在其1576年的《共和国六卷本》一书中公开宣布的目的和动机。正是西班牙的威胁使博丹的民族国家成了整个欧洲的"进步"事业。恰恰因为威胁非常大而且非常真实，博丹的建议才被接受：民族国家及其制度与机构；中央控制的、只对最高统治者负责的文职官员；中央控制军队和中央政府任命并对其负责的职业军人指挥的正规军；中央控制铸币、税收和关税；中央任命的专职法官，而不是由地方要人构成的法庭。上述每一种建议对早期根深蒂固的"特殊利益集团"构成威胁，它们诸如自治教会和被豁免义务的主教管辖区和大修道院；

各种规模的，拥有竭尽忠诚的武装家仆，拥有自己的司法权和征税权的地方领主，自由市和自治同业公会以及许多其他集团。但是，西班牙控制整个欧洲的企图使它们别无选择：要么屈从于国内最高统治者，要么被外国君主所征服。从那时起，欧洲民族国家政治结构的每一次变化，几乎都是由控制欧洲并以法国、德国或俄国轮流统治的超国家取代民族国家的同样企图造成——或至少是激发的。

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政治科学家已经研究过殖民帝国，已经为此发展了一种政治理论。实际上他们什么也没有做。他们集中精力于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和制度与机构。人们应该认为历史学家也已研究过欧洲超国家。但在每所大学里，最负盛名的历史学教授都是国家史教授。著名的历史书谈的都是民族国家，不管是英国还是法国，美国还是西班牙，德国、意大利还是俄罗斯。甚至在英国，最大的并在许多年里最成功的殖民帝国统治者，历史研究和教学仍以民族国家为中心。

美国几乎是唯一的国家，它产生出一位一流历史学家：威廉·普雷斯科特(1796—1859 年)，在他关于西班牙征服墨西哥和秘鲁的叙述中，关心的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帝国。法国一位第一流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 年)没有局限于民族国家研究。他注意到整个欧洲，实际上还有整个世界；但他与其说是政治历史学家，不如说是经济和社会历史学家。19 世纪德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 年)和特奥多尔·蒙森(1817—1903 年)——正是他俩把历史学确认为一门"科学"而没有局限于撰写德国历史。例如，兰克的一本主要著作就是写教皇史的，而蒙森的伟大著作是写罗马史的。但是，甚至他们也忽视了现代政治中向帝国发展的趋势，并把控制

欧洲的企图看作国家历史，即德国、法国或意大利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看作跨越民族国家的事件，乃至作为以跨国政治结构取代它的尝试。

忽视帝国和超国家的一个原因是，两者都没有发展制度与机构。当然，伦敦的贵族院是英国所有领地的最高上诉法院。但是，它作为不列颠群岛上诉法院纯属偶然。同样，从理论上讲，英国议院是英国所有领地的立法机关。但是，它的所有议员是从"联合王国"，即只从不列颠群岛，选出来的。它极少（只有在危机时期）关心联合王国以外的事务。国王或女王统治整个英帝国；可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到过英国领地，直至它们不再成为英国领地，即帝国消亡（此后，现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才开始访问前帝国下属国家）。但是英国比其他国家更接近于建立一个"帝国"。

那些殖民地"帝国"不是虚构。但是它们并不是帝国。它们是一些拥有殖民地的民族国家。人们只需将其与以此取名的政治结构（古罗马帝国）作一比较。殖民地帝国持续的时间几乎与古罗马帝国一样长——达400年。因此，应该有绰绰有余的时间从政治上、社会上和经济上使母国与帝国实现一体化。但是从来没有尝试过。

奥古斯都之后的三位最伟大的罗马皇帝——图拉真（98—117年在位）、哈德良（117—138年在位）和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都是殖民地居民；图拉真和哈德良在西班牙出生、长大，戴克里先在前南斯拉夫出生和长大。他们都不属于拉丁血统；前两人可能是柏柏尔人，戴克里先可能是伊利里亚人或斯拉夫人。但是，谁会把美国的乔治·华盛顿（1732—1799年）、南非的简·斯穆茨（1875—1950年）或印度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层阶级，人数多，地位高。其中很多人在英国最好的大学受过教育，而且所有人都熟谙英国诗歌、莎士比亚、英国法律、英国的哲学和历史。可是，这些人没有一个抓住帝国或与帝国的联系不放。没有一个人试图在实现印度政治自治同时寻求符合宪法、保留帝国文化社区的解决办法。相反，他们是印度独立和印度民族国家最热诚、最坚定的鼓动者。

更令人吃惊的是，俄罗斯帝国缺少一体化。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德意志人（实际上是除犹太人和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之外的欧洲所有人种的人），在沙皇俄国和共产党俄国的几个世纪里，一直受到平等待遇。他们不得不做的就是学习俄语。沙皇的许多将军和部长是德意志人，如维特伯爵，末代沙皇政府中具有改革思想的总理。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苏军最后一位总参谋长是乌克兰人。可是，在苏维埃帝国消亡时，几乎没有亲帝国的情绪，没有亲帝国的政党，没有亲帝国的运动。抵抗完全以民族主义的名义，而不是以帝国的名义。生活在正成为新民族国家，如摩尔多瓦或拉脱维亚地方的少数民族俄罗斯人反对成为摩尔多瓦人或拉脱维亚人，并要求独立。

殖民帝国在成为超越行政概念的任何事物方面的这种无能，即在成为政治社会方面的无能，更是似非而是的，因为它们的出现太容易了（人们很想说"自然了"）。古罗马帝国在一场场流血战争中诞生，而现代殖民帝国诞生时极少打仗。当然，英国人在印度打过仗（但是主要是反对法国人，而不是反对印度统治者）。他们在南非与布尔人大战过一场。但是，除此之外，英帝国建立时几乎没有使用暴力，只有与当地人的一些小规模冲突，每次涉及1000左右的英国士兵。1857年印度反英暴动是在美

国独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爱尔兰脱离英帝国的150年里唯一一次反对英国统治的大暴动。

同样，俄国人遭到的唯一一次反对其帝国扩张的持久抵抗是在高加索，而不是在乌克兰、巴尔干国家(18世纪被并吞)、中亚。法国人为在东南亚和非洲建立其帝国不得不打的仗同样仅仅是小规模冲突，动用的士兵比法国(或任何欧洲国家)在微不足道的欧洲边界冲突中投入的兵力还要少。

可是，在欧洲强国(或日本)显示衰弱迹象时，它的帝国就崩溃了，而且瓦解成为民族国家。甚至英帝国的"白人自治领"(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在摆脱殖民统治后也成了民族国家，尽管它们为其英国遗产和文化传统感到自豪。不存在其他形式的政治一体化。

现代帝国缺少一体化力量。民族国家能独自成为一体，形成一个政体(即政治社会)，创造公民的资格。

在欧洲也没有一个未来的征服者能将超国家融入一种政治结构。他们(从腓力二世到斯大林)所能做的就是用无情力量予以征服。可是，创建欧洲超国家的三次尝试都由有强大吸引力的思想伴随：拿破仑的尝试由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伴随；希特勒由仇恨、妒忌和反犹思想伴随(比我们想承认的更有吸引力，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在希特勒征服欧洲大陆每一个国家之前，对这个国家有的是姑息而不是抵抗的原因)；斯大林由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伴随，这种思想是自基督教以来100年里吸引力最大、最广泛的思想。甚至日本人创建泛亚超国家的企图也建筑在强有力的反西方、反殖民主义思想之上。可是，所有这些企图都因为在将被征服领土转变为一种政治结构方面的无能、在创建政治制度和机构方面的失败、

在创造甚至比圣保罗的“我是一个罗马公民”要求更渺茫的事物方面的失利，而犯了错误。从宗教和种族来讲，保罗是个犹太人，从文化和语言来讲，他是个希腊人；但是“我是一个罗马公民”是一种较高的要求，既是对更高一级法律的呼吁，又是一种超越地理、种族和语言的政治一致的主张。

一切现代帝国和一切超国家都垮台了，因为它们无法超越民族国家，更不用说成为它的继承者了。

但是，尽管民族国家在帝国和超国家存在的几个世纪中就这样成为唯一的政治现实，它本身在最后的几百年中仍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变成了特大国家。

特大国家的方方面面

到1870年，民族国家已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甚至奥地利也成了奥匈帝国，两个民族国家的联邦。1870年的那些民族国家不但看上去并且在行动上仍像300年前博丹发明的君主统治的民族国家。

但是，一个世纪后，1970年的民族国家却与博丹的国家，或者说，实际上与1870年的民族国家，几乎没有什么相像之处。它已变成特大国家(也许与它的1870年的祖先属于同种)，但与后者的区别就像黑豹与猫的区别一样。[①]

---

① 第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不是政治学家或政治家，而是小说家。弗兰茨·卡夫卡(1853—1924年)的两部小说，《判决》和《城堡》，最早对特大国家作了最透彻的分析。两部小说都是在他去世后才发表的。

民族国家派定作为文明社会的护卫者，而特大国家却成了它的主人。走向极端、走向极权的特大国家完全取代了文明社会。极权主义社会成了政治社会。

民族国家派定要保护公民的生活和自由，保护公民财产不受最高统治者随心所欲行动之害。特大国家，甚至是最不极端的英美式的特大国家，认为公民对财产的拥有只能由收税员来决定。正如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年)在其1918年的论文"财政国家"中第一次指出的那样，特大国家坚称公民只能拥有国家明里暗里允许他们保持的财产

博丹的民族国家把尤其在战时维护文明社会作为其第一功能。实际上，这就是"防护"的含义。特大国家日益模糊战争与和平的区别。于是由"冷战"代替和平。

保姆国家

从民族国家到特大国家的转变始于19世纪最后几十年。向特大国家跨出的第一个小步是俾斯麦于19世纪80年代发明的福利国家。俾斯麦的目标是与迅速高涨的社会主义潮流作斗争。这是对阶级斗争威胁作出的反应。在俾斯麦之前，政府只是被视作政治机构。俾斯麦使政府成为社会机构。他自己的福利措施——健康保险、工伤事故保险、养老金(30年后，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发明了失业津贴)——一点也不过分。但原则是过激的；而原则的影响远比以它的名义采取的行动大得多。

在德国的健康保险制度中，所有雇员及其家庭必须保健康险，但可任意选择保险公司。绝大多数公司都是民间的。英国

人实行的失业津贴使国家成为保险公司;但是国家也仅仅是作为财政机构。1935—1936 年将福利国家引入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按同一原则组织的。新政的其他社会举措基本如此,如支持农产品价格的补贴,或土地休耕补贴,从而确保了剩余农作物和支付给农民的福利补贴的减少。

20 年代和 30 年代,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和纳粹分子接管社会公共机构。但是在民主国家里,政府仍然只是承保或至多提供补贴。它基本上仍然不做社会工作,或不强迫公民采取恰当的社会行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情况迅速发生变化。国家从一个提供者而成了管理者。传统福利国家措施中的最后一项(可以认为是最成功的一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即颁布的美国士兵权利法。它向美国每个退伍军人提供了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钱。然而,政府没有试图强制规定上哪所大学。也没有试图开办任何大学。退伍军人如果想上大学,政府就提供钱。然后退伍军人自己决定上什么大学,读什么专业。没有一所大学必须接受任何申请入学者。

战后初期另一项主要的社会计划,英国国民保健制度,是(除极权主义国家之外)第一项使政府超出了承保者或提供者的计划。但仅仅是部分地。对于规范的医疗保健来说,在国民保健制度中,政府是一家保险公司。它赔偿照料病人的医生的损失。但是,医生没有成为政府雇员。病人选择医生也不受任何限制。

然而,医院和国民保健制度提供的医院护理由政府接管。医院工作人员成了政府雇员;政府实际上在管理医院。这是政

府的社会角色发生变化的第一步。政府不再是规则制定者、促进者、承保者、支付代理人，而成为执行者和管理者。

到1960年，政府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和完成所有社会任务最恰当的执行者，这一点已成为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公认的信条。事实上，社会领域中的非政府的、私人活动开始受人怀疑；正直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它是"反动的"或"不公平的"。在美国，政府已成为社会领域实际的执行者，尤其是在试图用政府活动或政府秩序改变多民族社会中的人的行为方面。除极权主义国家之外，至今只有美国政府试图指挥社会价值观和个人行为的变化。

特大国家：经济的主人

到19世纪末，民族国家正在变成经济机构。美国走出了最初几步。它发明了政府对企业的调控以及政府对资本主义经济新兴企业的所有。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逐步对企业实行调控：银行、铁路、电力、电话。这种政府调控（19世纪最新颖的政治发明之一，也是最初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从一开始就被明确地视作"自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视作对资本主义和技术迅速扩展造成的紧张局势和问题所作出的反应。

几年后，美国开始将企业改为政府所有〔首先于19世纪80年代，在内布拉斯加州，在威廉·詹宁斯·布赖恩（1860—1929年）的领导下〕。又过了几年，在1897年至1900年间，维也纳市长卡尔·卢埃格尔（1844—1910年）同样剥夺奥地利首都有轨电

车公司和电力与煤气公司的所有权,改为市政府所有。像与社会主义作斗争的俾斯麦一样,布赖恩和卢埃格尔都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俩是美国所说的"民粹主义者"。他俩在政府所有中首先看到了平息"劳资"之间迅速升级的阶级斗争的手段。

19 世纪(实际上在 1929 年以前),很少有人相信,政府应该或能够管理经济,更不用说政府应该或能够控制衰退和萧条。大多数经济学家相信,市场经济是"自我调节的"。甚至社会主义者也相信,一旦私有财产被废除,经济将自我调节。民族国家及其政府的工作被认为是保持经济增长和繁荣的"氛围"(通过保持货币稳定、低课税,以及通过鼓励勤俭节约)。经济"气候",即经济波动,是任何人无法控制的,即使仅仅因为造成这些波动的事件很可能是世界市场上的事件,而不是民族国家本身的事件。

大萧条产生了以下的信念:国民政府控制(而且应该控制)经济气候。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 年)首先断言,目前国民经济已从世界经济隔离开来了,至少在大国和中等国家里是如此。其次他主张这种与世隔绝的国民经济完全由政府政策,即政府支出所决定。今天的经济学家,不管在其他方面与凯恩斯有多大的不同,他们——弗里德曼货币学派的支持者、供应经济学政策提倡者和其他后凯恩斯主义拥护者——都追随凯恩斯的这两个信条。他们都使民族国家及其政府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人和经济气候的控制者。

财政国家

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使民族国家变成"财政国家"。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前，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府都只能（甚至在战时也只能）从人民那儿得到该国国民收入的很小一部分，也许是5%或6%。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每个交战国，甚至最穷的交战国，都发现政府几乎可以无限制地榨取人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有交战国的经济已全部货币化。结果，两个最穷的国家，奥匈帝国和帝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若干年里，能够征到的税款和借到的资金实际上比其人民的年收入还要多。它们设法清理数十年（如果说不是几百年）里积累的资本，并将其变成战争物资。

约瑟夫·熊彼特当时仍住在奥地利。他马上明白了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其他经济学家和大多数政府需要第二次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然而自那时起，所有发达国家（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成了“财政国家”。它们开始相信，在经济上，对于政府的征税和借贷没有任何限制，因此对于它的支出也没有任何限制。

熊彼特所指出的是，只要政府在运作，制定预算过程就必须从对可利用税收的评估开始。支出必须与这些税收相称。而且，由于“高尚的事业”对支出的需求是无限的，因此制定预算过程大多是决定对哪些支出项目说“不”。只要人们知道税收是有限的，政府的运作受到极大的约束，不管它是民主政府还是像帝俄沙皇那样的专制君主政府。这些约束使政府不可能成为社会机构或经济机构。

但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更多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制定预算过程实际上意味着说“是”。

传统上，政府，政治社会，只能利用文明社会给予它的手段（而且是在可以货币化的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几这个非常狭窄的

范围内)。只有这笔钱可以转化为税款和贷款,并因此转化为政府的岁入。新的分配方案假定,在经济上对政府所能获得的税收没有任何限制,根据这种方案,政府成了文明社会的主人,能够塑造社会并使之成形。利用税收和支出,政府首先能重新分配社会的收入。通过财权,它能,或曾获得许诺能按政治家的概念塑造社会。

但是,同样根据新的分配方案,把国民收入视作政府所有,而个人只拥有政府愿意让他们拥有东西的权利,这样做也是很容易的。1914 年前,实际上是 1946 年前,没有一个人提到"税则漏洞"。早期的假设是,一切属于个人,除非在由纳税人的政治代表,不管是专制政府还是议会,已明确转让给政府的时候。

然而,"税则漏洞"这个术语意味着,一切属于政府,除非专门指定由纳税人保留的时候。不管纳税人保留什么,他们能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政府的明智和慷慨愿意让他们拥有它。

当然,这一点只是在共产党国家里变得显而易见。但是,甚至在美国,特别是在肯尼迪时期,华盛顿,特别是在华盛顿的官员中,流行的看法是除了政府明确允许纳税人保留的以外,所有收入均属于政府所有。

冷战国家

福利国家、作为经济主人的政府、财政国家——这一切都产生于社会和经济问题,以及产生于社会和经济理论。产生特大国家、冷战国家的最后一次变化,是对技术作出的一种反应。

它的起因是 19 世纪 90 年代德国决定在和平时期建设一支

庞大的海军威慑力量。这触发了一场军备竞赛。德国人知道，他们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事实上，大多数德国政治家反对这个决定。但是，德国海军将军们深信，技术使他们别无选择。现代海军意味着装甲舰艇。而这种舰艇必须在和平时期建造。像传统政策强制规定的那样要等待战争爆发，那就会意味着要等很长时间。

从1500年左右以来，那时骑士已开始过时，打仗日益使用和平时期在普通设施里生产的武器，而且尽量少耽搁、少改动。在美国内战期间，火炮仍然只是在战争爆发后，在经仓促调整后的和平时期车间和工厂里生产。纺织厂几乎一夜之间就从制造民用服装改为生产军服。19世纪下半叶发生的两次大战，美国内战(1861—1865年)和普法战争(1870—1871年)，基本上仍由投入战斗前几星期刚穿上军服的平民打的。

1890年的德国将军们认为，现代技术改变了这一切。战时经济不再是平时经济调整的产物。两者必须分开。武器和士兵都必须在战争爆发前能大量获得。生产这两者之中的任何一种都需要越来越长的准备时间。

德国人的论争中没有明晰说出的是，防御不再意味着使战争远离文明社会和民用经济。在现代技术条件下，防御意味着一个永久的战时社会和战时经济。它意味着"冷战国家"。

本世纪之交最敏锐的政治观察家、法国社会主义领导人让·饶勒斯(1859—1914年)，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认识到这一点。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认识到这一点；这是他建议成立国家联盟，即一个监督国家军备的常设组织的依据。1923年(流产的)华盛顿海军军备会议是将扩军作为军控手段的第一次尝试。

但是，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还试图恢复"正常的"和平时期的国家。它试图尽快地、尽可能全部地解除武装。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期，冷战的降临改变了这一切。自那时起，冷战国家成了国际政治的主要组织。

到 1960 年，特大国家成了发达国家中的政治现实——在各个方面：作为社会机构、经济的主人、财政国家——而且在大多数国家里，作为冷战国家。

日本乃例外

唯一的例外是日本。不管"日本公司"的说法有什么道理（而西方对这个词的理解没有什么道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没有成为冷战国家。他们的政府没有试图成为经济的主人，也没有试图成为社会的主人，而是在溃败后按照事实上是19 世纪的传统路线重建了自己。当然，在军事上，日本别无选择。但是日本几乎没有制定任何社会计划。唯一的例外是国民健康保险，这基本上也是获胜的美国人在占领期间强加给它的。日本没有对产业实行国有化。事实上，日本是唯一使早先国有化的产业（如钢铁业）恢复私有制的发达国家（在 80 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的英国开始对工业实行"私有化"之前）。

从传统的政治理论，即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的政治理论来看，日本显然是主张"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的国家。但是，与英国和美国相比，它属于 1880 年或 1890 年德国或法国的那种"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的国家。它有一个庞大的文职部门（虽然按比例来说并不比讲英语国家的文职部门大）。政府部门享有极

www.55188.com 理想在线证券网

大的特权，深受尊敬，就像1890年德国、奥匈帝国或法国政府部门深受尊敬一样。日本政府与大企业密切配合，同样与19世纪末欧洲大陆国家政府和经济利益集团的合作没有两样，而且事实上与本世纪初美国政府和企业或农场的合作没有太大的区别。

如果将特大国家作为标准，即如果判断政治制度的基础是现实而不是理论，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政府的作用最受限制，事实上最为克制的国家。用传统的19世纪的观点来看，它极其强大。在20世纪世界其他地方的政府已经进入的那些领域中，它最不突出。日本政府基本上仍是一个卫士。[1]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70年代中期的30年里，整个世界走向特大国家。

日本一直是唯一的例外。发达世界的其他地方已普遍走向特大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也迅速跟着做。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刚从帝国解体的废墟中诞生，就立即采取新的军事政策，即在和平时期建立战时军事权力结构，制造或至少采购战时所需的先进武器。它立即试图控制社会。它立即试图使用税收机制重新分配收入。最后，几乎无一例外，它试图成为经济的管理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所有者。

至于政治自由、知识自由和宗教自由，极权主义国家（尤其

---

① 1915年，才华横溢的美国社会学家索尔斯坦·维布伦（1857—1929年）在一本名为《德意志帝国和产业革命》的书中试图解释德国取得经济支配地位的原因。三分之二个世纪后，美国经济学家查默斯·约翰逊，该国最主要的日本经济政策专家之一，同样试图在一本名为《通产省和日本奇迹》的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2年）中解释日本成为经济大国的原因。约翰逊坚信战后日本经济政策源自日本，完全是日本的发明。可是，维布伦称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40年使德国经济急剧增长的政策与约翰逊所说的政策异常相似。

是像斯大林主义那样的国家)和"民主国家"(在许多年里,主要是指讲英语国家)完全针锋相对。但是,就有关政府的基本理论而言,这些体制更多的是在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种类上的不同 民主国家有不同的办事方式,但在应该做什么方面则没有什么多大的区别。它们都把政府视作社会和经济的主人。而且它们都把"和平"视作"冷战"。

特大国家是否已起作用?

特大国家是否已起作用? 在它最极端的表现形式中,在极权主义中,不管是纳粹还是共产主义,它肯定已是一次彻底的失败——而且毫无挽回的余地。可以这么说,冷战国家对苏联来说,在军事上起了作用。它在40年时间里是一个军事超级大国。但是,实行军事体制的经济和社会负担重得无法承受。它肯定对共产主义以及俄罗斯帝国的崩溃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特大国家在它远比极权国家温和的方式下是否已起作用? 它是否在西欧发达国家和美国起了作用? 答案是:几乎没有什么比极权国家好的地方。总的来说,它在那儿几乎像在希特勒的德国或斯大林的俄国一样是一次惨重的失败。

特大国家作为财政国家最不成功。在任何地方,它都没有成功地进行富有意义的收入再分配。事实上,过去40年已充分证实了帕累托定理[以瑞士裔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1848—1923年)命名]。按照这个定理,在社会主要阶级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取决于两个因素,而且只有两个因素:社会文化和经济中的生产力水平。经济中的生产力越高,收入越平均;

生产力越低，收入越不平均。帕累托的定理断言，税收不能改变这一点。财政国家的倡导者提出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以以下的断言为基础：税收可以有效地、永久地改变收入分配。我们在过去40年里取得的所有经验证明这种断言是不能成立的。

最明显的例子是苏联。尽管冠冕堂皇地讲要致力于平均分配，但是它建立了一支非常庞大、名称繁多的享有特权的官员队伍，他们的收入水平甚至远远超过沙皇时代富人的水平。苏联的生产力越是停滞不前，收入就越是不平均。但美国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只要美国生产力提高，即到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为止，收入分配就逐步趋于平均。富人仍然越来越富，但穷人富得更快；中产阶级变富的速度甚至更快。在美国生产力增长速度放慢或为零时（即随着越南战争开始），不管税收如何，收入随即开始逐步趋于不平均。在尼克松和卡特时期对富人实行重税与在里根时期大大减轻对富人的征税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同样，在英国，尽管公开承诺人人平等，尽管税收制度旨在最大限度减少收入不平等，但在过去30年里，由于生产力停止增长，收入分配持续地趋于不平等。

尽管发生种种腐败现象和丑闻，但如今最平等的国家是日本（该国生产力提高最快，而通过税收重新分配收入的尝试最少）。

特大国家的另一个经济主张，以及现代经济理论的另一个经济主张，即如果政府控制国民总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就能成功地管理经济，同样被证明是不能成立的。而英美两国完全接受这种理论。可是，它们在经济衰退的次数、严重程度和延续时间上并未有所消减。衰退出现的次数与19世纪时一样多，延续时间一样长。而那些没有接受现代经济理论的国家（日本和德

国都没有接受)，与一些认为政府的盈余或亏损，即支出的大小，能有效地管理经济，也能有效地减少周期性波动的国家相比，它们的衰退次数少，严重程度低，延续时间短。[①]

财政国家的一个结果是适得其反。所有发达国家(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已成为大肆挥霍者，以致它们在衰退期间无法再增加其支出。但是，按照所有的现代经济理论，这个时期理所当然是它们应该增加支出以创造购买力并以此振兴经济的时候。每个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已达到其征税能力和借贷能力的极限。它们在大发展时期就在这些方面达到了极限，而按照现代经济理论，在这个时期，它们本该积累可观的盈余。财政国家已耗尽了自己终而陷于无能为力。

财政国家的另一项基本原则也已证明站不住脚。凯恩斯和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最重要部分是，相信税收总额是唯一要紧的事。过去的40年已证明，征什么税与征多少税是同样重要的事。经济学家称之为征税的影响范围是具有决定性的(这个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学家却蔑视地不予考虑)。[②] (关于这一点，可参阅第八章)

---

① 为支持现代经济理论及其能够控制衰退的断言而经常引用的例子，即所谓美国60年代初的"肯尼迪削减税收"，只是海市蜃楼。实际上没有这样的削减税收。联邦税收确实削减了，但同时州和地区政府增加税收，而且超出了联邦政府削减的数量，以致税收总负担实际上增加了。尽管如此，经济还是复苏了，而且完全按时间表进行。根据时间表，没有政府干预本来也会复苏。

② 有关这一点的基本工作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很久由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塞利格曼(1861—1939年)做的，特别是在他1892年的杰作《赋税转嫁和征税的影响范围》中。

政治拨款国家

最糟的是，财政国家已成为"政治拨款国家"。如果编制预算从支出开始，那就没有财政行为准则了。政府支出成了政治家买选票的手段。反对旧制度——18世纪君主专制政体的最有力理由是国王利用国库使其宠臣中饱私囊。当选的立法机关的财政会计责任，特别是预算会计责任是使政府负起会计责任，阻止侍臣掠夺国民财富。在财政国家里，掠夺财富是政治家干的，其目的为了确保他们自己当选。

美国(联邦、州、市)的预算不断增大的一个部分花费在对非常小的地方选民群体的补贴上：北卡罗来纳州少数种烟草的农民；佐治亚州数量更少的花生种植者；路易斯安那州甘蔗种植者；中西部一个州的一些在逐渐过时的产业；领取社会保险金的退休人员中5%最富的人；其土地被用于建造并非出于经济目的的运河或堤坝的土地所有者；没有军事意义的军事基地旁小镇。美国政府总支出有多少花在向无助于公共政策目标的选民赠送的礼品上(在许多情况下完全与公共政策不相关的)，没有人完全知道。但是，在联邦和州预算中所占比例非常高(比任何人所能知道的要高得多)。在日本，政治家的作用被日益看作将大笔钱从国库转移给少数选民(转移给修建不知通向什么地方的高速公路，给补贴种植这种庄稼或不种那种庄稼，等等)，其所达到的程度已成为一种公开的丑闻。

最无耻、最庞大的用政治拨款购买选票的事件发生在1990年秋天的德国，当时赫尔穆特·科尔总理，为了(成功地)购买他

的前东德新选民的选票，使他的国家背上了和平时期最大的公共债务。

民主政府坚信，当选代表的首要工作是，保护其选民不受贪婪政府的危害。政治拨款国家因此日益破坏了自由社会的基础。当选代表欺诈选民，使特殊利益集团中饱私囊而由此购买他们的选票。这是对公民概念的否定(而且开始被认为正是如此)。从选民参与投票的不断下降就可以看到当选代表们的这种行径正在破坏代议政体的基础。这一点也从所有国家中人们对政府的功能、问题和政策的关心逐步淡漠中看出。相反，选民日益根据"这对我有什么好处?"来投票。

1918 年，约瑟夫·熊彼特警告说，财政国家将最终破坏政府的治理能力。15 年后，凯恩斯把财政国家赞颂为伟大的解放者：由于支出不再受限制，财政国家的政府能有效地治理国家。现在我们知道熊彼特是对的。

在某种程度上，特大国家在社会领域比在经济领域更为成功。尽管如此，它甚至还没有达到及格分数线。更确切地说，很起作用的社会行动和社会政策是那些基本上不符合特大国家原则的行动和政策。它们是遵循早期规则和概念的社会政策。它们是起调整或准备作用的社会政策。它们不是使政府成为实干者的社会政策。除了极少数例外，这些都不成功。

在英国国民保健制度中，因普通医师为病员名单上的病人看病而支付给他们的那部分费用发挥了极好的作用。但在其他部分，即在政府管理医院和实施保健计划的地方，问题却层出不穷。费用高，而且与其他国家保健费用上升得一样快。病人得等上几年才能轮到做非急需施行的手术，即治疗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的疾病，不管是髋关节替补、脱垂子宫的固定还是白内障

的去除。病人在这些日子里非常痛苦，常常丧失能力，这一点却无关紧要。政府作为实干者已无能为力，以致英国政府现在鼓励医院"退出"国民保健制度。政府将像付钱给普通医师那样付钱给医院，但将不再管理医院。

同样有启发意义的是美国向贫困开战的政策，这是约翰逊总统于60年代善意提出的。其中一项计划发挥了作用。那就是"良好开端"计划，它付钱给独立的、由地方管理的组织，由它们教育下层社会（主要是黑人）的学龄前儿童。然而，政府自己管理的计划，没有一项取得成果。

过去10年或15年里最成功的社会政策都是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把计划"包给"企业或非赢利机构的那些政策。成功地"包出去"的计划数量在增加，而且增加得很快。原先清扫街道的服务是包出去的。但是现在，美国正在把"良好开端"计划或青年犯法者改造等社会计划包出去。而且至少在美国，我们将日益把学校教育包出去。美国日益主张实行"付款凭单制"，根据这种制度，家长可以决定他们想送孩子到哪所学校去，公立的、甚至私立的都行，而由州里向家长选择的学校付钱。换句话说，我们正开始将40年前在有关高等教育的美国士兵权利法中学到的东西应用于初等教育。政府制定规则，政府确定标准，政府作准备。但是政府并不具体干。

冷战国家：成功的失败

冷战国家不保证"和平"。战后时期的小冲突与历史上任何时期一样多（而且遍及全世界）。但冷战国家使避免世界大战成

为可能,不是无视庞大的军火库,而恰恰是因为有庞大军火库在。

军备竞赛使军控成为可能,这导致现代史上最长一段没有大国战争的时期。现在已有50年没有大国军事冲突了。拿破仑战争后维也纳会议的和平解决(受到当代亨利·基辛格这样的现实政治家的称赞)使大国保持了38年的和平——从1815年到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然后,在差不多20年的大冲突(美国内战、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战争、法德战争)之后,从1871年至1914年又是43年没有大国之间的战争(除了1905年日俄战争之外,但是当时日本还没有被认为是大国,一直要到那场战争之后才被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只有短短21年时间。因此,1945年以后将近50年没有大国战争是最高记录。正是因为大国成了冷战国家,所以它们能控制军备,并因而确保它们之中没有一个能拥有优势的军事力量而甘冒巨大军事冲突的危险。

最好的例子是古巴导弹危机。这场危机主要因肯尼迪总统未能在柏林墙问题上勇敢面对俄罗斯以及在猪湾入侵古巴期间的估计错误和优柔寡断而造成的。这使赫鲁晓夫相信,美国会让步并接受俄罗斯在西半球建立核基地。然而,在美国明确表示不能容忍这种挑衅时,俄国人马上缩回去了——而且由于赫鲁晓夫草率地作出错误判断由此冒了与另一个大国发生大冲突的风险,他很快就被自己的军队推翻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50年已充分证明了作为冷战国家基础的基本假设。现代战争的武器不再能够在同时也生产和平时期所需商品的设施中生产了。它们的生产不能靠将民用设施转为战时生产的办法,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基本上仍是这样

做的。相反,生产现代战争武器——不管是航空母舰、激光制导炸弹还是导弹——的设施必须在战争爆发前,甚至在出现战争威胁前早早就建造。

如果需要有关这些假设的证据,1991年反对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能使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事力量之一瘫痪、并在战争史上最短的时间内决定战争胜负(打破了1866年创造的记录,当时普鲁士人在4星期内打败了奥地利人)的武器,没有一件能在供和平时期使用的设施中生产。每一个武器系统,如要在战场上发挥作用,事先至少要工作10年,在大多数情况下要15年。

因此,再也不能回到传统民族国家建立时所依据的假设上去:由民用经济设施转为战时生产,同时,只需要一支由预备役军人作为补充的小规模军事力量坚守阵地就足够了。

但是,冷战国家起作用的50年也已过去了。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军备控制。如果把"和平"界定为没有军事力量,那就不会再有和平。天真一旦丧失,就不会恢复。但是,冷战国家再也站不住脚。它再也不起作用了。

冷战国家在经济上是自我毁灭。如上所述,苏联成功地建立一支极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这支军事力量带来的负担重得难以承受,以致它成了苏联经济和社会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的负担同样很重。正如大家所公认的,日本和德国在经济上干得很出色而美国却落后了,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为其防务所累。经济负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或6%)是个次要问题。问题在于最紧缺的资源(受过专门训练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被用于经济上无利可图的防务工作。在美国,花在研究与开发上的钱,70%花在防务工作上。在日本只有5%不到。这

掩盖了更为重要的质量上的差别。美国的防务研究吸引了最优秀、才华横溢的青年工程师和科学家，从而使美国经济缺少最需要的营养，即知识。过去40年，美国最能干的工程师致力于发展“激光制导炸弹”，而日本最能干的工程师却在改进传真机或消除汽车车门的碰撞声。和平时期商品和战时商品不再采用同一技术、同一工序和在同一设施里生产。因此，即使有“附带结果”，也不会有很多。美国在将防务研究成果转化为民用产品方面花了巨额的钱，而成果几近于零。

更糟的是冷战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要不是拉丁美洲国家把钱和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浪费在建设庞大而没有任何军事价值的武装部队上，那就不会是在东亚而是在拉丁美洲出现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奇迹”了。

一个国家(甚至是最富裕的国家)，在和平时期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或2.5%以上花在军备上(仍相当于日本的两倍)，就别想在世界经济中长期保持其竞争力。它将日益受到通货膨胀的压力。事实上，它应被认为没有资格接受信用贷款的。

但是，即使在军事上，冷战国家也不再起作用。事实上，冷战国家不再能保证军备控制。今后再也不可能通过阻止小国家发展总体战能力，不管是核战、化学战还是生物战能力，以维持“超级大国垄断”。在苏联瓦解成民族国家时出现的对其核武库控制的担忧只是一种迹象。在人口或经济实力方面微不足道的许多国家正在迅速获得核战、化学战和生物战能力，这个事实也是一种迹象。伊拉克是一个例子，利比亚是另一个例子，伊朗、北朝鲜和巴基斯坦也是如此。当然，这些小国家打不赢大国(正如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仍然相信的那样)。但是它们能成为国际敲榨勒索者和国际恐怖主义者。以这些国家为基地，一群

群冒险者(实际上是以地面为基地的海盗)能胁迫世界同意其提出的要求。

因此,军备控制再也不能在冷战国家里和通过它来实行,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这样做了半个世纪。除非军备控制超越国界,否则根本无法实行——这将使全球性冲突几乎不可避免,即便主要大国设法避免它们之间的热战,也是如此。

不像财政国家和保姆国家,冷战国家并没有完全失败。鉴于在绝对的武器时代,国家的政策目标可以说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它必须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特大国家唯一的成功。但是这个成功最终变成了(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失败。

特大国家就这样走进了死胡同。但是,唉,不会像新保守主义者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想使我们相信的那样,返回昨天的民族国家去。因为出现了新的力量,它们在谋略上胜过并在逐渐损害民族国家。

7

跨国主义、地区主义、部落主义

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政治家和政治学家就警告说,民族国家开始过时了,要求建立多国的机构。事实上,19世纪已经创造了不少多国机构。此前几个世纪中签署的条约都是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的。19世纪,签订了一个又一个多国条约。该世纪的上半叶,产生了消灭海盗行为和奴隶买卖以及保障海洋自由的多国公约。19世纪下半叶的多国条约,如万国邮政协会和国际红十字会,第一次建立了非国家的、实际上是跨国的机构。20世纪初,海牙国际法院成立,对民族国家之间的争执拥有管辖权。然而,这些非国家的或跨国的条约和机构被认为是处理"技术"问题的,因而不侵犯国家主权。(然而这种说法无疑是一种虚构。国际红十字会在战时有权视察战俘营;海牙法院对民族国家之间的边界争执有管辖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般人都认为,民族国家已过时。这种看法是建立第一个公开宣布的跨国机构(国际联盟)尝试的基础。但是,历史随即证明它是无能为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联合国,在其头40年里,主要是作为超级大国的角斗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跨国货币的尝试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提出的。但美国人使之成为泡影。反过来，美国的原子跨国化建议（对核能和核武器实行跨国控制的巴鲁克计划）遭俄国人拒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成功的发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显然意味着在一个对主权来说至关重要的领域（即对外贸易）施加跨国主义，但很少能够战胜民族利益。

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前真正帝国继任者的民族国家数量急剧增加，民族国家向特大国家的突变也急剧增加。

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里——也许从70年代开始——民族国家开始四分五裂。在一些主权已失去全部意义的关键领域内，它已经遭到失败。每个政府面临的新挑战越来越多地是无法靠国家、甚至国际行动来对付的挑战 这种新的挑战需要那些拥有自己"主权"的跨国机构。地区主义也在日益使民族国家靠边站。而在国内，民族国家正遭受部落主义的破坏。

货币没有祖国

"货币没有祖国"是一句很老的话。但是人们创造出民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用来证明它是不正确的。对货币的控制正是所谓"主权"的核心所在。但是货币摆脱了控制，跨出了国界。它不再受民族国家控制，甚至不受它们的行动控制。

中央银行不再控制货币流动。但是中央银行能设法通过提高或降低利率来影响货币流动。但是，在货币流动中，政治因素日益变得与利率同样重要。不受任何中央银行控制的货币数量，即每天在跨国市场（纽约外汇市场或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市

场)上交易的数量,大大超出了为国内和国际交易提供资金的需要,以致货币流动逃脱了政府想加以控制、限制的企图,更不用说加以管理了。

信息也没有祖国

信息不包括在博丹所提出关于主权的属性之内——16世纪末没有很多信息。但是,当本世纪出现大众媒介(印刷品、电影或无线电广播)时,对信息的控制立即被国家主权的新实践者,极权主义者,视作是绝对必要的。从列宁开始,他们中的每个人(墨索里尼、斯大林、希特勒)都试图对信息实行完全控制。而且在民主国家里,对信息(特别是对电视)的控制日益成为政治家和政治的必要技巧。

至今,信息已完全像货币一样跨出国界。政府依然能控制新闻节目。但是,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私下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广播的人与收听晚间新闻中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讲话的人一样多。可是,新闻节目在"信息"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小。任何一条30秒广告,任何18分钟一集的肥皂剧所包含的信息与费尽心机控制的新闻节目一样多(可能更多)。对信息来说,不再有国界。历史上最专制的政权在控制使用信息方面越来越显得无能为力,这肯定是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帝国崩溃的主要因素。

信息可能会失真;达拉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之一,传递的美国人的生活图景,甚至不及一幅漫画。但这并没有改变以下的事实:与其他"信息"相比,有更多的国家、更多的人

收看达拉斯节目。即使在共产党的中国，也不能不让它播放。在今后几年，由于抛物面接收天线变得非常小，以致秘密警察无法阻止人们在家里使用，由于卫星在太空中向全球任何一个地方播放节目，不管怎样，信息将真正成为跨国的，真正摆脱任何一个国家的控制。关心自己的民族文化完整的国家（如日本或法国）会试图保持自己对大众化信息的极有效控制。但这种尝试是徒劳的，大量的事实已证明了这一点。

通过一家跨国机构恢复对货币的控制，也许是可能的。欧共体正在朝欧洲中央银行和欧洲统一货币方向发展。但这等于对经济和税收政策实行跨国控制。它使民族国家在经济领域降低到地方行政管理人员地位。就信息而言，这种跨国机构甚至是不可能的，即使在世界独裁政府统治下也是如此。现代技术使个人掌握了阻止对信息实行专制控制的手段。共产党人在试图保持对信息的控制的最后一次努力中，仍企图禁止传真机和复印机的使用。这仅仅导致地下出版物，数百、数千学生手抄的原稿，在苏联各地自由流传。一旦人们在家里拥有便携式电脑、传真机、电话、复印机、录像机（更不用说能从头顶上空的卫星接收信息的电视机），你就根本没有办法重新建立对信息的控制。

货币跨越国界，通过使国家经济政策失效的办法胜过民族国家。信息跨越国界，通过暗中破坏（实际上是摧毁）"民族的"与"文化的"同一性的息息相关之感胜过了民族国家。如果大多数法国人更喜欢查利·卓别麟的作品，而不是法国作家写的剧本和在法国上演的戏剧，那么作为一个"法国人"意味着什么呢？1920年，电影刚刚出现时，一位评论家这样问。但是现在，比起自己国家上演的任何戏剧，法国人（以及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俄罗斯人、日本人和中国人）更喜欢查利·卓别麟继承者的作

品、情景喜剧或"文献电视片"、"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一样超越了国界。建筑传递的"信息"肯定与电视剧或新闻公报一样了不起；在东京建造的办公楼与达拉斯或杜塞尔多夫的没有什么区别。

跨国的需要：生态环境

同样重要的（从长远来看更为重要的）是对真正跨国机构，即对在本身领域内超越民族国家的机构，不断增长的需要。这些机构能够（实际上它们必须）在广泛的领域里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这些决定和行动绕开主权的障碍，直接控制民族国家的公民和组织。这些决定把民族国家搁置一边或将它转化为跨国机构的代理机构。

这些领域中，第一是生态环境。地方上需要采取行动来防止破坏性污染。但是对环境最大的威胁不是地方上的污染，不管它是造纸厂的废水、城市污水中排入海洋的废物或地方农场排出的农药和化肥。危险是对人的住处、大气、可以说是地球的肺的热带森林、地球上的海洋、它的水供应和空气（人类依赖的环境）而言的。然而也有必要在环境保护和发展中世界因人口迅速增长而提出的需求之间进行权衡。

这些不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解决的挑战。污染与货币或信息一样没有国界。

可能是欧洲最大自然资源的斯堪的纳维亚森林，正在因英格兰中部地区、苏格兰、比利时和德国的污染而遭受破坏。同样威胁加拿大森林（也许是北美最大自然资源）的酸雨产生于美国

中西部。

但是，保护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实际上意味着对不断增长的巴西人口养活自己的能力在短期内实行严厉的限制。谁来为此付出代价？如何做到这一点？

扑灭恐怖主义

第二，仅次于生态环境的是，日益增长的采取跨国行动和建立跨国机构以阻止私人军队的复活，即扑灭恐怖主义的需要。1991年冬天和春天对伊拉克采取的军事行动就是一个起点。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上，第一次由几乎所有民族国家在一起采取共同行动镇压恐怖主义行为——因为这正是伊拉克人侵科威特所集中体现的。

400年来第一次私人军队重又出现了。17世纪日本（1600年左右）和50年后的欧洲决定，只允许民族国家保持一支军事力量。但是，随着核炸药、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问世又使私人军队成为可能。由于非常小的集团甚至能有效地将大国扣为人质，恐怖主义越发具有威胁性。一颗核弹能轻易地放人任何大城市的锁柜或邮箱内并通过遥控爆炸（内含炭疽孢子的细菌弹也是如此，它足以杀死数以千计的人，并污染大城市的供水，使之不再适宜居住）。

20年前，许多国家，特别是共产党国家，认为恐怖主义可以用作国家政策的工具。例如，西德的恐怖主义集团是在东德召募人员、筹资和培训的，这几乎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和利比亚都招募、资助和培训恐怖主义集团（例如，日

本赤军)以恐吓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这也几乎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至今，大多数国家(虽然决不是所有国家)认识到，这是产生相反效果的。但是，仅仅不支持恐怖主义是不够的。消除(或者至少控制)恐怖主义威胁所需要的是跨国行动、越出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范围的行动。这是有一个先例的：19世纪订立了消灭奴隶买卖和使公海上的海盗行为成为跨国犯法行为的那些条约。

跨国军备控制

第三(而且与消灭恐怖主义密切相关的)是对跨国军备控制的需要。这种需要在前一章已论述过。

最后(至今依然是猜测)，是否将有一个跨国机构来监督和行使人权？是否应该有这样一个机构？这种机构是否，比如，能阻止希特勒的大屠杀？吉米·卡特，在70年代当美国总统时，对这种机构完全表示赞同。实际上，这种机构产生的原因可能是，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潮水般的拥入给兴旺发达国家造成的威胁，除非采取跨国行动以制止种族、宗教、政治和民族的迫害。

比起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大多数政治家)的认识，我们可能已朝着跨国主义的方向走得更远了。就生态环境而言，我们已接近于采取跨国行动以阻止，或至少延缓，臭氧耗竭和“温室效应”，即全球变暖。我们已接近于采取跨国行动以保护海洋及其资源。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保护南极洲的多边条约。

就恐怖主义和军备控制来说，实际上的转折点可能就是伊拉克战争，尤其是授权联合国机构摧毁伊拉克的恐怖武器（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而不将此任务交给美国指挥的军队去完成的决定。更早一些，美国政府，在一个完全史无前例的（实际上违背美国以前所有法律原则的）步骤中，建议成立国际刑事法庭，直接对任何地方的恐怖主义行动行使管辖权。此外，俄罗斯共和国新政府恢复了1947年的原巴鲁克计划，并建议将全世界所有核武器的控制权交给一个跨国机构，这实际上将导致消毁全世界所有核武器，以及采取跨国行动阻止任何国家建造核武器设施的企图。

所需的跨国机构的设计任务依然摆在我们面前，有关这些机构的发展速度问题也是如此。使国家政府乐意接受这种跨国机构的领导及其决定，很可能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这种机构的发展、关于它们活动范围的决定、它们的章程、它们的权力、它们与国家政府的关系以及它们的筹资（例如，它们是否应有自己的征税权？）依然有待我们去解决。实际上，我们完全没有准备——关于1991年在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的费用由谁来支付以及支付多少的无谓争执即是明证。但是，可以预言，今后几十年里，跨国机构的设计和组建将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这意味着主权限制将成为国际关系中和国内外政治中的一个主要问题。

新现实：地区主义

国际主义不再是乌托邦；它已露出端倪（但仅仅如此而已）。

www.55188.com 理想在线证券网

地区主义是现实；地区主义没有创造出其政府取代国家政府的超国家。它创造地区管理机构，它们在重要领域使国家政府降格，并日益使之不相干。

地区主义趋势始于欧洲共同体。但今后将不局限于此。欧洲共同体一开始是一个"共同市场"，即一个纯经济组织。现在它已承担越来越多的政治功能。它即将创建欧洲中央银行和欧洲货币。但是它还对进入行业和职业具有管辖权；对兼并、收购和卡特尔，对社会立法，对可能被看作是商品、服务和人员自由流动的"非关税壁垒"的一切事物。它现在正在朝创建欧洲军队方向迈进。

欧洲共同体又激发了创造一个围绕美国建设的但又将加拿大和墨西哥融入共同市场的北美经济共同体的尝试。至今，这种尝试就其目标而言是纯经济的。但从长远来说，也许不会永远这样。

这一点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北美经济共同体的推动力不是来自美国，而是来自墨西哥。可是，自墨西哥在贝尼托·华雷斯（1806—1872 年）任总统期间完成统一以来的 150 多年里，它的政策目标一直是，与北方那个一意孤行、完全格格不入的大国邻居尽可能保持距离。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相邻的国家，像墨西哥和美国那样，在语言、宗教方面，但首先在文化、价值观和传统方面，有如此大的差异。可是，墨西哥最终不得不承认，150 年的孤立主义政策以失败告终；为了作为一个国家和文明生存下去，它不得不使自己与北方那个危险的、格格不入的大国邻居融合在一起，至少在经济上必须如此。

墨西哥建议签订的建立墨西哥和北美其他两个国家（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关税同盟条约也许未能被接受。但是三个国

家在经济上融合为一个区域的进展非常之快，因此审视这种结合是否合法将不起什么作用。

东亚也将日趋如此。唯一的问题在于会产生一个或是几个这样的经济区域。可能有这样一个区域，中国沿海地区和东南亚国家围绕日本联合起来。也有可能中国迅速发展的沿海地区（从北方的天津到南方的广州）自成一个区域，它拥有中国人口的约五分之二，国民生产总值的约三分之二。而以日本主导的东南亚则是另一个区域。

亚洲走什么道路，将是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的关键问题之一。

近来还出现了日益发展的"小地区"趋势。苏联帝国解体后不久，中亚地区的"突厥人"后继国建议，建立以西化程度最高、最发达的突厥人国家（即土耳其）为中心的"突厥人地区"。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刚从苏联帝国中分离出来，就开始谈论"波罗的海地区"，其中它们将与斯堪的纳维亚邻国（首先是芬兰和瑞典）联合。包括东南亚人民和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在内的一个类似的小地区，已由马来西亚总理提出。此外，取代原苏联的一个经济区正是俄罗斯总理所努力争取和希望的。

但是，与不可逆转的地区主义趋势相比起来，有三个、四个还是更多这样的地区这一点并不很重要。这种趋势也是不可避免的。它是对经济新现实作出的反应。在知识经济中，传统的保护主义和传统的自由贸易都不能自己起作用。需要有一个经济单位，其规模足以在其中建立有意义的自由贸易和激烈竞争。这个单位的规模必须足以允许新的"高技术"产业发展并受到高度保护。其原因在于高技术即知识产业的性质。

高技术产业不遵循古典、新古典和凯恩斯经济学的供求关系平衡原则。在上述这些经济学中，生产成本与产量成比例地上升。在高技术产业中，随着产量上升，生产成本下降，而且下降得非常快——现在所说的“学习曲线”。（进一步论述，参见第十章。）

这一点的意义在于，高技术产业可以摧毁任何竞争者的方式建立起来（我曾说过的“敌对贸易”）。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被击败的产业几乎没有机会卷土重来。它已不复存在。然而，同时，新的高技术产业必须有足够的竞争和挑战，否则简直无法发展。它将变成垄断的、懒散的，且很快就会过时。因此，知识经济需要甚至比相当大的民族国家大得多的经济单位。否则就不会有竞争。但是，它还需要保护产业的能力和与其他贸易集团在互惠而不是保护或自由贸易基础上进行贸易的能力。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势。它使地区主义变得不可避免和不可逆转。

但是，正如欧洲共同体的例子所表明的，地区主义完全不是“国际的”。它必须建立跨国的、实际上是超国家的机构。

正在兴起的各个地区完全不一样。欧洲共同体是围绕少数国家建立的，它们是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些国家在面积和人口上大致差不多，而且尽管富裕程度的差异不小，但组成一个经济发展连续体。例如，西班牙最先进的公司实际上比德国一般公司更先进。

北美经济共同体会有很大区别。在人口方面，三个合作伙伴从美国2.5亿人到加拿大只有这个数的十分之一。在经济发展方面，三国相差甚远。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地区。墨西哥，尤其是其南部，属于世界上最贫穷、最不发达地区。

亚洲的各个经济区域差别就更大了。它们甚至并不享有共

同的文化遗产(印度尼西亚或马来西亚从来就不是儒家文化的一部分)。

但是,它们全都将创造大的自由贸易区,比以往的自由贸易区大得多。不过,它们将创造的是对外部世界作出统一反应的大区域,是能够做到"相互补偿的",即既对外开放的、同时又实行保护主义的大区域。

这些区域并不取代民族国家,但使民族国家为之降格。

部落主义的再现

国际主义和地区主义从外部向主权民族国家发起挑战。部落主义则从内部破坏其基础。它削减民族国家的整合力。事实上,它威胁要用部落取代国家。

在美国,部落主义表现为日益强调多样性而不统一。美国一直是个移民国家。每个移民群体一开始被认为是"外来的"并受到歧视,一直要到两代人之后才成为"主流"(从 19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爱尔兰人开始)。美国是个大"熔炉"。过去 30 年里,这一点已非常不合潮流。现在宣传和实行的是多样化。任何使新来的群体成为"美国人"的尝试都被认为是"歧视"。仅仅 60 年前,阻止这些群体成为"美国人"的尝试则被认为是歧视。不管新来的群体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不管他们是黑人、棕种人还是白人,不管他们是天主教徒还是佛教徒,现在强调的是保持他们的个性,防止鼓励他们(更不用说强迫他们)成为"美国人"。

这决不是一种美国现象,甚至不能完全按美国的思想方法

来解释(虽然像在美国社会的所有事情中一样,美国的基本问题,即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种族关系,显然是这种现象的关键)。部落主义在欧洲更是盛行。它在血腥内战中将南斯拉夫撕成几块。它预示在整个前俄罗斯帝国将出现内战。苏格兰人想退出联合王国。斯洛伐克人要求自治,与捷克人分离。比利时被佛兰芒人和讲法语的瓦龙人之间的争斗弄得四分五裂。极小的地方群体,虽然从未遭受歧视,但也要求"文化自治",诸如,生活在柏林南面森林里的15万索布人,他们是1000多年前居住在德国北部的斯拉夫部落的最后幸存者。

部落主义的影响已遍及全世界。加拿大是否将进入下一世纪?它是否会分裂成两部分,讲英语和讲法语的两部分?甚至分裂成四部分:讲法语的魁北克;讲英语的安大略省和马尼托巴省;大草原诸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届时滨海诸省向何处去?纽芬兰省向何处去?)印度在政治上仍然是统一的?科西嘉和布列塔尼仍留在法国?芬兰北部和瑞典北部的拉普人是否将获得自治?墨西哥是否仍是统一的(或者印第安文化的南部与西班牙文化的北部分离)?这份单子是尽可开列下去的。

出现部落主义趋势的一个原因是,面积大不再赋予很多优势。在核战争时代,甚至最大的国家也不能保护其公民。而最小的国家(以色列就是一个适例)也能制造恐怖武器。

由于货币和信息都已跨越国界,即使非常小的单位也在经济上独立发展。国家不分大小,都能平等地获得货币和信息,而且条件相同。实际上,过去30年里,真正"成功的"都是些非常小的国家。

20年代,奥地利共和国,奥匈帝国的残剩部分,只有不到600万居民,被普遍认为面积太小,无法在经济上独立发展。事

实上，这正是奥地利国内有人支持希特勒并吞该国家的主要论据。20年代和30年代的奥地利实际上处于令人可怜的经济状况，长期失业率高达2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奥地利国土面积几乎没有增大。此外，它又丧失了20年代还存在的贸易区域，前奥匈帝国的一些继承国。这些国家战后都成了共产党国家。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奥地利仍发展为欧洲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芬兰(同样很小)、瑞典或瑞士也是如此。香港和新加坡做得更好。20年前，在1940年时斯大林并吞的波罗的海三国中，最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并不相信，他们的国家能靠自己的力量在经济上生存下去；现在则没有什么人再怀疑这一点。加拿大的魁北克的情况也是如此。

现在，小国毕竟能加入经济区域，并两头受益：文化及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一体化。小小卢森堡是他们中最热诚的“欧洲人”，这绝不是巧合。

需要根基

部落主义的主要原因既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而是基于存在。人们在跨国的世界中需要根基；他们需要社区。

西班牙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卡斯蒂利亚语(外部世界的人称之为西班牙语)。但是许多西班牙居民在学校、在家里，甚至在办公室里，讲得越来越多的是加泰罗尼亚语、巴斯克语、加利西亚语或安达卢西亚语。这种变化可能反映人们的强调点发生了转移，但它确实表示了在同一性方面的一种根本变化。

加泰罗尼亚人、巴斯克人、加利西亚人和安达卢西亚人在电视上看同样的肥皂剧。而他们买的产品有可能在西班牙生产，也有可能在日本或美国生产。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为总部设在东京、汉城、纽约或杜塞尔多夫的雇主工作。他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变得没有国家的并日益成为跨国的世界之中。但是他们需要地方上的根基，需要属于地方上的社区。

部落主义不是跨国主义的对立物；它是后者的一个极端。越来越多美国犹太人的婚姻不再恪守他们的信条；但这正是他们强调犹太根基和犹太教文化的原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年里，越来越多的塞尔维亚人娶克罗地亚的女子为妻，反过来越来越多的塞尔维亚妇女嫁给了波黑穆斯林或克罗地亚人。但这仅仅使其他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或波黑人更加意识到部落同一性。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越来越多地与英格兰人结婚，只是使他们更加意识到自己是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部落主义得以发展，就因为人们日益认识到，在大阪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到在斯洛文尼亚的人，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大阪在哪里，也难以在地图上找到它。正是因为世界已经以如此众多方式成为跨国的（并且必定会更多地跨越国界），人们需要按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界定自己。他们需要一个地理上的、语言上的、宗教上的、文化上的社区，既能看得见，又能，用老套话来说，“拥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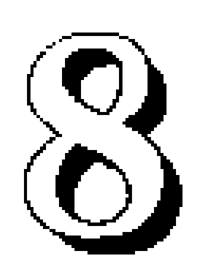
柏林城外森林里的索布人仍是德国和德国文化的一部分。但他们也把自己视作（并要求被视作）独立的。进入洛杉矶的拉美移民（无论是来自墨西哥还是中美洲）都想尽快成为美国公民。他们期望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有同样的机遇。他们期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同样的教育、职业和工作。但是他们也希望能保持西班牙裔的个性、文化和社区。世界越是跨国的，也就越是

部落的。

这种趋势日益破坏了民族国家的基础。实际上，不再有“民族国家”，而是成了名副其实的“国家”，即行政单位而不是政治单位。

国际主义、地区主义和部落主义正在迅速地创造一个新政体，一个新的、复杂的政治结构，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治结构。打个数学比方，后资本主义政体有三个矢量，每个矢量的方向都不一样。

同时，正如英国一句老话所说，“政府工作必须继续进行”。至今做这工作的唯一机构就是民族国家及其政府的机构。后资本主义政体的第一项政治任务就是恢复政府的工作能力，而此工作能力因为特大国家而大为削弱了。



政府需要转向

今后几十年将对政治勇气、政治想象力、政治创新和政治领导提出前所未有的要求。将要求有高水平的治理能力。这种要求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

从外部来说，在若干领域里，需要有新思维和彻底的创新：国家政府和跨国任务之间的关系、国家政府和地区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新形成的而且差别很大的地区之间的关系。今后几十年应该（而且第一次）看到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机构以及超国家的、实际上是跨国的法律出现。这些新机构的设计者和建设者以及跨国法律的起草者必须是国家政府和政治家。

从内部来说，同样要求、同样急需使政府重新起作用（尽管社会已转变为多元化的组织，政府的决策能力已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和“极少数人的专制下”几近丧失）。

18 世纪政治思想家（如美国宪法制定者）非常担心的是“派别”，即特殊利益集团，它们倾向于使自己的利益或问题成为“符合道德准则的需要”，而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对这种担心的最好回答是政党。从 1815 年至 1835 年的 20 年里，英国、美国和法国不约而同发明了政党，因为当时已基本形成了现代世界。政党超越了派别。在欧洲，政党是以一种含糊思想、一个“纲领”

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在美国,它是以同样广泛的、模糊的"利益"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但是,不管它所声称的理由是什么,政党都是为一个共同目标组织起来的:那就是获得和掌握政权。它组织起来是为了统治。因此,它必须吸引"处于摇摆之中"的选民。它必须避免走极端,必须愿意作出妥协。在掌权时,它必须将其行动局限于能获得拥护者以外的人支持的措施之内,即将其行动限于能够为尚未投它票的"中间派"所接受的范围之内。对这项原则作出最明确表述的是,美国宪法中关于总统否决权的条款;它只能被国会两院以三分之二的票数推翻。这意味着,除非两党中有相当数量的议员一致同意某项议案,否则就难以推翻总统的否决。这就迫使国会和总统都采取中间派立场。

但是现在,各地的政党都已陷入瘫痪状态。使欧洲政党能将信仰各异的派别形成一个组织以获得和掌握权力的思想,已失去其大部分整合力。政党及其口号对选民,尤其是年轻选民,已没有任何意义。美国传统的利益集团大多已消失;1896 年马克·汉纳视作为共和党基础的、1932 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承接下来并以此缔造新的民主党的农民、工人和小商人现在在哪里?

政府因此而无力对付特殊利益集团的攻击,实际上是无力统治,即作出决定并予以实施。

过去这些年,"反政府"已变得时髦起来。但是今后这行不通了。我们需要强有力的政府。事实上,我们可以期望在今后几十年里有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行政管理权力。新的任务(保护环境;消灭私人军队和国际恐怖主义;实现有效的军备控制)都需要有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行政管理权力。但它们需要一个不同以往的政府。

在过去 15 至 20 年里,一个又一个政治领导人上台掌权,

"缩减政府规模"或"与政府内部的人作斗争"。以这样的政纲当选的第一个人是美国的吉米·卡特——随后是罗纳德·里根，再后面是另一个"反政府"候选人乔治·布什。在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以"反政府"政纲当选，且以此统治了10年。结果是令人可怜的。在这些反政府领导人的领导下，政府开支和规章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在他们领导下，开支完全失控。而且，这些政府花销越多，就越不称职、越没有权势。政府没有"长大"。它因超重而变得肥胖和瘫痪。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一届政府有布什总统当政时那么大的赤字。按照常识，这不会引起衰退。但是在布什政府头3年任期内，政府开支和赤字的大幅度增加造成了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延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衰退。撒切尔首相(可以认为是自戴高乐将军以来自由世界最能干、亦无疑是最坚定的政治领导人)同样在缩减政府规模，使之更有能力、更有成效，以及使英国经济好转方面，除了增加赤字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成绩可言。

对法国来说也是如此。密特朗总统大幅度增加了法国政府的支出，但没有取得任何成绩。在他任总统期间，法国逐步失去了作为经济和工业强国的地位。在日本，统治能力正在为作为政治拨款国直接后果的连续不断的丑闻所削弱。

可是，只有国家政府，只有它们的政治领导人，才能做那些必须做的工作。只有他们才具有合法性。

因此，政府必须重新获得一点工作能力。它必须转向。"转向"这个词本身是个商业术语。但要使任何机构转向，不管是企业、工会、大学、医院还是政府，都需要采取以下三个步骤：

1. 放弃那些不起作用的事情、从未起作用的事情；已失去效用以及已无法起作用的事情。

2. 集中精力于那些起作用的事情、确实产生效果的事情以及改进组织工作能力的事情。要做更多的已证明成功的事情。

3. 分析成功和失败两者各半的事情。要"转向"就需要放弃该领域中不起作用的事情，多做起作用的事情。

军事援助的无益

如果将特大国家的政策按无益的事来排位，军事援助肯定排在从未起作用的事情的首位，因而也是在要放弃的事情的首位。军事援助可以追溯到古代。罗马历史学家就已指出，波斯国王在斯巴达与雅典的战争中给予前者的军事援助，仅仅使几十年后马其顿人统治希腊和给予亚历山大大帝推翻波斯帝国的军队和武器成为可能。

但是，军事援助肯定从未(比特大国家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期)用得更广泛、更失败的了。它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几乎没有例外。诸如美国给予巴列维国王统治下的伊朗的军事援助；苏联给予阿富汗的军事援助；美国给予伊拉克的军事援助。给拉美许多将军的军事援助也不是富有成效的。其结果仅仅使将军们富了，他们的国家穷了。

支持受到强大敌人攻击的国家，是一回事。给予"友好"政权军事援助，又是一回事。它是被强求的钱，它只会增加强求者的胃口。对于这样的威胁：如果你不给我们这些飞机、坦克和导弹，我们将从其他地方获得，最好的回答是："去吧。"而且，常常被称之为保持地区"军事均势"的需要，这纯粹是骗人的。在过去 40 年里，从未有过军事援助对地区稳定起作用的实例。它只

是加剧了军备竞赛。

这些年来,对经济援助有过激烈争论。它真的帮助了受援国还是削弱了它们?美国大量提供的粮食援助使得(特别是非洲)政府忽视了本国的农业,且使本国农民一贫如洗,这种指责是有根据的。总之,50年代发明的政府间援助至多产生边际效益。对于经由世界银行等准政府机构提供的拨款或贷款,没有值得多提的;其中极少有实质性发展。经济援助可能仍然是个好想法(尽管我们显然不知道如何去做)。

但是军事援助的想法本身就很糟糕。军事援助不会产生可靠的盟友。受援国十有八九会转而反对援助国,如伊朗和伊拉克转而反对美国,阿富汗转而反对苏联。一个原因是受援国得到的援助越多,就越因依赖援助而愤愤然。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援助国支持接受援助的政府。即使援助不是用于使政府继续掌权,援助国仍日益被看作是在位者的支持者,如希腊的上校或伊朗的巴列维国王。当在位者即使是用和平手段被免职,后继政府几乎是被迫转而反对与其前任合作的强国,即援助国。

军事援助对援助国和受援助国都造成损害。它迫使受援国将其目光、资源和精力错误地投向军事目的,从而忽视其他各方面。它一次又一次造就军事独裁者。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国际恐怖主义者,他们利用获得的军事援助,将其国家转变为恐吓国际社会的陆基海盗船。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就是这样做的。

要放弃哪些经济政策?

如果我们学到一点东西的话,那就是政府无法掌管经济"气

候”。政府无法有效地防止或克服短期的经济波动，如经济衰退。

1929年前（如上所述），没有人期望政府能掌管经济气候，自那时起，每个国家的每届政府都许诺能医治经济衰退。但是这纯粹是江湖骗术。至今没有一届政府能履行诺言。政治领导人必须学会说，“就像医生对通常的感冒的治疗往往不知道如何是好一样，无人知道如何控制短期的经济。我们最好还是别碰它。”

然而，对此的推断结果是，政府需要重新取得避免发生大萧条的能力。政府通过支出增加消费的办法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不管在哪里作尝试，公众总是把增加的购买力贮藏起来而不是用掉它。美国最近一次的尝试发生在吉米·卡特的总统任期内。自富兰克林·罗斯福首次尝试通过政府创造购买力的办法消除大萧条以来，在早期每一次这样的尝试中，都发生这种情况。唯一的结果是1936/1937年严重经济崩溃。制止萧条（即长期结构变化）的唯一有效办法是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而且在长期迅速发展期之后，基础设施（公路、桥梁、港口、公共建筑、公有地）总是急需修理。然而，政府要能为这种投资提供资金，需要它们在经济繁荣时期（以及衰退时期）实现平衡预算。必要时，它们要有筹资能力，特别是通过借贷筹资。换句话说，政府必须重新学会将赤字作为最后一招的武器。在和平时期，赤字即使要利用，也只能用于资助经济创造财富能力的长期改善。

总之，在经济领域，我们需要放弃特大国家（特别是在讲英语的世界）以此为依据的财政国家理论。现在需要的是从社会税收政策回到经济税收政策上来。当然，考虑到公平和正义，税收需要降低。当然，税收还有活动余地，即处罚甚至严厉处罚社

会不良行为，不管它是雇用童工，还是过去20或25年里成为美国商业规范的明显过分的经理高薪制。但是这些已是众矢之的。税收政策的核心在于实行一项社会的中立政策。

在政治上，这行得通吗？回答是“行得通”——只是不容易。

放弃任何事情常常要遭到激烈抵抗。任何组织中的人，包括官员和政治家，常常与已废弃的东西、逐步废弃的东西、应起作用但没有起作用的事情以及曾产生过效益但现在不再如此的事情联系在一起。他们大多与我在以前一本书[①]里所说的“对管理自我投资”联系在一起。但是，它也经常在雇用人最多的领域和企业里发生。因为每个组织往往将最能干的人用于解决“问题”而不是创造效果，特别是处于困境中的组织会这样做。

因此，放弃任何事情都是很困难的(但仅仅是很短的时间)。在放弃这些努力后6个月，每个人都纳闷：“为什么花费我们这么长时间？”

财政国家能有效地重新分配收入并因此通过税收和补贴改造社会的想法已被确证为不能成立。最不平等的国家是那些竭尽全力重新分配收入的国家：苏联、美国和英国。它们所做到的，赋予我们政治拨款国家的，无疑是国家正遭受的最危险的变性疾病。至今为止，没有人知道我们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对国家的合法掠夺。它可能需要符合宪法的创新——也许是独立于立法机构和行政部门之外的一个新的公共机构，它审计支出建议，并决定这笔或那笔提议的支出是否真的符合公共利益和维护公共利益的政策。(这种审计在公共领域与第三章里为公司管理建议的“商业审计”相类似。)这个想法即使不说是不切实际的，

① 《为效益而管理》(伦敦：海涅曼出版社，1964年)。

至少也是幼稚的。可以预期立法机构会反对任何控制自己的尝试。实际上,(在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和德国)会有许多立法者欢迎外界对他们的无纪律行为进行检查。没有特殊利益集团的惩罚,他们无法自己检查(或认为自己无法这样做)。但是,他们也知道,政治拨款过程,除了摧毁他们的自尊,还在破坏他们的地位和给选民的印象。在今后几年里,所有国家用于政府开支的钱日趋稀少。这可能会使对政治拨款开支的控制日益具有吸引力。对这一点急需加以控制,没有人再会表示怀疑。

在转向战略中,放弃是第一位的。在完成这件事之前,其他任何事都做不成。所有资源仍然都分配给"问题"。就放弃什么展开的激烈而又情绪激动的争论吸引了每个人。有的人认为应"再试一次"。有的人(徒劳地)寻求"妥协"。有的江湖医生允诺能截除一条生坏疽的腿而又不给人带来痛苦,等等。在放弃得到解决之前,什么工作也干不成。

精力集中于何处

死人在埋葬后才可能再生。首先要问一下:哪些事是做得成功的?我们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成效?我们应把精力集中于何处?

过去40年,日本和德国的经济业绩给了我们同样的经验。这些国家把重点放在经济"氛围"上,而不放在经济"气候"上。它们的经济政策目的不是使病人感到好一些,而是使病人恢复并保持健康。目的是创造一种经济环境,经济能在其中增长,获得对传染、受伤和疾病的抵抗力,获得适应能力和迅速变化能

力，保持竞争力。

然而，两国在试图"控制气候"时，几乎是立刻失去了发展势头。1989年，德国政府转而实行大规模赤字开支以增加消费（目的为了收买刚刚统一的东德人选票）时，经济开始缓慢起动。80年代中期美元贬值后，日本人试图通过增加国内消费支出抵消短期出口收缩，几乎随即触发了股票市场和不动产价格的投机性暴涨，一发不可收拾。结果产生了"泡沫经济"。泡沫经济最终于1991年和1992年"破灭"。

创造适宜的氛围与保持低税收不是一回事。供应经济学家的低税收本身保证经济健康发展的论点并没有得到证实。他们的高税收必定意味着经济停滞的论点已被确证为不能成立。日本一直实行非常高的所得税率。前面所述的纳税负担比税率更重要。财政政策的真正目的必须是，鼓励对知识、人力资源、生产性设施、商业和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这是过去半个世纪日本、德国和"亚洲四虎"（韩国、香港、新加坡和台湾）取得"经济成功"的秘诀。由于它们坚持以创造经济氛围为重点的政策，而基本忽视经济气候，因此都取得了成功。

超越保姆国家

转向战略的最后一个步骤是，检查部分取得成功和部分没有成功的政策和活动。人们试图确定哪些政策和活动是不成功的，以便能中止它们。第一个问题是，应该放弃什么？但人们又要问：哪些在起作用？以及我们应更多地做些什么？

就冷战国家，特大国家的一种表现形式而言，这个问题已经

论述过了。军备控制(部分地)起作用;冷战国家不起作用。现在需要的是跨国军备控制。对于"相互确保摧毁"的军备控制,已经被证明在经济上是不能忍受的,甚至对最富的国家也是如此,而且在阻止恐怖主义武器及其扩散方面无能为力。

还有第二个领域,即社会领域,其中效果有好有坏。保姆国家本身效果很少。那很少的效果是政府作为社会领域实干者取得的。但是,在自治社区组织开展民间行动的地方,我们取得很大效果。后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政体需要一个新的社会部门(既满足社会需要,又恢复富有意义的公民身份和社区)。

然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新颖的)课题,值得专门写一章。



凭借社会部门取得公民身份

社会需要将在两个领域得以发展。它们将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慈善事业的领域里发展：帮助穷人、残疾人、无依无靠的人和受害者。它们还将在旨在改变社区和改变人的服务方面发展(也许发展得更快)。

在过渡时期，处于困境的人总会增加。现在全球有数量极大的难民，他们是战争、社会动乱、种族、民族、政治和宗教迫害、政府无能和残忍的受害者。甚至在最安定、最稳定的社会中，也会有因向知识工作转变而落伍的人。劳动力结构和对技能与知识的需求发生彻底变化，社会及其人口要花一代或两代人的时间才能赶上。在服务工作者的生产力提高到足以向他们提供"中产阶级"生活水平之前，还得花相当多时间(从历史经验来看，须花大半代人的时间)。

在第二个社会服务领域，需要将有同样的发展(也许发展得更快)。在这个领域，服务不是做善事，而是试图改变社区和改变人。在早期，这种服务几乎无人知晓(而慈善事业却伴随我们一千年)。它们在过去几百年里迅速发展，尤其在美国。但这些

服务在今后几十年里将更加需要。一个理由是，在所有发达国家里，老人数量迅速增加，他们中大多数人孤单一人生活，而且想一个人单独过。另一个理由是，保健和医疗日趋高级，要求有保健研究、保健教育以及越来越多的医疗和医院设施。现在日益需要成人继续教育。现在有因单亲家庭不断增加而产生的需要。社区服务部门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经济中真正的“增长部门”之一（而我们能够期待，对慈善事业需要将最终重新消退）。

通过保姆国家满足这些需要的尝试大多失败了（或至少让政府经营管理这些服务的尝试失败了）。因此，从保姆国家的经验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政府在社会领域中不再是实干者和管理者，而仅是政策制定者。这意味着，在社会领域，像在经济领域一样，需要“承包”、“外购”和“分类定价”。如同我们通过订立合同把支持性工作、办事员工作、维修工作包出去以调整工商企业，政府也需通过订立合同把社会部门工作包出去以进行改组。

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提高服务工作和服务工作者生产力的需要。政府是服务工作者最大的雇主；可是政府中的服务工作者生产力最低。只要他们是政府雇员，生产力就上不去。政府机构必定是“行政机构”。它必定（实际上应该）使生产力服从于规章制度。它必定沉浸于“繁文缛节”之中。它必定把重点放在固有的文书工作上，而不放在效果上。否则它很快就会变成一伙窃贼。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政府雇员主要从事提供服务、经营服务、在社会部门干事等工作。把事情包出去对改组社会部门同样是必要的。

过去40年里，美国试图通过政府行动解决社会问题的计划，没有一项产生重大效果。但独立的非赢利机构却有令人难忘的效果。

市中心(如纽约、底特律、芝加哥)的公立学校一直在以惊人速度走下坡路。教会学校(特别是天主教教区学校)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在同样的社区,学生来自同样的破裂家庭和属于同样的种族和民族集团。在与酗酒和滥用毒品作斗争上,唯一取得成功(而且是重大成功)的是嗜酒者互诫协会、救世军或撒马利亚慈善咨询中心这样的独立组织。在使“福利母亲”(单身母亲,常常是黑人或拉美人)摆脱福利、重新走上工作岗位、重新建立稳定的家庭生活上,唯一取得成功的是如密歇根州罗亚尔欧克的贾德森中心等自治的、非赢利组织(关于这一点,参见我1990年的《管理非赢利组织》一书)。人们在主要保健领域如预防和治疗心脏病和精神病领域上的改善工作基本上是由独立的、非赢利组织做的。例如,美国心脏学会或美国精神健康学会发起和资助必要的研究,率先对医学界和公众进行预防和治疗教育。

因此,促进社会部门的自治社区组织发展,是使政府转向并使之重新发挥作用的重要一步。

自治社区组织作出的最大贡献是,作为富有意义的公民身份的新中心。特大国家几乎毁了公民身份。为了恢复它,后资本主义政体,除了两个公认的部门,即工商业的“私营部门”和政府的“公营部门”,还需要“第三部门”。它需要自治的社会部门。

爱国主义还不够

爱国主义就是自愿为国捐躯。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者预言,工人阶级将不再是爱国主义者。他们的忠诚是对其阶级而

不是对其国家。结果表明这个预言是错误的。人们(特别是工人阶级)仍然愿意为国捐躯,甚至在最不得人心的战争中也是如此。

"爱国主义还不够",英国护士伊迪丝·卡维尔(1865—1915年),在被押赴刑场时这样说,伊·卡维尔因将逃跑的英国战俘隐藏在她在比利时经营的医院而遭德国人的迫害。必须还要有公民身份。公民应具有的品行就是自愿为国奉献,自愿为国而生。恢复公民身份是后资本主义政体的最主要需要。

爱国主义,即乐意为国捐躯,是普遍存在的。但公民身份显然是西方的发明。全盛时期的雅典和罗马实际上就是这样。而且西方传统的最出色政治声明是关于公民身份的(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通过雅典领导人伯里克利之口发表的令人振奋的讲话)。

公民身份随古罗马的崩溃而消失。中世纪时,没有公民。封建主有家臣,城邦有市民,教会有教友,但都没有公民。1867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也没有公民。大名,即领主,有家臣,市中心有行会,宗教教派有崇拜者。但就是没有公民。

民族国家重新确立了公民身份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国家。公民身份在权利和义务方面的含义,自那时起一直是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主要课题。

作为一个法律术语,公民身份是一个表示识别的词,而不是表示行动的词。作为一个政治术语,公民身份意味着积极承诺,意味着责任。公民身份意味着一个人在社区、社会和国家中有某种影响。

在特大国家,政治上公民身份不再起作用。即使国家很小,有关政府事务仍高不可及,作为个人无法产生影响。个人可以

投票(我们从过去几十年的惨痛经验中认识到,正确的投票有多重要)。个人可以纳税(而且我们从过去几十年的惨痛经验中认识到,这是一种富有意义的义务)。但是个人无法承担责任,无法采取行动以产生影响。然而,没有公民身份,政体是空的。民族主义可能会出现。没有公民身份,爱国主义有可能退化为沙文主义。没有公民身份,不可能有负责任的承诺,这种承诺不仅创造了公民,并且归根结底把人民团结起来;也就不可能有一个人在实现其影响后而获得的满足感和自豪感。没有公民身份,政治单位,不管叫国家还是帝国,只可能是个"强国"。此时权力成了唯一使它团结的力量。但是,为了能在一个迅猛变化的危险世界中行动,后资本主义政体必须重新确立公民身份。

对社区的需要

同样,需要恢复社区。传统的社区不再有很大的整合力。知识赋予个人的流动性造成传统的社区无法存在下去。我们现在认识到,促成传统的社区团结一致的不是基于其成员的共同点,而更多地倒是基于(不说是凝聚力或害怕)某种需要。

最近谈论家庭解体的很多。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误解。必须承认,美国(乃至整个发达世界)有相当数量的婚姻以离婚告终。但是婚姻持续时间并不比100年或150年前短。婚姻持续时间可能更长。100年或150年前,是死亡而不是离婚使婚姻破裂。

传统家庭是一种需要。一般来说,在19世纪小说中就有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破裂家庭"。但是他们必须待在一起,不管

相互间的仇恨、厌恶和害怕程度有多强烈。“家庭是他们必须带你去的地方”，这是19世纪的一句老话。本世纪以前的家庭提供几乎所有能提供的社会服务。家庭不提供的，其他任何人也提供不了。依附家庭是一种需要。被家庭拒绝接受是灾难。近在20年代，美国戏剧和电影中一个常见的人物是，将带着私生子回家的女儿撵出去的残忍父亲。而她只有两种选择：自杀或沦为妓女。

实际上，现在对大多数人来说，家庭更加重要了。但是，家庭变得更加重要，是作为一种自愿的结合，作为爱慕、忠诚和互尊的结合，而不是作为需要的结合。今天的年轻人，一旦因长大而丢弃青春期的反叛心理，就会比我这一代人更需要亲近父母和兄弟姐妹。

尽管如此，家庭不再是社区。但人们确实需要社区。他们需要它，尤其是在无计划扩展的大城市以及在我们中越来越多的人生活的郊区。人们再也不能（像以前在农村中那样）依靠同利益、同兴趣、同职业、以及同样无知和共同生活在相同环境里的邻居。即使家庭紧密联结，人们再也不能依靠家庭。地区和职业之间的流动意味着，人们不再固守在他们出生、其父母生活、其兄弟姐妹及堂（表）兄弟姐妹生活的地方、阶级和文化氛围中。后资本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社区（特别是知识工作者所需要的社区）必须基于承诺和同情之上，而不是强加的邻近和孤独。

正在消失的工厂社区

40年前，我想这种社区将在工作场所出现。在我1942年

的《产业工人的未来》、1949年的《新社会》(两本书即将由事务出版社再版)和1954年的《管理的实践》中,我谈到过工厂社区称之为赋予个人地位和作用、自治责任的地方。

这正是日本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实现的事情。但是,如上所述,即使在日本,工厂社区也不会在今后很长时间里发挥作用,至少对知识工作者来说是如此。日本工厂社区不怎么基于归属之上,更多地倒是基于害怕之上,这一点越来越明显了。日本实行年功序列制的大公司里的工人,在30岁后失业,实际上就不能再被雇佣了。但这种状况正在迅速消失,因为日本正在从严重缺少工作岗位(近在1960年的标准)向严重缺少可利用劳动力转变。

工厂社区在西方从未扎根。我仍然坚持认为,雇员必须有最大限度的责任和自制(这个想法是我倡导工厂社区的基础)。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必须成为以责任为基础的组织。

但是个人,尤其是知识工作者,需要富有意义的社会生活,个人关系,需要在工作之余,在组织之外,实际上在自己专业知识领域之外作出贡献。

作为公民的志愿者

这种需要得以满足的唯一领域就是社会部门。在那里,个人可以作出贡献。他们可以负责任。他们可以产生影响。他们可以是"志愿者"。这种情况已经在美国发生。

在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志愿者传统已为福利国家所压倒。例如,在日本,庙宇和神道教神社,在地方志愿者的积极参

与下，曾是活跃的社区服务中心。1867年明治维新将宗教变成一种政府功能，从而变得“西方化”，而志愿者和庙宇社区服务都很快就消失了。在英国，整个19世纪，慈善事业是一种社区活动，被视作富人的责任。1890年后，由于人们日益相信政府是社会主人，上述情况大多消失了。1878年在伦敦成立的救世军是维多利亚时代欣欣向荣的社区服务文化的少数幸存者之一。而在法国，自拿破仑以来，不是政府组织和控制的社区行动都受到怀疑，事实上几乎被认为是起破坏作用的。

美国宗教教派的多样性、对州、县和市地方自治的极大重视以及孤独的边疆居民点的社区传统，放慢了美国社会活动政治化和集权化的速度。结果，这个国家现在有差不多100万个非赢利组织活跃在社会部门。它们代表着十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其中四分之一靠公众捐款筹集，另外四分之一是政府作为特定工作支付的(如执行保健偿还计划)，其余是交纳的服务费(如私立大学学生付的学费或现在在美国每个博物馆能找到的“艺术商店”赚的钱)。

非赢利组织已成为美国最大的雇主。美国总共9000万成人中，每两人有一人每周作为“义务工作人员”，即志愿者，为非赢利组织工作至少三小时，这些组织是教会和医院、保健机构、红十字会、童子军和女童子军等社区服务组织、救世军和嗜酒者互诚协会等康复服务组织、受虐妻子临时收容所以及市中心贫民区黑人孩子辅导场所。到2000年或2010年，这种“义务工作人员”的人数将会增加到1.2亿，他们的平均工作时间将达到每周五小时。

这些志愿者不再是“帮助者”。他们已成为“伙伴”。美国越来越多的非赢利组织有拿工资的专职主管人员。但管理队伍中

的其他人越来越多地是志愿人员。他们日益承担起管理职责。最大的变化发生在美国天主教会。在一个大教区，女平信徒实际上作为"堂区管理人"掌管所有堂区。牧师望弥撒，施与圣餐。其他所有事情，包括堂区的所有社会和社区工作，由堂区管理人领导的"义务工作人员"去做。

美国志愿参与者队伍的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不是需求的增加，而是志愿者对社区、承诺和贡献的探求。新志愿者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不是退休人员。他们是从事特定专业的双职工家庭中的丈夫和妻子，是年龄为三四十岁、受过良好教育、生活富裕、工作繁忙的人。他们热爱自己的工作。但他们感到有必要，用人们常听到的一句话来说，在"我们产生影响"的地方做点事，不管这意味着在地方教堂办读经班，教黑人孩子乘法表，还是拜访长期住院后回家的老人并帮助他们进行康复训练。

美国非赢利组织为志愿者做的事可能要比它们为服务对象做的事更重要。

女童子军是美国少数兼收黑人和白人的组织之一。在其队伍里，女孩子，不分肤色或民族(白人、黑人、拉美人、亚洲人)，一起工作，一起做游戏。但是女童子军70年代开始的取消种族隔离运动的最大贡献是，它使很多母亲(黑人、亚洲人、拉美人)作为取消种族隔离的社区工作的志愿者充实到领导岗位上去。

同样，"乡村"教堂最大的吸引力是，它们为志愿者提供能产生预期结果的社区活动。这些教堂的迅速发展可能是本世纪最后十年美国最重要的社会现象。它们几乎全部由志愿人员充当工作人员。其中一个数一数二的教堂有13000名教徒，但只有包括本堂牧师在内的150个拿工资的工作人员。可是它从事的社区工作要比传统的教堂多。每个加入教区的人要求在参加过

几次礼拜后,开始为一项教堂活动工作(在教堂内或在外面的社区内)。几个月后,他或她将被要求掌管这项活动。期望每个人都成为"领导人"。

社会部门中的公民身份,凭借社会部分而取得,它不是医治后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政体各种弊病的灵丹妙药。但它可能是解决这些弊病的先决条件。它恢复了作为公民身份标志的公民责任和作为社区标志的公民自豪感。

在社区和社区组织(以及,总的来说包括公民身份)都遭受彻底损害和事实上几乎全部摧毁的地方,即在前共产党国家,是最需要恢复公民身份的。这些国家的政府不仅名声扫地,它们还变得十分无能。(在捷克斯洛伐克、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波兰和乌克兰)共产党的后继政府要十分胜任地完成只有政府才能完成的任务,还得花费时日:管理货币和税收,掌管军队和法庭,发展外交关系。同时,只有自治的地方非赢利组织(即以志愿者为基础、发挥人们精神活力的社会部门组织)才能提供社会所需的社会服务和政体所需的领导才能开发。

不同社会和国家肯定会以完全不同方式组建其社会部门。例如,教会在西欧不可能起到如其在仍以基督教为主的美国所起的那种关键作用。在日本,雇员社团的成员资格可能仍是社区的最关键的要点和社区成员资格的象征,这对普通工人来说尤其如此。但是,每个发达国家都需要一个自治的社区组织的社会部门。需要这个部门提供必要的社区服务。首先需要这个部门提供社区的联结和恢复有效的公民身份。以历史观点看来,社区是天命。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和政体中,社区必须成为承担的义务。

• 第三部分

知　　识

10

知识：它的经济学；它的生产力

乍看上去，经济似乎不受向以知识作为基本资源的方向转变的影响。它似乎是“资本主义的”，而不是“后资本主义的”。但表象是靠不住的。

当然，经济将仍然是市场经济，而且是全世界范围的市场经济。它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市场经济延伸得更远，在一战前没有“计划”经济，也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对作为经济活动组织者市场的批评可以一直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大多数的指责都有根有据。[1]但正如卡尔·马克思这样一个反资本主义者在100多年前所指出的那样，市场尽管有缺点，但仍然比其他组织经济活动的方式好得多。这一点实际上在过去40年里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市场优于其他方式的原因恰恰是它围绕信息组织经济活动。

但是，在世界经济仍然是市场经济并保留市场机构的同时，它的本质发生了彻底变化。如果它仍然是“资本主义的”，那是“信息资本主义”统治着它。在过去40年里成为经济中心的产业，一直把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和销售而不是物品的生产和销售

作为其业务。制药业的实际产品是知识；药片和凭处方供应的油膏仅仅是知识的包装物。这些产业现在有通讯业和生产计算机、半导体及软件等信息加工工具和设备的产业。这些产业有信息生产者和销售者（电影、电视节目、录像带）。而生产和使用知识的"非企业"，即教育和保健，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甚至比以知识为基础的企业发展得更快。 ①

老资本主义的"超级富人"是19世纪的钢铁大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繁荣时期的"超级富人"是计算机制造商、软件制作者、电视节目制作者或诸如像罗斯·佩罗——一家安装和操作信息系统企业的创建者——那样的人。那些在零售业发大财的人（如美国沃尔玛特公司的萨姆·沃尔顿、日本伊藤育家堂公司的伊藤政仁或英国的塞恩斯伯里兄弟）靠的是围绕信息重组了他们的老行业。

事实上，过去40年，无论什么传统产业之所以能成长壮大，是因为它们围绕知识和信息进行了重新改组。综合钢铁厂正在过时。它即使在低工资国家也无法与小钢铁厂竞争。小钢铁厂是完全围绕信息而不是高温组织的钢铁厂。

现在靠制造或运送产品获得高利润已不可能了。但靠控制货币谋取高利润更是不可能的事。

1910年，奥地利裔德国社会党人鲁道夫·希法亭（1877—1941年）杜撰了"金融资本主义"这个术语。他断言在社会主义必然到来之前，这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银行为存款所付的钱与从贷款所收的钱之间的差额在无

---

① 最有说服力的批评之一是，卡尔·波拉尼（1886—1964年）在他1944年的《大转变》一书中提出的批评。

情地扩大。结果，银行和银行家成了唯一的赢利者和资本主义经济统治者。几年后，列宁把这个论点作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础。这解释了苏联计划围绕国家银行安排和通过银行信贷分配来控制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关于金融资本主义的理论仍是社会主义者的信条。这就解释了战后英国工党政府立即将英格兰银行国有化，以及几年后法国第一届社会党政府将主要商业银行国有化的原因。

但各地的商业银行都陷入了困境。它们为存款付的钱与从贷款所收的钱之间的差额在逐步缩小。靠贷款赢利，已无法过上舒适的日子。它们只能日益靠收取信息费过日子，更别提赢利了。

通过依靠传统资源，即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资本，获取的利润越来越少了。财富的唯一(至少是主要的)创造者是信息和知识。

知识经济学

我们至今还不十分理解，知识是如何作为经济资源起作用的。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经历以形成一种理论并检验它。至今我们只能说，我们需要这种理论。我们需要一种能使知识成为财富创造过程中心的经济理论。只有这种理论能解释目前的经济。只有它能解释经济增长。只有它能解释创新。只有它能解释日本经济取得成功的途径，首先是它取得成功的原因。只有它能解释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新来者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横扫市场并驱逐所有竞争者的原因，不管那些竞争者在市场上的地位有多么牢固，如同日本人在民用电子产品市场和美国汽车市

场上所做的那样。

至今，还没有知识领域的亚当·斯密或戴维·李嘉图的任何迹象。但对知识的经济行为的第一批研究报告已开始出现。[①]

这些研究报告清楚地表明，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并不以现有经济理论所假定的方式运行。因此，我们知道，新的经济理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将完全不同于任何现有的经济理论，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凯恩斯主义，古典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

经济学家的基本假定之一是，“完全竞争”既是资源分配模式，也是经济收益分配模式。不完全竞争是“现实世界”中常见的。但是它被假定为经济受外部干预，即垄断、专利保护、政府管制的结果。但在知识经济中，不完全竞争似乎是经济本身固有的。通过对知识的早期应用和开发（即通过现在所说的“学习曲线”）获得的初步优势变成永久的、不可改变的。这意味着自由贸易经济学和保护贸易主义都不会独自作为经济政策起作用。总的来说，知识经济似乎需要两者。[②]

经济学家的另一个基本假定是，经济取决于消费或投资。凯恩斯主义拥护者和新凯恩斯主义拥护者（如米尔顿·弗里德

---

① 例子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保罗·罗默所做的工作，如他的两篇文章：《政治经济学杂志》（1990年）上的“内在技术变化”和《美国经济评论》（1990年）上的“非连续凸函数对理解增长重要吗？”牛津大学莫里斯·斯科特所做的工作，特别是他的《对经济增长的新看法》（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一书；纽约大学数学家和计算机专家雅各布·施瓦茨在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的刊物《代达罗斯》1992年冬季号上的文章“美国90年代经济—技术议事日程”——最后一篇文章是对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经济学所作的缜密但非行话的陈述

② 1992年1月4日出版的《经济学家》上的一篇未署名文章颇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曼）提出经济依赖于消费；古典主义拥护者和新古典主义拥护者（如“奥地利人”）提出经济依赖于投资。在知识经济中，两者似乎都不控制经济。没有丝毫证据说明，经济中消费的增加导致知识的更多产出。但也没有丝毫证据说明，经济中投资的增加导致知识的更多产出。至少消费增加与知识产出增加之间的间隔时间或投资增加与知识产出增加之间的间隔时间似乎太长，以致无法进行分析（而且肯定太长，因而不能将经济理论或政策基于不管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之上）。

同样与传统经济理论不一致的是，不同种类的知识缺少共同的名称。不同地块的出产不一样；但它们的价格由这些不同之处，即产出的数量，来决定。说到新知识，有三种（第四章已论述过这一点）。第一种是工序、产品和服务的不断改进——日本人做得最好，他们称之为改善。第二种是开发；不断开发现有知识以发展不同的新产品、新工序和新服务。最后是真正的创新。这三种用知识产生经济（和社会）变化的方式，需同时在一起运作。对它们的需要是相同的，但它们的经济特征（成本和经济影响）在数量上是不同的。总之，现在（至少至今）不可能用数量表示知识。当然我们可以估计生产和销售知识的成本是多少。但是我们说不出生产多少（实际上甚至说不出“知识收益”是什么意思）。然而，如果没有用数量关系表示经济活动的模式，就没有经济理论。没有经济理论，就不可能作出合理选择（而合理选择正是经济学所要完成的全部事情）。

首先，知识的量，即它的数量方面，远远没有知识的生产力——即它的质方面——那么重要。而且，这适用于新知识，同样适用于旧知识及其应用。

知识生产力

知识没有跌价。所有发达国家在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上花的钱差不多是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正规教育(年轻人在加入劳动大军之前接受的学校教育)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一(从一战时的2%左右上升)。用人组织在其雇员继续教育上的花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亦可能还要高些。还剩下国民生产总值的3—5%花在研究与开发上,即新知识生产上。

极少国家拨出相同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以形成传统(即货币)资本。甚至在资本形成率最高的两个主要国家,日本和德国,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40年中最不稳定的重建和扩展时期,资本形成率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在美国,资本形成率有许多年没有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0%。因此知识形成已是每个发达国家的最大投资。无疑,一个国家或一家公司的知识收益必定会日益成为其竞争力的决定因素。知识生产力在经济和社会成功方面,总之在经济运作方面,越来越是决定性的。而且我们知道,国家之间、行业之间和组织之间,知识生产力大不一样。这里列举几个例子。

按科技知识的生产来说,英国应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领先者。抗菌素、喷气发动机、人体扫描仪、甚至计算机,都是英国的产物。但英国并没有成功地把这些知识成就转化为成功的产品和服务,转化为工作岗位、出口商品、市场地位。与其他事情相比,英国知识的非生产性更是其经济止足不前和逐步削弱的根本原因。

今天，在美国社会中，与知识生产力有关的类似危险信号大量存在。在一个又一个行业中（从集成电路到传真机以及从机床到复印机），美国公司发明了新技术，结果却看到日本公司开发产品和占领市场。在美国，每次知识的额外投入的额外产出显然比其日本竞争者低。美国的知识生产力在重要领域正在落后。

德国提供了另一种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至少在 1990 年和重新统一之前）取得了重大经济成就。在大多数产业（而且在银行和保险等领域），西德获得了比德意志帝国或希特勒之前德国更强有力的领导地位。例如，西德年复一年的人均出口额是美国的 4 倍、日本的 3 倍。因此西德在旧知识方面，在应用它、改进它和开发它方面有非常高的生产力。但它在新知识方面，特别在高新技术领域，生产力非常低，这些领域包括计算机、通讯、药品、新型材料、生物进化等。按比例来说，西德在这些领域投入的金钱和人才与美国一样多（可能更多）。它产生了相当多的新知识。但它在将新知识转化为成功的创新方面，却令人注目地失败了。新知识仍是信息，并没有成为生产力。

最有意义的例子是日本。在过去 40 年里，日本在旧的制造业和新的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中都干得非常出色。可是，日本的迅速崛起不是以生产知识为基础的。日本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大多产生于其他地方，其中大多数产生于美国。日本在国内认真建立知识基础的工作几乎要到 70 年代末才开始；甚至现在，在日本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 90 年代，它的知识进口仍然大于知识出口。而且日本人实际上没有进口大量的技术（区别于管理）知识。但他们极其出色地使获得的知识变成了生产力。

总之，资源生产力很有可能成为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学最关心的事情。它是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基础。我们还面对与货币资本有关的生产力问题，十分类似于我们面对与知识资本生产力相关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货币资本生产力为经济学家所忽视。他们中几乎所有人，包括马克思，根据资本数量而不是根据其生产力来考虑问题。甚至凯恩斯也只是区分投资的钱和贮藏的钱。他认为，钱一旦投资就必然会有生产力。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开始提出问题：额外投资单位产生多少额外的产出？资本的生产力是什么？以后变得明显的是货币资本生产力方面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很重要，极其重要。

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刚开始关注资本生产力时，中央集中规划在全球非常盛行。人们只是问，根据苏联五年计划自上而下制定的详细规划或法国的指定性计划是否是管理经济的更好办法。但几乎每个人都同意，计划产生的效益，在总产出和投资单位产出方面，要比无计划的资本市场分配好得多。

衡量实际业绩的最初尝试很有说服力地表明，按上述两种计划模式办事，资本生产力很低，而且逐步下降。它们表明，按中央集中规划办事，额外资本投资单位产生越来越少的额外产出。

法国人随即采取行动。他们搁置了指定性计划，同时搁置了经济计划。法国如果不在60年代初作180度转向，今天很可能看上去像东德一样。

苏联计划制订者继续制订计划。苏维埃帝国的资本生产力继续下降——到了实际上变成负增长的地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农业投资持续增加，最终在所有可用的非军用款项中占了最大的一份。但俄国人在农业中投入的钱越多，收成却越少。而

且资本生产力的负增长同样也吞没了俄国的民用产业(我们没有关于防务部门的任何信息)。资本生产力的失败是导致苏联经济最终崩溃的最主要原因。

我们现在知道,中央集权阻碍货币资本生产力的发展。世界银行对第三世界的巨额投资不是中央集中规划,但过去是(现在也是)高度集中的。它们的生产力很低。它们建造了十分醒目的纪念物,如许多钢铁厂,但基本上没有产生什么"倍数"效应。在工厂门外,它们没有创造什么工作岗位。经济上,它们很少能维持自己,更不用说赢利了。因此,它们成了国民经济的累赘,而不是为它提供额外投资资本。

总的来说,中央集中规划和中央集权很可能会使知识资本像货币资本一样无利可得。

近来,日本人为"高科技"知识制订计划很盛行,就像大约30年前俄国人和法国人为经济发展制订计划一样。然而,至今的效果一点也不引人注目。日本高科技产业的胜利基本上不是大肆吹捧的政府计划的功劳。大多数计划以失败告终,如雄心勃勃的开发"第五代"超级计算机计划。美国通过政府发起的"联合企业",即通过创新的中央集权,击败日本人的各种计划,也是很不成功的。

创新,即用知识生产新知识,不是美国那么多民间传说所断言的"灵感",也不是孤单的个体在其车库里干得最出色。创新需要系统的努力和高度的组织。[1] 但它还需要权力下放和多样性,即中央集中规划和中央集权的反面。

---

① 关于这一点,参见我1985年的《创新与工商企业家》一书(伦敦:海涅曼出版社)。

管理的要求

中央集权、权力下放和多样性等术语不是经济学术语，而是管理术语。我们没有关于知识投资生产力的经济理论（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有这种理论）。但我们有管理规则。首先，我们知道，使知识富有成效是一种管理的责任。它不能由政府来承担。但它也不能由市场力量来承担。它需要系统地、有组织地把知识应用于知识。

第一条规则理所当然是为了产生效果，知识的目标必须定得高。步子可小一点而后逐渐加快。目标必须雄心勃勃。知识只有当被应用而产生影响时，否则是决没有生产力的。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匈牙利裔美国人奥尔贝特·冯·圣捷尔吉（1893—1990年）使生理学发生革命性变革。让他说说取得成就的原因时，他把功劳归于他的老师，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匈牙利省级大学教授。圣捷尔吉说，“获得博士学位时，我提出研究肠胃气胀（对此过去一无所知，现在仍然一无所知）。”教授说，“非常有趣，但从来没有人死于肠胃气胀。如果你要出成果（这是最难逆料的重大问题），最好是把知识用在产生影响的地方。”圣捷尔吉说，“此后，我开始从事基本化学组成研究，并发现了酶。”

圣捷尔吉的每一项研究都是一小步。但一开始，他目标定得高：发现人体的基本化学组成。同样，在日本人的改善中，每一步都很小（这儿一个小变化，那儿一个小改进）。但是，目标是通过逐步改善，在几年后生产出完全不同的产品、工序或服务。

目标是要起重要作用。

其次,使知识有生产力,需要知识完全集中。它必须高度集中。知识方面所作的努力,不管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都需要设立目标和进行组织。它不是"天才的闪现",而是实干。

使知识有生产力,还需要系统地利用变化的机会(我在早先一本书①里所说的"七个创新手段")。这些机会必须与知识工作者和知识集体的能力和实力相适应。

使知识有生产力,最终还需要管理时间。知识的高生产力(不管在改进、开发还是创新方面)产生于一个长期酝酿阶段的结束之时。可是,知识生产力还需要短期的细水长流般的效果。因此它要求一切管理中最难达到的成就:使长期与短期保持平衡。

我们在使知识有生产力方面的经验,至今主要是在经济和技术领域取得的。但同样的规则适用于在社会问题、政体和与知识本身有关的领域里使知识有生产力。将知识应用于这些领域,至今还没有做什么工作。但是我们在这些领域比在经济、技术或医药等领域更需要知识生产力。

只是融会贯通

知识生产力需要增加来自个人或集体所熟知内容的产出。

有一个美国老故事,讲的是一位农民拒绝了一个更有成效的务农方法的建议。农民的回答是,"我早已知道增产两倍的务

① 《创新与工商企业家》(伦敦:海涅曼出版社,1985年)。

农方法了。"

我们中大多数人(也许所有人)所拥有的知识比我们实际使用的多许多倍。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动用自己拥有的多种知识。我们没有把知识作为工具箱的一部分来对待。我们倾向于按专业知识领域给任务分类,而不问"在有关适用于完成这项任务的知识上,我知道些什么,我学到过什么?"

在与管理人员一起工作中,我一次又一次发现,已有的挑战(比如在组织结构或技术方面)在管理人员拥有的知识面前一一被化解。他或她可能是在大学经济学课上获得知识的。"当然,我知道"这是一种标准的反应,"但这是经济学,而不是管理"。当然这纯粹是随心所欲的区分——也许对教学一门"学科"来说是必要的,但作为知识及其作用的定义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组织企业、政府机构和大学的传统方式进一步使人们相信,工具的目的是为工具箱生色,而不是致用。

在教学中,我们确实必须集中精力于工具。在使用过程中,我们必须集中精力于最终结果、任务和工作。"只是融会贯道",是英国伟大小说家福斯特(1879—1970 年)反复提出的告诫。这一直是伟大艺术家的特点,但同时又是伟大科学家的特点,是类似像达尔文、波耳和爱因斯坦这种人的特点。在他们的层次上,这种融会贯通能力可能是天生的,是我们所说的"天才"的那种神秘事物的一部分。但在很大程度上,融会贯通并因面提高现有知识的产出(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集体或甚至于整个组织)是可以通过学习达到的。最终它应成为能传授的。它需要一种问题界定的方法论——这也许甚至比(现在流行的)"问题解决"的方法论更为需要。它需要系统地分析特定问题所需的知识和信息的种类,以及安排特定问题得以解决的阶段所需

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系统研究”的基础)。它需要所谓的“组织无知”[①] ——周围总是无知多于知识。

使知识专业化成为学科知识,使我们在每个领域都具有极大的完成工作的潜力。但由于学科知识的专业化,我们还需要方法论、学科、及变潜力为完成工作的一个过程。否则,大多数可利用的知识不会有生产力。它将依然是信息。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严重失败。但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同样也是严重失败。一个人只能种个别的树,只能砍个别的树。可是,森林是“生态”,是环境。没有它,个别的树无法生长。为了使知识有生产力,我们必须学会既看到森林,又看到树木。我们必须学会融会贯通。

知识生产力将日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产业、一家公司的竞争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就知识而言,没有一个国家、一个产业、一家公司有任何“天然”优势或劣势。它能拥有的唯一优势与它能从普遍适用知识中获取多少有关。在国内和国际经济学中日益重要的唯一事情是,管理在促使知识有生产力方面取得的业绩。

---

① 这本来是我40年前开始写作但从未结束的一本书的名字。

11

应负起责任的学校

学校正在被技术革命所淹没:台式电脑、卫星传输直接进教室。技术革命将在几十年内改变我们的学习方式和教学方式。它将改变教育经济学。学校将从几乎完全劳动密集型变为高度资本密集型。

但更重大的变化(尽管迄今为止还很少论述过)将是学校社会地位和作用的变化。虽然长期以来学校是一个必要机构,但它一直是社会的机构,而不是社会中的机构。它关心尚未成为公民、尚未负责任、尚未加入劳动大军的年轻人。在知识社会,学校同时也成为成年人的机构,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的机构。首先,在知识社会,学校开始对工作完成情况和效果负有责任。

几百年前,西方学校经历了早期的技术革命。这场革命是由印刷图书引起的。这场早期的技术革命为今天提供了很重要的教训(而且不是技术方面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采用教学新技术是国家和文化成功的先决条件(也是经济竞争力的先决条件)。

1500年至1650年期间,西方成为全世界的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围绕印刷图书的新技术重组了学校。相反,中

国和伊斯兰教国家拒绝围绕印刷图书重新设计其学校，成为它们衰退和最终屈从西方的主要因素。后两者都使用印刷术——当然，中国人已用了几个世纪(尽管没有用活字)，但它们不让印刷图书进学校；拒绝把印刷图书作为教学工具。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坚持死记硬背的方法；他们在印刷图书中看到了对其权威的威胁，就因为印刷图书能使学生独自阅读。在中国，儒家学者同样拒绝接受印刷图书；他们坚持手写书法。印刷图书与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信条不相一致：精通手写书法才有资格当统治者。

1550 年前，中国和奥斯曼帝国(伊斯兰的政治化身)是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科学上和文化上的世界"超级大国"。1550 年前，两国在世界上占有优势地位。自 1550 年起，两国日益死气沉沉。两国开始闭关自守。两国日益采取守势。在西方，学校开始被视作"进步的"机构，被视作所有领域(文化、艺术、文学、科学、经济、政治和军事)取得进步的发动机。在伊斯兰教世界和中国，学校开始日益被视作进步的一个主要障碍；造学校的反是这两大文明社会的一切改革运动的起点。

早期在学习上的革命显示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教训：技术本身没有如它所激发的在学校教育和学校的实质、内容和重点上的变化那么重要。实质、内容和重点上的这些变化才是真正重要的。教学技术方面哪怕仅有极小的变化，也能产生效果。

日本人也没有在其"新的""现代"学校——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京都复兴"时期文人(即文人学士或人文学者)发展的学校——中采用西方模式。不像西方，他们没有使印刷图书成为教学的中心；事实上，日本书法在京都的由文人建立的学校里发展到顶峰，然后退及整个国家。他们的学校强调书法所给予的

磨练和它培养的美感(日本教育至今还是如此)。然而,文人的学校并不像中国人那样回避印刷图书。它们使用它,而且富有成效。首先,它们不同意中国人把"学者"视作为不同于普通百姓的并与普通百姓分离的精英集团的思想。文人的目的在于普及大众文化。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劝导当地领主为其领地内的孩子开办学校,并向所有孩子开放。而且在内容和实质上,文人学校大量利用能从西方及其学校学到的一切东西(主要通过住在长崎的荷兰商人)。事实上,200 年前京都复兴时期的这些学校是显示日本人在吸收外国文化(这里包括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并使之"日本化"的独特能力的最好例子。正是文人学校使日本人在一个世纪后成为非西方民族中唯一的一个现代民族,其在经济、技术、政治制度和军事方面变得"西方化",而在根本上仍是十足的"日本人"。在 19 世纪末那些推动德川幕府时期与世隔绝的、仍然是封建主义的日本向着"明治维新"时期"现代"日本过渡的人都是文人学校培养的学生,都是某位文人大师或其崇奉者的学生。

因此,不管多么重要、多么引人注目,技术不会是学校和学校教育转变的最重要特征。最重要的将是,重新考虑学校和学校教育的作用和功能:它们的内容,它们的重点,它们的目的,它们的价值。技术将是非常重要的,但主要因为它将迫使我们做新的事情,而不是因为它将使我们能把旧的事情做得更好。

欧洲早期的教学革命又一次提供了实例。这项发展的最伟大人物、可以称为"现代学校之父"的唯一的人,是约翰·阿莫斯·夸美纽斯(1592—1670 年),一位捷克新教徒(原名是科门斯基)。1618 年捷克人反对天主教哈布斯堡王朝起义失败后,他被天主教反宗教改革势力逐出国门。我们应把使印刷图书成为

教学有效载体的技术归功于这位夸美纽斯;他发明了识字课本和教科书。但是这些对他来说只是工具。他的学校以新课程为中心。总的来说,它仍然是全世界的学校所认为的"教育"。他的目标是普及大众文化。而他的动力是出自宗教上的:使他的捷克同胞继续做新教徒,能独自阅读和研究《圣经》,尽管当时他们的宗教遭到禁止并且他们的本堂牧师被获胜的天主教徒所驱逐。

面临的真正挑战不是技术,而是使用技术的目的。至今没有一个国家有知识社会所需的教育制度。至今没有一个国家满足其主要需求。至今没有一个人知道"答案";没有一个人能做需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至少能提出问题。我们能界定学校和学校教育规格,尽管只是粗线条的。这些规格可能符合后资本主义社会——知识社会——的现实。它们规定学校要不同于现在作为"现代"学校存在的学校,就像夸美纽斯350年前制定规格的现代学校不同于印刷图书出现前存在的学校一样。以下就是规格:

●我们所需的学校必须提供高层次的大众文化(远远超出现在的"文化"含义)。

●它必须使各个层次和各种年龄的学生具有学习动力和经受继续学习的磨练。

●它必须既向已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开放,也向早年因某种原因而未能接受高一级教育的人开放。

●我们需要学校教育传授既作为内容又作为过程的知识(即德国人所谓的知识与才能之间的区别)。

●最后,学校教育不再为学校所垄断。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必须遍布整个社会,各种用人组织(企业、政府机构、非赢利组织)都成为教学机构,而学校日益与雇主和用人组织合作共事。

新的业绩要求

一个更高层次的大众文化是最优先考虑事项。这是基础。没有它,没有一个社会能希望在后资本主义世界及其知识社会中发挥大的作用。使学生拥有能起作用、能作贡献和满足受雇条件的谋生手段,也是任何教育制度首要的社会责任。

新的学习技术将首先影响及大众文化方面。历代的大多数学校,花了不计其数的时间,努力教授最好学的而不是最好教的内容,即通过行为,通过练习、重复、反馈来学习。从小学的大多数课程到教育过程中以后阶段的许多课程都如此进行。而这些课程,不管是阅读、写作、算术、拼写、历史、生物(甚至还有神经外科学、医学诊断和大多数工程学等高级课程),都是最宜通过计算机程序来学的。教师则可做动员、指导和鼓励工作。教师成为领导者和资源。

在明天的学校里,学生将以计算机程序为其工具,自己当自己的教师。事实上,学生越年轻,计算机就越受到欢迎,接受指导和教授的内容就越多。在历史上,小学完全是劳动密集型的。明天的小学将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密集型的。

可是,尽管有可利用的技术,大众文化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传统的文化概念已不足以加以阐述了。阅读、写作和算术将是需要的,如同现在一样。但今天文化需要远远超出了这些基础的东西。它需要计算能力。它需要对科学和对技术动态有基本

的了解。它需要熟悉外语。它还需要学习如何当好组织成员，即雇员。

大众文化需要对学校教育的优先事项有明确的承诺。它要求学校，特别是初学者即孩子的学校，把掌握基础技能放在第一位。除非学校成功地向幼小的初学者传授这些技能，否则它无法完成其重要职责：给予初学者自信，给予他们能力，使他们几年后能在后资本主义社会——知识社会中起作用，达到预期目的。

这需要现代教育特别是美国教育的主要趋势发生逆转。正如所预料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或至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实现大众文化后，美国教育彻底改变了它的优先事项。社会改革而不是学习，成了学校最优先考虑事项。50 年代和 60 年代，我们在美国作出这项决定时，它很可能是必然的决定。我们面临的种族问题的严重程度迫使我们使学校成为种族融合的代理人（而黑人和奴隶制罪恶的影响是过去 150 年美国最主要的挑战，并有可能仍然是今后至少 50 年或 100 年美国最主要的挑战）。但是学校做不了这份社会工作。像其他组织一样，学校只善于完成其属于自身特殊目标的任务。使学习服从社会目标实际上很可能会阻碍种族融合和黑人的深造（越来越多正在获取成就的黑人这样断言）。但是，社会目的置于学习目标之上的做法成了美国基础教育衰落——即美国传统文化危机——的重要因素。中上层阶级的孩子依然在受教育，而最需要它的人——穷人的孩子和移民的孩子却得不到。

现在需要的是，重申学校的原来目的。其目的不是社会改

革或社会改良。其目的必须是个人学习。美国教育中最有希望的事态发展是，这日益成为达到预期目的的黑人所主张的东西，如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的黑人女立法者不顾教育机构激烈反对，使“传票制度”获得通过。这项计划使家长能为孩子选择一所集中精力于学习并要求学习的学校。

这种杰出人物统治论——实际上的种族主义的立场，将受到自由主义者和持进步教育理论的人的批评。但是，最具有高人一等优越感的学校——日本学校——创造了最平等的社会。甚至那些没有在激烈竞争的教育竞赛中崭露头角的人，也依然获得了按传统标准来说极高的文化和能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并取得预期目的的极高能力。可是，在日本学校里，文化是第一位的，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但是至今在周围也有足够的美国学校让最贫困的黑人孩子入校读书，因为它们被期待和要求这样做。

学会如何学习

“文化”在传统上是指学科知识，如做乘法的能力或关于美国历史的一些知识。但是知识社会同样需要过程知识(学校甚至极少尝试教授的内容)。

在知识社会中，人们必须学会如何学习。实际上，在知识社会中，学科知识可能没有学生继续学习的能力和他们继续学习的动机来得那么重要。后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终身学习。为此我们需要学习的磨练。但终身学习也要求，学习是吸引人的，实际上，即使不是个人迫切需要的，也应成为一大乐事。

在今天的所有教育制度中，只有日本人试图以学习磨练其学生。18岁参加数学考试得分很高的日本学生，10年后记住的数学内容并不比10年前得分很低、现年28岁的美国人多。但日本人走出校门时，已学会如何研究，如何坚持不懈，如何学习。

但日本人的学习磨练（大学人学考试的“考试地狱”的磨练）并没有激发学习积极性。由于以害怕和压力为基础，它压制了继续学习的欲望。而这种欲望正是我们需要的。

相反，在美国的文科大学，对许多学生来说，学习是件乐事。但仅仅有乐趣而已。在学习上缺少磨练。它误解了因成就而“洋洋得意”和因磨练而“被激励”的意思。

实际上，我们确实知道要做什么。在过去即使不是几千年也是几百年里，我们一直在创造继续学习的动机和所需的磨练。艺术家的好导师这样做了；运动员的好教练这样做了；近来我们从管理发展文献中知道其许多情况的组织的好“顾问”也这样做了。他们使学生取得如此出色成绩，以致后者都感到意外并从中获得刺激和动机（尤其是继续学习所需要的一丝不苟、遵守纪律、坚持不懈地工作和实践的动机）。

没有什么事情比练音阶更乏味了。可是，钢琴家越伟大、越有才艺，他们练音阶就越认真，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同样，外科医生越出色，他们练扎缝线越认真，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钢琴家为了技艺上极微小的进步，连续几个月练音阶。但是只有这样做才能使他们获得早已在其内耳中听见的音乐效果。外科医生为了手指灵巧程度有极微小的提高，连续几个月扎缝线。但是这能使他们加快手术进程，从而挽救生命。成绩是靠累积的。

但是，这种成绩不是把不特别擅长的事情做得稍许略好一

点。这种激发积极性的成绩是把擅长的事情做得特别好。成绩必须以学生的实力为基础(一千年来,艺术家的每一位导师、运动员的每一位教练和每一位顾问都知道这一点)。事实上,找到学生的实力所在并使之集中在取得成绩上,正是对教师和教学的最好界定。它是希波的圣奥古斯丁(354—420年)——最伟大的西方传统教师之一——在《关于教师的对话》中下的定义。

当然,学校和老师也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很少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学生实力上并激发它。相反,他们必须把精力集中在缺点上。课堂上,几乎所有时间(至少在大学研究生院之前)都花在纠正缺点上,花在培养体面的平庸之才上。

学生确实需要获得最低限度的基本技能。他们确实需要纠正缺点的工作。他们确实需要获得平庸才能。但是,在传统学校里,几乎没有时间干其他的事。传统学校最引以为荣的产品,"全A学生",是全面达到平庸标准的人。他们不是获得进取的人;他们是顺从的人。但是,再说一遍,传统学校别无选择。使每个学生具有足够的基本技能是首要任务。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只能靠集中精力于学生的缺点并将它们纠正上(甚至在一个小班级也是如此)。

在这方面,新技术可能会起最大的作用。它们使教师不再把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时间花在常规学习、补习学习、重修学习上。教师仍需要指导这些活动。但是,传统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一直花在"后续措施"上。用老话来讲,教师的大部分时间不是花在当教师上,而是花在当"教学助手"上。然而,这方面计算机可干得很出色,确实比人干得更出色。我们可以期望,教师将因此日益有时间确定各个学生的实力,把精力集中在它们上面,并使学生取得成绩。我们可以期望,他们将有时间教授。

但是，即使技术使他们能这样做，学校是否会改变态度，把精力集中在学生实力上呢？它是否会愿意教“个人”而不是“学生”呢？学校和教师仍然必须说：“贝齐（或约翰），你需要多做长除法练习；这里有一些例子，动脑筋算一下。”学校和教师仍然必须检查贝齐或约翰是否真的做了。他们仍然必须与贝齐或约翰一起坐下来，对他进行解释、示范和鼓励。但是，有计算机作为教学助手，教师不必与贝齐或约翰一起坐下来，监督作业做的情况（现在这是他们花费其全部或至少大部分时间的地方）。但是他们是否会愿意说：“贝齐，你画得那么好；为什么不为全班同学画像呢？”

还有另一种过程知识要由学校来教——或至少在学校里教：为获得我在前一章所说的知识“产出”而需要的过程。如上所述，能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很可能在实践中而不是在学校里。至今与知识产出有关的唯一教育机构是“职业”学校，如工程学院、医学院、法学院和管理学院，因为这些都是集中精力于实践而不是理论的学校。但是每个人必须能提高知识产出。这要求过程（概念、诊断、技能）必须能传授，或至少能学习。这肯定是一次对教育的挑战，而就其本身而言，也是对学校的挑战。

社会中的学校

长期以来，学校一直是最主要的社会机构（在西方，至少从文艺复兴以来，而在东方，时间则更长）。它一直是“社会的”而不是“社会中的”学校。它一直是独立的机构。它同其他机构相

结合即使有也次数不多;在西方,这样的情况只是发生在很早的时候,在中世纪初的本笃会隐修院中,其学校主要培养未来的修道士而不是俗人。再说,学校不是为成人办的;"教学"这个词的词根是希腊语中的男孩这个词。

因此,学校将日益变得是社会中的学校。这一点,可能像教学方法、主要教学内容、教学过程中的任何变化一样,是一种彻底的变化。学校将继续教年轻人。但由于学习已成为一种终身的活动而不是一个人"长大"后就停止的事,所以学校必须为了终身学习而组织起来。学校必须成为"开放的系统"。

(几乎每个地方的)学校都是根据以下假定组织起来的,即每个学生必须在规定的年龄进入每一阶段,并作好规定的和规范的准备。在美国,一个人在 5 岁时进幼儿园,6 岁进小学,12 岁进中学,15 岁进高中,18 岁进学院或大学,等等。如果一个人漏掉了其中一个阶段(幼儿园除外),他或她就会永远不合步伐,并且很少有可能重新补上。

对传统学校来说,这是一条不言而喻的公理,而且几乎是自然法则。但它与知识的性质,与知识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要求不相一致。现在需要的是一条新公理:"一个人接受的学校教育越多,他或她就越需要更多的学校教育"。

在美国,医生、律师、工程师、企业经理人员日益需要每隔几年回学校进修,以免被淘汰。然而,在美国以外的地方,成年人重新接受正规学校教育仍是例外(特别是成年人在他们已经获得真实知识和高级学位的领域中重新接受高级学校教育)。它在日本几乎依然无人知晓(而在法国、意大利,以及一般来说,在德国、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是如此)。它必须成为所有发达国家的标准。

更新奇的是使教育制度开放的需要，即允许人们在任何年龄进入它的各个阶段的需要。

这种情况正在美国迅速发生。而且还有英格兰开放大学。但这些仅仅是开始。

知识社会难以浪费知识潜力。而学位也已成为走上知识工作岗位的保障。甚至在有大量年轻人上大学的美国和日本等国家，数量更多的年轻人在16岁或18岁就不再上学了。没有理由认为其中大多数人缺少知识工作所需的知识才能。我们所有的经验都证明，事实正好相反。使他们有别于上大学的年轻人的原因常常只是缺少钱。有相当数量非常聪明伶俐的年轻人没有上大学，因为他们18岁长大成人，想成为成年人而不想继续待在青春期里。10年后许多人又想重返学校。假使那样的话（教过他们的每个人都将作证），即使仅仅因为他们有较好的动机，他们也会成为具有挑战性的学生。他们现在想做高级工作；而19岁的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被告知这样做。

但更重要的是，不论年龄或原先的教育程度，每个人都能享受高级教育，这是社会需要。每个服务工作者都必须有机会从事知识工作。实际上，这意味着后资本主义社会必须创造一种教育制度，用计算机术语来说，它能"随机存取"。个人必须能够在其一生中的任何阶段继续接受正规教育，并具有从事知识工作的资格。社会必须愿意让人们——不论年龄——从事他们胜任的工作。

今天没有一个社会是为此而组织起来的。事实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组织结构是为了使人们待在他们开始工作生涯的岗位上。在日本，这种体系是僵化的，但在欧洲差不多也是这样。美国在创造成人教育机会方面走得最远。过去20年，美国教育

的增长领域是任何年龄的成人继续教育(与基础有关,即与高中和大学程度有关,而且在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提供其专业中附加的、更先进的知识方面)。这使美国对其他发达国家占有巨大优势。但是甚至在美国,仍然有不情愿让人们从事知识工作的事,除非他们早年就达到了基本要求。

作为伙伴的学校

学校教育将不再是学校做的事。它将日益是一项合作事业,其中学校是伙伴而不是垄断者。在许多领域,学校还将只是与其他教学提供者竞争的教学机构之一。

如上所述,学校传统上是你学习的地方;工作岗位则是你工作的地方。这条界线将日益模糊不清。学校将日益是成年人继续学习的地方,尽管他们从事全日制工作。他们将回学校参加三天讨论会、周末课程、三星期强化课程或每周上两晚的课程,连续几年,直至获得学位。但工作岗位将同样是成年人继续学习的地方。当然,培训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过去培训对象仅限于新手。

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培训也将日益成为终身的。成年人,尤其是有先进知识的成年人,将日益是受训者又是培训者,是学生又是教师。

在美国,雇主(企业、政府、军队)花在培训成人雇员上的钱已几乎与国家花在正规学校教育年轻人上的钱一样多。

迟早要出现的是学校和用人机构之间的伙伴关系。德国人在其学徒计划中,使学校和雇主在过去150多年里共同培养年

轻人。但是,学校和用人机构必须日益学会在成年人的高级教育方面携手合作。这项任务(不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高级教育,还是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而早年未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的补修教育)将越来越多地以学校和其他组织之间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联盟、实习关系来完成。学校需要与成年人和用人组织共同工作的刺激,就像成年人和用人组织需要与学校共同工作的刺激一样。

应负起责任的学校

我们谈论"好学校"和"差学校","素负盛名的学校"和"无足轻重的学校"。在日本,少数大学(东京、京都、京王、早稻田、一桥)基本上控制了进入大公司和政府机关工作的机会。在法国,大学享有同样的权力和特权地位。尽管不再是学术界绝对权威,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仍是英国高等教育的"超级大国"。我们还喜欢采用各种衡量办法:特定文科学院毕业生中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人的比例;学院图书馆藏书册数;美国郊区高中毕业生中录取第一志愿学院的人数;不同大学在学生中的声望。但是我们几乎还没有开始提问:这所学校的成果是什么?成果应该是什么?

这些问题无论如何早该引起注意。本世纪,教育变得花钱太多却不能负起责任。如前面几章所述,在发达国家,用于学校系统的开支从1913年左右占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2%猛增至80年后的10%。但是,学校也正在变得非常重要而不能不负起责任(要彻底地全面考虑成果应该是什么以及完成取得

这些成果的过程)。当然,不同的学校系统和不同的学校将而且应该对这些问题作出不同的回答。但每个学校系统和每所学校将很快被要求提出这些问题并予以认真对待。我们将不再接受校长为失职而作出的老一套借口:"学生懒惰、愚笨。"由于知识成了社会最主要的资源,懒惰学生或差生是学校应负起的责任。对学校只有尽职的学校和不尽职的学校之分。

学校正在丧失作为学校教育提供者的垄断权。在不同学校之间一直存在着竞争(在法国,政府办的学校和教会学校之间的激烈竞争,或在美国,不同学院和大学之间的竞争)。产业中的竞争基本上没有发达国家"素负盛名的学校"之间的竞争那么激烈(或那么无情)。但是随着不同种类的机构进入该领域,每个机构都拿出与众不同的学校教育办法,竞争将日益在学校和"非学校"之间展开。

预计会进入该领域的一类机构是美国的大公司,它们已开始与主要商业学校竞争。它们把为本公司的经理制订的经营管理计划推销给其他公司,并正准备把它们提供给政府机构和军队。另一类是日本的塾,"填鸭式学校",它们现在招收了很大一部分日本初中生和高中生。还有一类是美国出版公司,它们最近开办了一家公司,打算在今后 5 年内建造 600 所学校。这些学校计划适当收费(不多于公立学校儿童的平均费用),可是它们十分有利可图。而且它们打算担保有效果("考试得高分,否则退还你的钱")。

这些冒险事业中,许多肯定会失败。但仍然会有大量的事业开办起来。由于知识成了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源,知识的"生产者"和"分配渠道"即学校的社会地位以及它的垄断地位会受到挑战。而且有些竞争者肯定会成功。

今后将教什么和学什么，今后将怎么教和怎么学，学校和学校教育的顾客是谁，学校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在今后几十年里，这一切都将因此发生很大的变化。实际上，其他机构所面临的挑战决不会像在改造学校和学校教育上面临的那些挑战那样激烈。

但是，最大的变化（而且是我们对此毫无准备的变化）是，学校将不得不对效果承担义务。它将不得不建立自己的"帐本底线"，即为此它应该负起责任并为此收取学费。学校将变得要负起责任来。

12

有知识的人

本书论述人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环境。它并不论述人。但在我们正在进入的知识社会，人是最重要的。知识不像金钱，它具有人格性。知识不归属为书、数据库和软件程序。它们只相当于信息。知识总是经由人得以体现，由人来教和学，由人来利用或误用。因此，向知识社会的转变把人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在这过程中，它提出了有关知识社会的代表，有知识的人的新挑战、新议题和前所未有的新问题。

在以前所有社会中，有知识的人只是装饰。他或她代表文化(Kultur 这个德文词含有畏怯和嘲弄的意思，无法翻成英文，甚至“博学的人”这个词也不紧扣原文)。但是在知识社会，有知识的人是社会的象征、社会的标志、社会的旗手。有知识的人是社会的“原型”(用社会学家的术语)。他或她界定社会的工作能力。但他或她还体现社会的价值观、信仰、承诺。如果说封建时代的骑士是中世纪初期的上流社会阶层，“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上流社会阶层，有知识的人将是知识成为最主要资源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上流社会阶层。

这必定会改变有知识的人的含义。它必定会改变受过教育的含义。因此可想而知，它会使有知识的人的定义成为一个重

要的问题。由于知识成了关键的资源，有知识的人因此而面临新要求、新挑战和新责任。他和她现在变得举足轻重。

在过去10年或15年里，美国学术界就有知识的人的问题展开一场热烈的（而且常常是激烈的）争论。是否应该有有知识的人？能否有这样的人？总之，什么才应该被认为是“教育”？

后马克思主义者、激进的争取女权运动者和其他“持反对论者”等组成的一帮杂七杂八的人争辩说，不能有有知识的人这样的事（那些新民粹主义分子——“解构主义者”——的立场）。这群人中的其他人则断言，只能有有知识的人，而每个性别、民族群体、种族、“少数民族”都需要自己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实际上是孤立主义的）有知识的人。由于这些人主要关心“人文学科”，因此至今为止对希特勒的“非犹太民族的白种人的物理特征”、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遗传学”或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心理学”没有什么反响。但这些反传统主义者的论点引人联想起极权主义者的论点。然而他们的对象是一致的：博学多才，乃为有知识的人这一概念的核心，而不管像西方称之为“有知识的人”也好，还是像中国和日本称之为“文人”也好。

对立的阵营（可以称之为“人文主义者”）也鄙视现有的制度，但原因是它未能产生博学多才的有知识的人。人文主义批评家要求回到19世纪去，回到“大学文科”、“古典学课程”、德国受教育的人去。至今他们没有重复50年前罗伯特·哈钦斯和莫蒂默·阿德勒在芝加哥大学所作的断言，即“知识”作为一个整体由少数“巨著”组成。但他们一脉相承了哈钦斯—阿德勒的“回到现代化前时代去”的观点。

双方都错了。知识社会必须把有知识的人这一概念作为核

心。它必须是一种普遍的概念,因为知识社会是各种学科知识的社会,因为它是全球性的(存在于它的货币、经济学、进程、技术、最主要的问题中,首先是它的信息中)。后资本主义社会需要有一支统一的力量。它需要有一个领导群体,这个群体能将地方的、特定的、不同的传统集中到一种对价值共享的承诺上、一种对优秀概念的共识上以及相互尊重上。

因此,后资本主义社会——知识社会——的需要恰恰与解构主义者、激进的争取女权运动者或反西方者所建议的相反。它所需要的正是他们完全拒绝的东西:博学多才的有知识的人。

可是,知识社会需要与人文主义者为之奋斗的理想不同的有知识的人。他们理所当然地强调,对手试图否定伟大传统以及作为人类遗产的智慧、美和知识的要求是愚蠢的。但是,仅架起一座通往过去的桥梁是不够的。而这正是人文主义者所做的。有知识的人需要能够运用他或她的知识,即使不能对未来施加影响,也要对目前有所影响。在人文主义者的建议中没有对这种能力的规定,实际上没有对它予以关心。但没有它,伟大传统就是枯燥无味的古文物收藏。

瑞士籍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尔曼·海赛(1877—1962年)在他1943年的小说《玻璃球游戏》(1949年的英译本名为《地方行政官吕迪》)中,过早地考虑了人文主义所想要的世界(及其失败)。这本书描述了一群过着庄严的孤独生活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人文主义者,他们献身于伟大传统及其智慧和美。但是书中的男主人公,最有才艺的兄弟会会长最终决定回到受污染的、冷酷的、庸俗的、动荡的、被冲突弄得四分五裂的、唯利是图的现实中来(因为,除非与世界有关,否则他的价值只是愚人金)。

www.55188.com 理想在线证券网

海赛50多年前预见的事现在发生了。“文科教育”和普通教育处于危机之中,因为它们成了玻璃球游戏,而头脑最灵活的人抛弃它,追求冷酷、庸俗、唯利是图的现实。最有才华的学生喜欢文科教育。喜欢的程度丝毫不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毕业的他们的曾祖父母。对那一代人来说,“文科教育”和普通教育在其一生中都富有意义。它界定了他们的身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毕业的我这一代人中的许多成员来说,它仍然是意味深长的(尽管我们很快就忘记了拉丁语和希腊语)。但是,今天的学生在毕业几年后都说:“我非常用功学到的东西毫无意义;它与我做的任何事情,我感兴趣的任何事物,我想成为的任何人物都没有关系。”他们仍然想让自己的孩子进文科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卡尔顿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东京大学、法国公立中学、德国高级中学(虽然主要是为了社会地位和有个好工作)。但在自己的生活中,他们抛弃了“文科教育”和普通教育。他们屏弃了人文主义者所主张的有知识的人。文科教育未能使他们理解现实,更不用说掌握现实了。

目前这场争论的双方基本上都不切题。后资本主义社会需要有知识的人(比以前任何社会都更需要)。享用过去的伟大遗产必将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事实上,“过去”包含的内容必将比人文主义者为之奋斗的多得多。他们追求的主要还是“西方文明”和“为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传统”。这仍然是19世纪的。我们需要的有知识的人必须能正确评价其他的伟大文化和传统:中国、日本、朝鲜的绘画和陶瓷的伟大遗产;东方的哲学家和主要宗教;既作为宗教又作为文化的伊斯兰。有知识的人还不能像人文主义者的文科教育那样只有“书呆子气”。他或她需要有分析,也同样需要有训练有素的洞察力。

西方传统仍然必将是最重要部分，即使仅仅为了使有知识的人能认真对付现在，更不用说对付未来了。未来可能是“后西方的”。它可能是“反西方的”。然而它不会是“非西方的”。它的物质文明和专科知识依赖于西方的基础：科学、工具、技术、生产、经济学、货币、金融和银行业务。除非以不但理解并且接受西方思想和西方传统为基础，否则这些都不起作用。

19世纪初，刻木头面具（现在发达国家热切地收集它们）的西非人对西方一无所知而且也不欠西方什么。他们在西非的后代仍然生活在部落村的泥屋里，现在仍在刻木头面具（而且有些人非常强壮）。他们的国家可能甚至还不是“不发达国家”。然而他们有无线电、电视机和摩托车。他们使用新工具，全都是西方技术的产物。他们为巴黎或纽约的艺术商雕刻。他们的美学归功于自己的西非祖先，同样也归功于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和毕加索。

今天最深刻的“反西方”运动不是原教旨主义伊斯兰，而是秘鲁“光辉道路党”的造反（印加人后裔正孤注一掷，为使西班牙征服者的努力前功尽弃，他们恢复使用印第安人的古盖丘亚语和艾马拉语，以及把令人痛恨的欧洲人及其文化撵回大海）。光辉道路党通过为纽约和洛杉矶吸毒者种植古柯为自己筹资。它最喜欢的武器不是印加人的弹弓，而是汽车炸弹。

明天的有知识的人必须为在一个统一世界中生活作好准备。这将是一个“西方化”的世界。但有知识的人还将生活在一个日益部落化的世界中。他们必须能成为“世界的公民”（以他们的眼力、见识和信息）。但他们还必须从其地方根基中吸取营养，反过来丰富和培育自己的地方文化。

后资本主义社会既是知识社会，又是组织社会。两者相互

依赖，又在概念、观点、价值观方面存有差异。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有知识的人（如前所述）作为组织成员将其知识付诸实践。有知识的人因此必须作好准备，同时在两种文化中生活和工作，即集中精力于文字和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和集中精力于人和工作的"经理"的文化。

知识分子需要作为工具的组织；组织能使他们将技术、专业知识付诸实践。经理把知识视作实现组织运行目的的手段。两者都是正确的。他们是对立面；但他们的关系是两极关系，而不是矛盾关系。他们都需要对方。研究科学家需要研究经理，而研究经理需要研究科学家。如果两者不平衡，就会什么也干不成，并导致全面失败。除非由经理起平衡作用，否则知识分子的世界将成为每个人"做自己的事"，而没有人做任何事的世界。除非由知识分子起平衡作用，否则经理的世界将成为官僚政治和"组织人"徒劳无功的暗淡世界。但是，如果两者相互平衡，就会有创造性和条理性、履行和任务。

在后资本主义社会，许多人实际上将同时在这两种文化中生活和工作。还有许多人能（而且应该）有接触过两种文化的工作经验，这主要通过工作调换，在就业初期从专家工作岗位调换到管理工作岗位去，如安排年轻的计算机技术人员担任项目经理和小组负责人，或要求年轻的院校教授在大学行政管理部门兼职两年。此外，为社会部门一个机构"义务"工作的经历将给予个人观察、了解和尊重两个世界——即知识分子世界和经理世界——的视角、平衡点。

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有知识的人必须为理解两种文化作好准备。

对 19 世纪有知识的人来说，技能不是知识。它们已经在大

学里讲授。它们已成为"学科"。它们的实践者是"专业人员"，而不是"手艺人"或"工匠"。但它们不是文科教育或普通教育的一部分，因而也不是知识的一部分。

关于技能的大学学位早就有了：在欧洲，法学学位和医学学位可追溯到13世纪。在欧洲大陆和美国(虽然不在英国)，新的工程学位(在1800年前一两年首次在拿破仑的法国授予)很快为社会所接受。大多数被认为"受过教育"的人靠实践一种技能谋生——作为律师、医生、工程师、地质学家，而且尤其是在商业中体现出来(事实上只有在英国才对没有职业的"绅士"表示尊重)。但是，他们的工作或职业是一种"生计"，而不是"生活"。

出了办公室，技能实践者不谈论工作，甚至不谈论学科。这是"有关本行的话题"。德国人蔑视它，说它是没完没了地扯业务。在法国，它更是受到嘲弄。沉溺于此的人被认为是愚钝的人、令人讨厌的人，并会随即从"上流社会"的受邀请人名单上除名。

但是，既然技能已成为学科知识，它们必须与知识融为一体。它们必须变成未来有知识的人的一部分。他们读大学时非常喜欢的文科教育没有做到这一点，无法做到这一点(事实上甚至拒绝在这方面作点努力)，这正是今天的学生在几年后抛弃它们的原因。他们感到沮丧，实际上感到被引入歧途。他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文科教育和普通教育没有将学科知识融入"知识领域"，所以既不是"文科的"，也不是教育。它们未能很好完成第一项任务，即产生相互理解(没有它就没有文明的那种"论域")。这种文科教育没有带来统一而是造成了分裂。

我们既不需要也不会得到精通许多种学科知识的"博学者"。我们很可能变得更加专业化。但是我们确实需要的(并能

够界定知识社会有知识的人的)是理解学科知识的能力。每种学科知识怎么样?它试图做些什么?它最关心的是什么?它最主要的理论是什么?它主要的新见解是什么?它尚未顾及的重要领域、它的问题、它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没有这种理解,学科知识本身就会毫无结果,实际上还会不成其为"学科知识"。它们将变得自傲和无效。因为每一种专科知识的主要新见解都来自于另一种不同的专业,即来自于另一种学科知识。

目前,新的混沌论数学正在改变经济学和气象学。物质物理学正在彻底改变地质学;DNA 分类遗传学正在彻底改变考古学;心理、统计资料和技术分析和技能正在彻底改变历史学。美国人詹姆斯·布坎南(1919 年—)因将新的经济理论应用于政治进程,并因此颠倒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政治学家作为其工作基础的假定和理论,荣获 1986 年诺贝尔经济奖。

要使学科知识变为知识,这要求学科知识的拥有者——专业人员——承担起充分理解自己的学科知识及其知识领域的责任。

新闻媒介(不管是杂志、电影还是电视)要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们不能独自做到这一点。其他任何种类的大众化出版物也做不到这一点。学科知识必须如实理解:严肃、缜密、苛严。这要求每种学科知识的带头人(从每个领域的最主要学者开始)承担起使自己的知识为人所理解的责任,并愿意为此而作不懈的努力。

在知识社会,没有"学科知识之冠"。用中世纪伟大圣徒和哲学家圣彼拿文都拉的话来说,所有学科知识同样有价值,同样通向真理。但开拓使之通向真理的途径、通向知识的途径无疑

是拥有学科知识的人的责任。他们集体受托保管知识。

当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中把资本主义确定为一种不同的社会秩序时,它已经统治世界一个多世纪。"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是在30年后,马克思死后很久才创造的。因此,现在试图写《知识论》,不仅非常放肆,而且草率得可笑。在我们开始从资本主义时代(当然也是社会主义时代)向未来社会过渡时,能够尝试的一切(本书尝试的一切)是描述未来的社会和政体。

但是我们可以希望,100年后能够而且将写出一本即使不是命名为《知识论》,也是与此命题相类似的书。这将意味着我们已成功地度过了业已开始的过渡阶段。对知识社会作预言将是愚蠢的,就像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那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那年、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那年)时预言马克思在100年后所写的社会一样愚蠢,就像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资本主义时预言我们现在生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愚蠢。

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预言的:最大的变化将是知识的变化,即它的形式和内容、它的含义、它的责任以及做一个有知识的人的含义的变化。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后资本主义社会
作者＝
页数＝２１８
ＳＳ号＝１０７６７９０１
出版日期＝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
目录
正文